彼得堡的冬天

格·伊万诺夫回忆录

贝立文 章昌云 译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属于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
幸福的声音和短暂的时光
请接受
我用双手撒下的沙粒



彼得堡的冬天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格·伊万诺夫回忆录

贝立文 章昌云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第二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彼得堡的冬天

——格·伊万诺夫回忆录

作　　者	[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翻　　译	贝文力　章昌云
特约编辑	庄志民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文庙路120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万
插　　页	2
版　　次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3500册
书　　号	ISBN7-80616-631-9/I·228
定　　价	15.50元

编辑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1894 年生于旧俄科文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彼得堡的第二武备中学,但没有毕业。1910 年发表处女作,1911 年加入自我未来派,次年宣布退出,加盟阿克梅派。1912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基弗吕岛朝圣》(取名于法国画家华托的一幅名画),受到谢维里亚宁和古米廖夫等人的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一些通俗刊物踊跃投稿,写了大量的所谓战争诗。1916 年出版根据阿克梅主义原则创作的诗集《帚石南》。十月革命前后积极参与"诗人车间"的活动和彼得堡的文学生活。1922 年携妻子、年轻的女诗人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离开俄罗斯,先后辗转生活于柏林、巴黎、里加,同时以诗人和批评家的身分频繁出现在许多刊物上,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最著名的代表之一。1928 年发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1931 年出版侨居国外后的第一本诗集《玫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居比亚里茨,战后返回巴黎。从 1953 年到 1958 年去世一直住在尼斯附近的养老院里。晚年穷困潦倒,生活凄惨。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大相径庭。关于他的回忆录,有人说这是"连

篇的谎话”,也有人称这是“罕见的真实”;关于他的诗歌,有人将他贬为“一钱不值的效颦者”,也有人评价颇高,说只要读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诗,就会知道霍达谢维奇乃至勃洛克的才能是有限的;关于他在文学界的地位,有人将之视若垃圾,有人将之奉为偶像。而他本人对这些截然对立的说法的反应是:

我们全是英雄,也全是叛徒,
所有的议论我们都同样相信。
怎么,我亲爱的同时代人,
你们感到高兴?

尽管同时代人对伊万诺夫褒贬不一,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可以说是褒多于贬,且不说国外俄罗斯文学圈对他的推崇,就是在俄罗斯(前苏联)本土,自80年代以来,不但已有他的作品的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在诗人诞辰百年之际,莫斯科还出版了规模空前的三卷本《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文集》。文集的编者维特科夫斯基这样评价诗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善于将自己的生活,将自己的诗歌化为神话。用他的话来说,‘诗人的任务就是要以牺牲一切短暂的东西——其中包括牺牲个人——为代价创造出一小块永恒’。在迟到了几十年之后,伊万诺夫的‘一小块永恒’终于成为我们的读者的一笔财富。”作为诗人,他“没有死,也不会死”。这种评价在今天的俄罗斯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伊万诺夫一生除著有十本诗集、一部长篇小说(《第三罗马》),以及一些批评文字外,还著有多种散文作品,其中较著名的便是我们这里介绍给读者的回忆录(我们姑且称作“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和系列特写《中国剪影:文学肖像》(这只是个假定性的书名,内容与中国毫无关系)。

《彼得堡的冬天》作于20年代中期，读者一般称之为回忆录，因为里边的人物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广为人知，地点也完全是真实的，就在彼得堡－彼得格勒。应该承认，论知名度，《彼得堡的冬天》不在《往事如昨》和《大墓地》之下，但又与后两者存在明显差别。吉皮乌斯和霍达谢维奇的回忆对象都已作古，而伊万诺夫的回忆录写作和发表期间，书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很多依然健在。出于种种不言而喻的顾虑，绝大多数回忆录的作者都忌讳写活着的人，因为这很容易招致当事人的不满和非议。毫无疑问，伊万诺夫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具有相当的风险。果然，该书的部分内容一经以单篇的形式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便立刻遭到阿赫玛托娃、谢维里亚宁、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等人非同寻常的猛烈批评。由此不难想象其余的人，如果他们还活着，会做如何反应。

伊万诺夫回忆录与吉皮乌斯和霍达谢维奇回忆录的差别不限于以上一点。后两者至少自称力求真实客观，切忌道听途说和凭空虚构，而前者则不然。

自《彼得堡的冬天》问世以来，它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的对象，也是那些怀有强烈好奇心、热衷于在本世纪初的文艺生活中挖掘风流韵事的人争论的对象。

那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俄罗斯研究者尼·鲍戈莫洛夫指出："对那些意欲通过《彼得堡的冬天》来获得对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文学界和演艺界的准确完整认识的人，当然有必要及时提醒他们：别对此书所言信以为真。这绝对不是一部要给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现实图画的回忆录。"据与伊万诺夫交往甚密的女作家别尔别罗娃回忆："一天夜里，我们坐在某处的一张小桌旁，大家完全是清醒的，他（按：指伊万诺夫）不停地来回拉扯着自己的手套（他那时戴一双黄色的

手套，持一根带镶头的手杖，拎一只饭盒，戴一副单片眼镜)，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的《彼得堡的冬天》里百分之七十五是虚构，百分之二十五是真实。说完他习惯地眨起眼睛。"

据权威人士考证，《彼得堡的冬天》里事实上的错讹之处比比皆是，其中有的无伤大体，比较容易辨别和纠正，如人名错误，引文错误，错把谣言当亲眼所见等等，有的则比较复杂，且事关重大，如说赫列勃尼科夫、库里宾、布尔柳克兄弟、克鲁乔内赫是疯子和酒鬼，说戈罗杰茨基在邓尼金情报宣传机构工作过且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莉莎·莱斯涅尔在白军那儿碰到过他，说勃洛克去世前约诺夫曾去看望过他并对如何起草病情报告做出过指示……这些说法均为子虚乌有。对此，有必要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指出上述问题，并不等于怀疑《彼得堡的冬天》的存在价值。相反，尽管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但还是有其明显的可取之处。首先，它确实准确细腻地反映了本世纪10年代俄罗斯许多被遗忘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活；其次，不可否认，作者的观察毕竟不乏准确和敏锐之处，例如作者笔下的克留耶夫，形象就很丰满，而且真实可信；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具体而微地再现将俄罗斯推向革命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完整图画，对伊万诺夫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作者的叙述看似散乱，其实不然。各个相对独立的章节之间是互为联系的，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紧凑的整体。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从神秘主义和终极关怀到创作问题和日常生活，从上流社会和文艺精英到市井小民和凡夫俗子——天地人文，三教九流，时代气息，历史风云，可谓尽在笔端。不难理解，对这样一份文献，非但专业人员不会错过机会，就是一般读者也会兴趣盎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彼得堡的冬天》介绍给读者的理由。

阿赫玛托娃说过:"诗人永远有理。"或许,我们应该接受这一前提。对《中国剪影:文学肖像》,同样应作如是观。

郑体武

1998年8月16日于上海

目　录

中国剪影:文学肖像

彼得堡的冬天

第一章

据说，溺水者在最后一刻会忘却恐惧，不再憋气。突然之间，他会变得轻松自如，悠然自得。因失去知觉，他含笑走向深渊。

1919年的岁末，彼得堡已经悠然自得地沉下去了。

饥荒尚未严重、长久地肆虐时，人们害怕饥饿。之后，人们便不再注意饥饿，甚至不再注意枪毙是怎么回事。

"喂，昨天看完芭蕾你是怎么走到家的？"

"谢谢，没什么，皮大衣没被剥下。可是，不得不在院子里挨冻半个小时。8号里被抄了家，抄家时不放人上楼。"

"抓了什么人没有？"

"年轻的佩尔菲利耶夫，还有在他家过夜的一个大学生。"

"大概会被枪毙吧？"

"大概会……"

"而斯佩西夫采娃是讨人喜欢的。"

"是的，可她比卡尔萨温娜差得远了。"

"喂，彼得·彼得洛维奇，有空上我们家来玩……"

两个小市民相遇，说说生活琐事就分手了。说说芭蕾……

皮大衣……年轻的佩尔菲利耶夫，还有大学生……而我们合作社里，今天发咸鱼……大概会被枪毙的……

两个北方公社的公民心平气和地谈论着日常生活琐事。

一个公民叫住另一个公民：
公民，今天午饭吃些什么？
公民，有没有去登记？……

他们的交谈是那么平静，不是因为无情，而是习惯。

并且机会是均等的——今天枪毙的是一位大学生，明天可能是您。

……公民，我今天睡得不好——
我用灵魂换取了火油。

对此有人在担心：好像我毫无保留地用灵魂“换取了火油”。有人在搞阴谋，有人在祷告，有人穿过解冻或者冰封着的整座城市，为的是看到永久的情人、天使的化身吉赛尔，如何在柔和乐曲声中，从蓬松的簌簌作响的纸玫瑰背景下，轻盈地、沐浴着月光飘出来。

观赏一下，叹息一下，然后在夜间又穿过整座城市返回。

营火上空火星闪着金光，
涅瓦河水面烟雾缭绕，
流弹飞过涅瓦河上空，
寻找你那可怜的心脏……

嘿，也许子弹今天不会射到我的心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彼得堡的一角——普卢塔洛夫路。这地方十分偏僻，甚至连警察都不屑一顾。否则的话，住这儿的一位投机商不会厚颜无耻地在门口钉上买卖的招牌。招牌上白纸黑字写着："这里出售狗肉"。

普卢塔洛夫路上，一幢肮脏不堪的六层楼房子里，B租了一间带厨房的房间。

B——原先是位作家。15年前出版过什么东西，甚至还"轰动一时"。现在"为自己"而写，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写，只是装装样子。

坦率时他承认："我唾弃文学——生活潇洒，这才是主要的。"

他是个怪人。他写出来的东西毫无才气可言，然而里边还"有点儿东西"。高个子，没修剪过的黑胡子，一双强盗似的蛤蟆眼，说起话来却甜蜜蜜地像个修道士。他要末几个星期不出门，呆在摆满了他认为是古董的各种破烂的"住宅"里，从早到晚钻在书堆里翻寻；要末几个月不见踪影，不知跑哪儿去了。

"B，您这是去哪儿了？"

他微笑着："噢，去了趟亚丰……"

"您去亚丰究竟什么事？"

仍然微笑着："是这样的，有必要去，没什么，跑一趟真好。懊恼的只是路上钱包给人偷了，还有贵重的东西：革命前留下的茅香露酒——否则的话可以款待您——以及圣徒干尸的一点遗骨……"

过了半年又走了，"您上哪儿去了？""不得不去一趟高加索，一所修道院……"

我决定正是到这个外表酷似歌剧中的强盗、教会学校毕业

的唯美主义者那儿去过夜。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彼得堡一个熟人那儿滞留过久(而我住在水池路的尽头)。当我打算离开时,已是10点3刻。如果走回去的话,肯定会遇到巡逻队和警察,因为我不仅没有夜间通行证,而且连普通的劳动手册也没有。在警察局里过夜是件不愉快的事,况且,问题还在于早上怎么回去:可能放我,也可能把我送到肃反委员会去。像曼德尔施塔姆(顺便说一句,他对警察怕得要命)那样高喊是不明智的:

夜间通行证我不要,
哨兵我不怕——

我的熟人那儿没地方睡。这时,我想起了住在不远处的B。入口的门上没有沉重的挂锁——意味着在家里,但是我敲门没有反应。难道走了?我敲得响一点,传来B的脚步声和嗓音。

"那么早来闯门?滚开,反正12点之前我是不让进来的。"

我估计这未必是针对我的,再敲了一下门并自报家门。

B马上开了门。"老兄,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想喝点暖和暖和?"他把酒杯挪到我跟前。

B本人看来睡前已经"暖和"过了。旁边开口的立领衬衫领扣敞开着,脸色红润,眼睛油光发亮。不过,这是他通常的状态——似醉非醉,永远"带点醉意"。

B知道我的来意是过夜,不知怎么开始忙乱起来。

"要是您不方便的话,您尽管说,我就走。"

"您说什么呀,亲爱的。非常方便,非常高兴,只是……"他的眼睛又东张西望起来……""不知您方便吗?"

"您不用为我操心。"

“当然，当然……但是不知您？……您一般睡得熟吗？”

“很熟，并且今天非常累，整天没歇过脚，简直躺下就……”

“好吧，好吧……”看来B很高兴。“否则，我这儿来个人……一个书呆子……邻居……来挑些书……我怕我们会妨碍您睡觉。”

我请B放心。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事会妨碍我的。尽管我推辞，他还是安排我睡他的床，就在破烂的花缎帘子后面。

“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您会舒适些，而我心里舒坦些。我在沙发上过夜，我的沙发非常好。”

床又宽又软……B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翻书沙沙作响，不时地发出调羹碰着杯子的丁当声……书呆子邻居没有来……

……我醒了。门帘后面传来轻声的谈话。陌生的噪音多些，温情而又尖细的，B只是偶尔插入一两句。

“您离开了上帝。真亏您做得出。很少有人会背弃上帝。要侍奉上帝。您想得倒好，十字架刚从脖子上取下，主就会接受您，帮助您……”

“究竟要怎样侍奉？给上帝盖教堂？唱赞美诗？”

“既要盖教堂，也要唱赞美诗，还要在自己心里想着上帝，主要的是心里要有。那样上帝就会帮助您。”

“当他帮助后，那时会怎么样？”

“一切都会有的，一切。您听着。各种各样的面包，香肠，鲱鱼罐头，白白的鸡蛋，你想要什么，并且不花钱，即使按原来价格也不要你付钱，而是白给。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一切永远都是免费的，只是要把上帝放在心上……”

我小心翼翼地抬起一点身子，透过帘子的破孔瞧了一眼。B坐在圆桌后面。在他前面，背对着我，坐着一个穿着短皮袄的

人影。他头上一大块秃顶,周围稀稀拉拉一些残发。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头颈钻到了肩膀里……

"放在心上,是的。"说话人沉默了一会儿……

"噢,那么,按照所约定的,首先得5千……"

"要5千? 昨天说是3千吆!"

"5千……"小老头重复了一遍,"少了无论如何也不行。然后,喏,这份东西拿着,你知道要重抄。不用打字机,手抄。为了颂扬上帝请费心了。"

B叹了一口气,开始数钱。小老头仔细地数一遍后收好。

"喏,我该走了。我的那些死者大概要不安了——走开了两夜。忙不完的事……"

"你在墓地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什么? 相反——伙伴们是招人喜欢的。"

"你不觉得恶心吗?"

"究竟什么是恶心? 当然,要是有谁生了蛆,并且向你爬来……躺久了的死人干枯了……那有什么恶心的? 娘们中会经常碰到那样的怪人的……"

"闭嘴。你说那么多,我呆会儿睡觉都成问题了。"

小老头哧哧地笑了起来。

"真是个神经衰弱的人! 还想当我们的部长! 等我们得了天下后,你当个参政员就够受了。嘿……嘿……唉,不要紧,主要的是记住,放在心上……"

"Г.В.,您睡着了吗?"主人送走客人后问我。

我没有应声回答。"睡着了,"B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他还磨蹭了一阵,什么东西打开又锁上,把钥匙弄得丁当响,翻动文件时发出沙沙声,唉声叹气几下。他终于躺下睡觉了,熄了灯,并开始发出轻微的鼾声。在他鼾声的伴奏下,我也进入了梦

乡。

早上，我离开时，B 还沉沉地睡着。

“把祈祷文重抄一遍，散发给您的 9 个熟人。如果您不执行的话，您将大难临头……”

接下来是篇祈祷文：“晨星，仁慈的源泉，力量的源泉，风的源泉，火的源泉，繁殖的源泉，希望的源泉……”

“古怪的祈祷文！要知道晨星即启明星。”

“是古怪！不知是不是这东西，那个老头，鬼神崇拜者，吩咐 B 重抄的，我给你讲起过，你记得吗？”

这次谈话是在半年之前，普列奥布拉托斯基路，古米廖夫住宅里。古米廖夫坐在小圆炉子旁边，用他儿子的玩具军刀，不时地在拨弄木炭。

“古怪的祈祷文！正如你说的，既然 B 在忙乎妖魔鬼怪的事，很可能正是他寄来的。但是，既然了解我，还寄给我这样的东西，真是愚蠢。如果我去抄写和散发这篇东西，我算什么东正教徒？”

“去散发是愚蠢的。究竟谁会去抄写？”

“喏，我们假设有人会去抄的。首先，大多数人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想，这只不过是某种颂歌。如果是个迷信的人，也许会，反正就重抄一遍，谁去弄清楚它。要知道大多数人与其说是教徒，还不如说是迷信的人。”

“也就是说，出于害怕灾祸临头而去抄的？”

“当然。”

“多么荒唐啊！”

古米廖夫用烟卷敲敲他那乌龟壳做的烟盒。

“不是像你所想的什么荒唐事。请相信，这些威胁不是空

话。"

"那么,你现在要灾祸临头了?"

"是的。我相信,就因为此灾祸将降临我头上。你别笑,我完全是认真的。有人有意识地向我挑战,我作为基督教徒,自觉地接受挑战。我不知道攻击来自何方,敌人使用什么武器。但我深信一条,我的武器是十字架和祷告。因此我很平静。"

"奇怪。那是B. 和那老头。现在这份祈文,你的谈话,有点儿像是在15世纪!从来没有想到过现在还有类似的东西。"

"你设想一下,还存在。如果有关这方面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照样可以生活一辈子——这是最好的。但是,就像你在B那儿过夜,偶尔,稍微触及一点什么,触及某个覆盖整个世界的蛛网——你就已经不自由了,陷入网里。你为了摆脱就要作出某种努力,不去做就可能遭殃。暴风雪一直延续到你在B那儿度过的晚上,你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那样的夜晚。而碰上一次,现在你就遇到这篇颂文和我们的谈话,以及一定还会有什么遭遇。有人在那里已经对你产生了兴趣。或许,给我寄来这页纸只是为了让你读一遍。或者相反,在我身上打主意,而与你毫无关系……"

"你在吓唬我,"我哈哈大笑起来。

"别害怕,亲爱的,——任何时候都不用害怕。但是,对这种事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不谈这个了,够了。我们去溜达溜达吧……"

下起罕见的鹅毛大雪。沿人行道尽是一个个褐色的雪堆,脚下尽是污泥……

……彼得堡冬天的雾汽中,

铺路石板石板路沾满了泥泞的雪

其实，这已经不是冬天，而是3月中旬了。不戴手套手会冻僵的，但是呼吸已经轻松了——毕竟是春天了。

池塘边光秃秃的树枝上空飞过一只笨重的大乌鸦。男孩子们在希腊大街的拐角处倒卖香烟。

“10支什么价？”“300。”“太过分了。”

“请吧，公民，我的200。”“他的是假货，买我的，250……”

……硫磺火柴的臭气，一缕豆青色的烟雾。在烟卷点上后的这种暖和的空气中，已经使人感到特有的“春天的”味道。

“我们究竟上哪儿？”

古米廖夫从冻成冰的皮袄面子上掸掉冰雪，整了整楚赫纳人戴的有帽耳的风帽。

“你着急吗？那我们散步到修道院。我找那儿的鞋匠。”

“非常乐意。但是，你家楼梯口也有鞋匠，钉鞋掌要到修道院，这是什么意思？”

“不，我的那位修道院的鞋匠可不简单，因此我要上他那儿去。他是个绝顶聪明的老头，博览群书，通晓《圣经》，是个高级僧侣。对普希金说三道四。我打算把列尔涅尔领到他那儿去，让他们聊聊。”

“不知是不是隐姓埋名的什么将军或者教授？”

“嘀，不，他是来自伏尔加河的农夫，30岁时学会了书写，是个绝顶聪明又十分风趣的人。有点像克留耶夫，只是更泼辣点。你自己会看到的。”

我们走完老涅瓦大街，绕过修道院，拐进一条小巷，跨越木栅栏，穿过铺满了雪的院子，然后到达穿堂，上了楼梯，终于来到一扇狭窄的门的跟前，门上绘着锤子和木槌。开门的是一个光

着脚的小女孩。“找伊利亚·纳扎雷契？在家。”

……老头穿着肮脏不堪的短上衣，在油灯下麻利地将锥子穿过来穿过去，一双小眼睛从铁制的眼镜框底下不时地闪现出刺人的光芒。他说：

“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错了。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不爱俄罗斯。俄罗斯对他来说没有多大关系。他心灵深处是德国人，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他所爱的，如果您想知道的话，是妻子和彼得。”

“哪个彼得？”

“彼得一世，就是所谓的彼得大帝。而为什么是大帝——这是因为他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人。”

“您，伊里亚·纳扎雷契，话说过了头吧。普希金是德国人，彼得大帝是德国人，那么究竟谁是俄国人呢？”

“俄国人？”老头在压平的鞋掌上敲敲结实，“嘿，嘿……谁是俄国人……”（我在哪里听到过这有些嘶哑的嗓音和这种嘿嘿笑声？究竟听到过没有呢？）

“俄国人？该怎么对您说呢……喏，举例来说，我们的圣彼得堡——神圣彼得的城，嘿嘿……谁建立的？彼得？你们会这么说。要知道毕竟不是彼得站在齐喉咙的沼泽地里打桩！彼得的骨头躺在大教堂的金盆里。而那千千万万人的骨头在这里，——他用脚跺了一下，——在我们脚下腐烂，他们的未被超度的灵魂在这圣彼得堡，无论是神，还是鬼，都不需要，直至今天每逢夜间仍忍受着痛苦。他们既在咒骂您的彼得，同时也骂我们大家——这是俄罗斯的骨头，俄罗斯的灵魂……”

他又弯下身子缝鞋。

“古米廖夫先生，为您钉鞋掌真吃力，公鸭似地走路，鞋型都磨歪了，鞋掌怎么也装不好。”

“这是我骑兵的步法。”

“也许是骑兵的步法，只是，对不起，内翻足……”

“伊里亚·纳扎雷契，不管怎么说，究竟为什么说普希金是德国人？”

小老头又嘿嘿笑了起来。

“我用小诗来回答您：

我爱你，彼得的作品，
爱你那匀称严整的模样，
涅瓦河浩荡的流水，
琢磨着它的堤岸。

“喏，您觉得怎么样？我爱！他究竟爱的是什么？彼得的作品。正是俄罗斯人恨的东西，而他却爱。德国人！爱强国！河水！用我们的脊梁拖，在我们的骨头上夯实——这是琢磨……！是不是？”

“我也爱，可我是俄罗斯人。”

“您是否是俄罗斯人，这点等会儿分析……您的鞋钉好了。您打算付钱还是以后用面粉清账？面粉？好吧，现在我包好给您。”

鞋匠双脚蹭着地，走了出去。

“好玩的老头。”

“非常好玩，好像有点动情。”

“好像是。但是个聪明人。听见他是怎么推理的？让他去宗教哲学协会多好，而不是在这儿修鞋……就连他的房间也那么可爱。瞧：多整洁，书籍分门别类摆得多好。让我们看看他在写什么？”

古米廖夫掀开小本子的封皮,第1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

"晨星,仁慈的源泉,力量的源泉,风的源泉,……"

"这就是您的鞋……"

古米廖夫手中拿着本子转过身来:

"伊里亚·纳扎雷契,这是什么?"

老头从眼镜下面瞧了一眼,耸了耸肩膀。

"不该翻别人的抽屉。"

"就是说,是您给我寄这东西的?"

"那么说来就是我。"

"干吗?"

"那还用说——抄写和散发呗。"

"您自己清楚,这祈文针对谁的?"

鞋匠沉下脸来。

"我没有时间,公民们,很遗憾,我没有空。这是您的鞋。请付给我干活的钱——等着取面粉我可不干。如果是修鞋方面的事,先生可去找别的师傅。我要离开去农村了……"

……我在哪儿听到过这嗓音?啊!——原来如此……

"您要离开?死人会不安吗?"我轻声地说。

老头讥讽地朝我看了一眼。

"他们有什么不安?年轻人。他们在地底下很太平。这不如说活着的人该不安。公民们,我深表敬意。"

一年以后,在喀琅施塔得隆隆炮声中,我走在石头岛大街上。有人把我叫住。B头发稀稀拉拉,形容憔悴。

"您怎么啦?"

"在什巴列尔坐牢,遭到埋伏。"

"哪能呢?"

“这样的,因为酒精。一个鞋匠给我设法弄到了酒精。我上他那儿,而那里有埋伏。拘留了 3 个月……”

“鞋匠？这不是修道院那儿的伊里亚·纳扎雷契吗?”

“原来是这样？就是说,您睡得不是那么沉。是伊里亚·纳扎雷契。但是您是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和地址的呢?”

“不仅是地址,而且还去过他那儿。还愿意再去聊聊。也许,我们一块儿去?”

B 苦笑了一下。

“这有点难度:还在 12 月份他就被枪毙了。因为酒精的缘故。遗憾,他出售的酒精非常好,爱沙尼亚的,又不贵。”

第二章

1919年的夏天，暑期里，我从沃尔夫的《书的年鉴》中读到有关一本新书的广告。书名叫《印象派艺术家的画室》。

价格为2卢布。

这本书的页数好像很多，其内容也引人入胜：叶夫列伊诺夫的单人剧，赫列布尼科夫的诗歌，达维德·布尔柳克的作品，弗拉基米尔·布尔柳克的作品，某个女士所写的关于亚述利亚的文章以及她画的七彩插图。

我预订了这本《画室》。后来，在沃尔夫那儿有人告诉我，我是三个买主之一：我，赫尔松的一位小姐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某个佩图霍夫。无论是在彼得堡，还是莫斯科——连一本也没有卖掉。只有我们三个舍得化2卢布血汗钱，还不算邮费，为的是从布尔柳克兄弟的作品以及七彩的亚述利亚的插图中得到乐趣。

只有我们：我，赫尔松的小姐和佩图霍夫。1亿6千万人中的3个。

噢，罗斯！噢，rus！

但这是后来在沃尔夫那儿听说的。当时，我预订时，甚至有

点担心:收得到吗,别卖光了?

《印象派艺术家的画室》一书的装帧倒并不使人扫兴。长长的大开本,封面是酱紫色。上面绘有某种看不懂的东西:也许是个妇女,也许是栋房子。亚述利亚插图也不错,说是七彩,原来是夸张之辞,颜色总共只有两种——灰色和雪青色。内容则“完全是大胆的”——简直使我大吃一惊。我怀着羡慕之情反复朗读一首关于被猎人追赶得精疲力竭的一头鹿的诗歌:

突然它竖起了鹿鬃,
尖尖的狮爪,
它表现感人的艺术,
无忧无虑,欢蹦乱跳。

或者是后来那首著名的《爱笑人》——“喔,大笑吧,爱笑的人……”

这我虽然不是很喜欢:巴尔蒙特或者勃留索夫的诗更合我的心意。但怎么能不羡慕其大胆和新颖呢?

这一切都非常新鲜,大胆和美好。在读过诗社编辑库利宾的绪言之后更不容置疑。库利宾是很庄重地解释这一切的。

我怀着敬意重读了这篇文章。

然后怀着敬慕之情重读一遍单人剧——戏剧艺术中的大变革——就像它被推荐的那样。

然后是《爱笑人》。

然后又是单人剧。

自然,还有然后。过了约两星期,我通过邮局寄出挂号邮包:10首长短不一用紫褐色墨水写的诗歌,同时附了一封给编辑库利宾的信。

寄出后我开始等待。某些经验告诉我，回音不一定很快会来，并且未必会令人高兴。但是，答复却破例马上就到了。是什么样的答复啊！

粗糙的纸张上，也用紫褐色墨水写着：

“亲爱的朋友，寄来的东西是杰作。将在最近一期刊登。我欢迎并拥抱……”

是的，经过两个月的“怀疑和期盼”，寄来的不是杂志《尼瓦》，而是退稿及令人讨厌的一成不变的附言：“阁下，很遗憾……”

假期结束了——我回到了彼得堡。《画社》出版者库利宾请我一回来就上他那儿去。当然我很想这么做。认识进步的名人年鉴的权威出版者，与像布尔柳克或者鲍里夏克这样的人会见，文学生涯，革新活动……仿佛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遗憾的是，这里有个小小的很使我不好意思的“但是”……

“但是”——如下所述。我怎么去同“印象派艺术家们”认识呢？要知道那样会暴露我的耻辱：16岁，中等军官学校的学生制服，红领子上的金饰线。年龄还不要紧，年龄可以增加……但是制服……

我把库利宾想象成才情横溢的先生，长长的头发，苍白的脸，若有所思的样子。我写信给他说我去，让他等我。我登上6楼，到那富有诗情画意的顶楼，墙上挂满了褐色的画，地上堆满了雪青色的手稿。我按铃，他莫名其妙地朝我看着——“您想必弄错了，年轻人，在3楼，上校那儿，孩子……”

然而，让我们设想一下，一切都很顺利。是他写信给我说，我的诗歌是杰作，要知道本质问题是诗歌，而不在于年龄或者制服。不管怎么说，我们出去，比如说上街。他说：“您看，亲爱的

朋友,今天的太阳完全是紫色的……"而这时迎面过来一个将军。您本该说同意"是的,您说得对,像紫罗兰",或者以鉴赏的眼光反驳道:"紫色的?我说微带绿色的……"结果该立正(正步走三步,转身一二)。他提议去餐厅边喝酒边闲聊。"对不起,我只可以去糖果点心店。"就是在糖果点心店我不得不马上跑向军官"中尉先生,请允许我坐下……"

我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决定等到兄长去农村后,我穿上他的便服去库利宾那儿。我已经悄悄地量过这套便服:稍微肥大了些,裤腿要卷起,但是总的来说还合适。我给库利宾寄新诗歌本子时,附上一笔,说我病着,复元后就去……

……那是星期一,但我坐在家里"大声喘气",正如中等武备学校所说,是由于某项"家庭作业"所致。当时是下午2点左右。我忧郁地看了一下窗外——教学时间外出是不明智的。比如,一位将军走过来了。"学生,为什么您不在学校里?您的证件。"免不了要有些不愉快的事。

……窗外,将军穿过街道,向四周环顾一番,转过拐角——正好朝我们家门口走来。这是一个神情严肃的干瘪老头,军医,戴一副眼镜,穿着军大衣,深红色的翻领。我离开窗户,坐下来写未结束的诗歌。可是韵脚不知怎么出不来。

突然,我指望穿其便服的兄长跑进我的房间,样子很激动。"要闹出事了。学校里来了位医生,检查你是否病了……"

我怀着可以理解的不安走进客厅。那里坐着从街对面走过来的干瘪将军。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说着把两只手向我伸过来。"我叫库利宾,《印象派艺术家画室》的编辑……"

……擦得发亮的铜牌,医学博士库利宾,接待时间。稍高一

点，门上的红呢子上用图钉钉着一块橙黄色硬纸板：

合力者俱乐部。
未来派、立体派、
印象派艺术家诗人协会。

住房很大，很有气派。客厅里摆着感觉很沉重的家具——各种套子，吊灯，枝形烛台，青铜铸作的熊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落满尘土的名片。

桌上放着《尼瓦》杂志，墙上挂着泛黄了的一组画：《1879 年的军事医学科学院》，《1891 年的雅罗斯拉夫尔》。一切按规矩摆设。

但是，同《尼瓦》杂志和叶先图基简介杂乱地堆在一起的，有用金纸镶边的，就像新年枞树节的爆仗——克鲁乔内赫的《唇膏》，《扎萨哈列·克雷》丛刊，以及暴露性的著作精装本《科学院院士的隐私》。墙上杂乱地挂着一些图画。

图画的颜色——酱红色，栗色，绿色，雪青色——与博士接待室很不相称。那里是橙黄色背景下灰色的圆锥体，这里是浅蓝色背景下黄色的立方体，两者之间是花花绿绿的各种色彩——题词“阿斯特拉罕……谢利特……”这都是库利宾本人的作品。朋友和“未来派、立体派、印象派艺术家协会”志同道合者所送的礼品则装饰办公室。

在办公室一张大写字桌旁，柔和的灯光下有两个身影。博士戴着一副闪闪发光的金丝边眼镜，双手插在灰色软质衣料制服的口袋里，一边抽着气味芳香的烟，一边与病人交谈着。

一眼就能看出，坐在对面的是位病人。他大概是个精神病患者。

他脸色发黄,眼神古怪,头发蓬乱,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吐出每个字时脸部都要抽搐。一颗脑袋在细长的脖子上直摇晃。他拿起一支烟,不是一下子能点着——手抖得厉害。点着一支烟就马上扔掉,抓起另一支烟,为的是再一次扔掉。

有时他冲动地耳语一阵。大夫的眼镜不时一闪一闪发亮,点点满是白发的头,用铅笔做一些记号,记下病情的进展情况,写下处方。

但是,留心听一下他们的谈话吧!

"很好,"大夫说,"生活的形状是三角形,因此,灵魂是三角形。"

"是是是的。""病人"在颤抖,"三三三角形和和长长长方形。"

"好的,"大夫在点头,"我们记下来:灵魂——思维——三角形。死亡——肚子——圆形……"

"不不,""病人"激动地说:"不不……写下:树——树。"

"但是,我亲爱的,您入迷了,为什么是树?要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精确地表达……"

"树树,""病人"坚持,"树。"他的头开始晃得更厉害,"树—树……"

"嗯,好的,好的,别激动,亲爱的。一棵树,一棵真正的树。让我们继续往下说。生命,死亡,然后是什么?艺术?……"

"艺术——伤痛!""病人"眉开眼笑起来,插嘴说道……

大夫也笑逐颜开。"非常机智。令人吃惊,十分深奥。伤痛。好,好……但是,这不是形状。让我们找一找形状。您对'容器'这个词能说什么?"

这是俄国未来主义奠基人库利宾和"世界最有天赋的诗人"

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在制订新流派哲学论据的提纲。但是这情景随时会改变:赫列布尼科夫的羊癫病会可怕地发作,他的交谈者不得不想起另一门艺术——医生的艺术。

这套有气派的住宅,墙上的这些画,这副将军的肩章,金丝边眼镜,白发苍苍的教授那从容不迫的举止——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几年以前,在这套住宅里住着一位四等文官库利宾。他接待病员,常去讲课,撰写科学文章——他做了该做的一切,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空闲时间他从事绘画,常去展览会。可是,空闲时间很少:开始了的一幅画往往几个月搁在那儿,没有完工。在那暗暗的过道里,还挂着一幅没画完的“静物画”——一只带把的水罐,两只苹果,一条鱼。画得用心,认真。四等文官库利宾模仿佛拉芒人。

但是,在寒冷的1月某一天,库利宾像往常一样去了医院,或许是科学院,却再也没有回来。穿着他的大衣,戴着他的眼镜,模仿他的脸和步法,用他的法兰西钥匙开门,进入这套住宅的是另一个人。

早上10点和晚上7点之间,医院的大夫、四等文官库利宾,在下着雪的彼得堡的一条小巷里丢失了自己原先的灵魂。

这就是他本人的叙述:

“……我在走过一座桥——想活动活动双脚。我正在考虑病人,讲课……我记得新套鞋轧吱轧吱响得厉害。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激动,情绪也没有什么特别。就在特洛伊茨基广场边上——侧面有匹马,马车夫为了使马站住,在抽打着马,一直朝着眼睛打……而马没能停住,只是抽搐着……这时,在整条石头岛大街突然亮起了信号灯。天尚未完全黑下来,突然亮起了灯光,

您知道,这有多美……”

“后来怎么样?”

“完了。没什么了。这时我身体内部不知怎么全变了样。我好像永远死去了,又奇迹般地得救了。我站着,不知为什么把帽子摘了。我想,老傻瓜,干吗你杀了50岁的一条性命?警察向我跑了过来:‘大人,大人……’他把我扶到车上……从那时起……”

……从那时起砖头大街的住宅里一切都变得一团糟。夜里3点他在电话里向克鲁齐内赫家要钱,无家可归的未来主义者在客厅里过夜。

我是多么爱怀孕的男子,
当他们在普希金纪念像旁边的时候……

早上,从洗澡间传来达维德·布尔柳克的时断时续的男低音。他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弱不禁风,要求把早饭送到床上:他不舒服,还要躺一会儿……

穿着漂亮的女仆用银盘给他端去“咖啡”——一瓶伏特加和黄瓜……

我是多么爱怀孕的男子,……
H.И.,急切需要二十五……
艺术——伤痛……
未来派、立体派、印象派艺术家诗人协会……

库利宾在这杂乱无章中自我感觉极好。50年的时间“死”在平静的、有规律的教授生活中,谁知道,剩下的日子还有多少?

这样，至少让这剩下日子的每一分钟别白白浪费掉……

老傻瓜……50年的生命……

“但是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弥补……”

库利宾重复着这些话，不时地发出笑声，笑得有点怪。他有点奇怪地不时地扯着自己的胡子，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面不时地闪亮……

“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可以经历多少事情啊……但是不要紧，不要紧……”

奇怪的笑声，奇怪的眼神。其间有某种令人厌倦的东西。

穿着将军服的交谈者，带着多疑的敏感，神气十足地转过身来问：

“你们认为我是疯子吗？”

我的未来主义什么结果也没有。我对描写雪青色“杰作”的兴趣很快消失了。我结识了比克鲁齐内赫和布尔柳克更适合于我的新的文学界人士。同库利宾的会面越来越少，偶尔见面又很匆忙。令我非常惊讶的是，1913年1月我收到一封用我熟悉的灰绿色纸写的邀请我晚上一定要去的信函。

我去了。为什么不去呢？根据邀请信判断，库利宾一定举行什么聚会，不是看戏就是听秘密报告。看来，我是“右派集团”中唯一的被邀请者——这是表示对“旧友”的敬意。不接受这种敬意是不恰当的。要是库利宾那儿举行“非正式会议”——这意味着，将有什么该注意的东西……还有这句令人好奇的附言：“入口处请出示请柬”。

一位优雅的年轻人在外厅迎接我，没问我要请柬。他彬彬有礼地握着我的手作自我介绍：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这名字在当时是十分响亮的：一本被没收的书，辩论会上的一系列丑

事,斗殴,用“玩具手枪”向公众射击……同这样的名声联系在一起的滑稽可笑的还有他那上流社会的派头,以及优雅的燕尾服。他再一次礼貌地并足致礼后放我进了大厅。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其中大部分我不认识。一些年轻人,脸上画着几何图形,还有一些激动不安的少女……一朵朵蓬乱的诗人般的头发,梳得溜光的分发,蓝色的短上衣和貂皮大衣……一个混合团体。

库利宾坐在高椅子上。我一下子没有认出他。他两手交叉在胸前,脸色出奇的苍白——擦了一层厚厚的粉。穿了一件宽大的血红色披风。额头上戴着金发箍。

……军事医学科学院……尼古拉医院……垂手直立的住院医师:“大人,不胜荣幸……”

……库利宾坐在自己镀金的高椅子上,像神像般地一动不动。克鲁齐内赫站在他面前,双手捧着粗粗的蜡烛,用低沉的歇斯底里的耳语声在喃喃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后来突然尖叫一声,开始边哭边诉,接着翻起白眼倒了下去。从第一排有人冲过去把他扶起来。他马上跳将起来,面孔在抽搐,但异常兴奋……

“大势已去,大势已去,”他已经完全像一个患歇斯底里狂叫病的女人那样尖叫起来。“他……接受政权了……大主教……未来主义者……革命的沙皇……”接着,整个大厅尖叫起来,又是鼓掌,又是跺脚。赫列布尼科夫歇斯底里大发作。法尔蔡·克鲁齐内赫喊叫声盖过所有的人:“接受政权……大主教……沙皇……”

库利宾仍然那样一动不动,两手交叉在胸前,稍微低下点头。他那涂粉的神像般的脸上泛起了茫然的微笑……

……我在一大堆混杂在一起的大衣——未来主义僧侣的狗

领大衣和海狸大衣中寻找自己的大衣。手套不见了——上帝保佑它们,保佑手套吧。但愿能快点离开这里……

很有气派的红呢子包皮大门在我身后轻声地关上了。庄重的铜牌上认真刻出的字母发出柔和的光芒:

医学博士……接待……耳,喉,鼻……

……老傻瓜,你50年生命耗费在什么地方?

……但是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补偿……

……您以为我是疯子?……

那次晚会以后我再也没去过库利宾处,而且他也没请我。在他"加冕典礼"之后,我大概未能掩饰住同他见面时所感到的尴尬。我有时在不同的场合仍然遇到他,他一直那样有气派和严肃,眼镜和肩章闪着亮光。后来,战争开始了……后来,1917年夏初,在一个风和日丽、令人开心的日子,一位熟人在涅瓦大街上碰到我,告诉我说:

"知道吗?库利宾死了。"

"因为什么?"

"由于害怕。"

"怎么会那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走在街上,迎面开来一卡车士兵。他们看到是一位将军,便把他抓起来送到杜马。在那里他被拘留了半小时,后来,当然抱歉地将他释放了。他回家以后就病倒了。躺了两天,把灵魂交给了上帝。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并且心肠极好。只是非常害怕。不幸的人!……"

第 三 章

一般认为，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之所以在全俄走红，是同托尔斯泰关于俄罗斯诗歌微不足道这一著名失言相关。的确，托尔斯泰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援引了谢维里亚宁的一句话："把螺旋拔塞钻扎入弹性的塞子，妇女的目光不再胆怯。"的确，由于这缘故，游艺和编辑人员未来偶像的名字(唉，寿命不长)在报刊的字里行间一度出现过(至今这名字只落得个在邮政信箱上的归宿："遗憾的是没有成名")。真正的名声来得晚些。其名声的获得其实是完全"合法"的。对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感兴趣的先是索洛古勃，后来是勃留索夫，并且"有人有意地对他散布谣言"。

这是1911年的春天。我当时17岁。我在二三本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已经相识了文学界的库兹明、格罗杰兹基、勃洛克，完全醉心于文学和诗歌。

谢维里亚宁这名字我那时没听说过。但是，有一次，我在沃尔夫的"富有诗意"的小桌子上翻寻东西。我打开一本约16页的小册子(书名已不记得了)，其副标题很复杂：某某卷，某某册，某某分册。在封底列出了所有准备出版的各卷、各分册的目录。

好像很多。同时还注明,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住波德亚切路某某号,周四接待年轻男女诗人,周三接待出版商,周二接待女崇拜者,等等。一周的每一天,每个钟点都精确地规定好,就像诊所里一样。

我读了几首诗歌。这些诗使我很受“刺激”。这些诗歌的俗气,当然相当明显,写作手法又是那么地外行,就像我的诗(仅仅一个月之前有人劝我,德姆·岑佐尔不该赞美……)。但是,我重复一遍:它们使我很受“刺激”。是什么东西让人受刺激—我不知道。大概是一年以后,仿佛也是偶然的——索洛古勃的诗同样使我受刺激。

我受到了诱惑,可是,我不是一下子就决定去波德亚切路同谢维里亚宁会面的。该持什么态度,说些什么?以年轻诗人的身份去?——这似乎有点伤害自尊心。作为崇拜者?——同样有损自尊心,甚至忘了自己是男人这一属性,因为声明中光列入女性崇拜者。最终,我找到了出路:我装出有气派的样子,在为出版商约定的时间去见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实质上,我是打算在最近的将来成为自己一本书的出版商……(75个卢布我是从姐姐那儿恳求得到的,我藏在可靠的地方)。

在从石头岛大街去波德亚切路的路上,我还想到一个使我为难的情况。毫无疑问,一位每天接待各种类型的来访者,其诗歌尽是大螯虾、汽车和法式句子的人——定是个出色的上流社会人士。当我乘坐自己的马车进入波德亚切路的院子时,我会不会惊慌失措?当傲慢的仆人身穿紫罗兰镶金银边饰的制服引我进入光彩夺目的办公室时,我会不会惊慌失措?当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本人出现,并同我用带着惊人口音的法语说话时,我会不会惊慌失措呢?……

但是,箭在弦上,马车夫已雇好,退却为时已晚……

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住13号。这个不祥号码的选择不由房主作主。房屋主管人员出于可以理解的想法,把整幢房子中最小、最潮湿、最肮脏的一套编上这个号码。入口在院子里,几只猫沿着肮脏不堪的扶梯在窜来窜去。门上用图钉钉着的名片上印着带大花字母 Ъ 的亲笔题名:伊戈尔·谢维里亚宁。我按了一下门铃,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小老太婆,双手全是肥皂沫。"您找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请等一下,我现在就去对他们说。"她走到门帘后面,并开始小声说着什么。我环视四周。这不是一间过道厅,而是厨房。炉灶上有东西煮开了,在冒烟。桌上堆着未洗过的餐具。不知什么东西在朝我滴水:我正站在晾着衣服的绳子下面。

"紫罗兰和紫丁香王子"出来迎接我,他用一只手遮住脖子:他穿的是没领子的衣服。小房间里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书,一些破烂的家具,墙上挂着一幅颓废派的小画——标准的摆设。主人的窘迫好像不亚于我。他没有接待来访者的习惯。

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开始讲别墅什么的事情,讲城里很热,然后才转到诗歌。谢维里亚宁提议我读诗。后来他朗读自己的诗。他读诗的方式跟他的诗一样,又讨厌又可爱。他用某种滑稽的调子唱诗,自始至终用的是一个调。可这正适合于他的诗。他嗓音洪亮,外表相当招人喜欢:身材魁梧,脸盘宽大,深色鬈发。我们坐了相当久,没有人妨碍我们,再没有别的"出版商"来。我们告别时的态度是友好的。不久我们真的交上了朋友。

我成了波德亚切路的常客。对我来说,漂泊文学家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它吸引我并诱惑我。我提到过,我在文学界已经有熟人。但是,上库兹明那儿去喝茶,或者一个月一次同勃洛克

进行恭敬的谈话,完全不同于每天来往于"维也纳"、"切列片尼科夫"和"达维多克"餐馆参加利戈夫或者维博尔克斯克方面的诗歌朗诵晚会,脖子上不系领带而是扎红色花结。这花结我是受伊戈尔的开导才系的。当然,我不敢在家里系,到了波德亚切路才系上。热闹的诗歌朗诵晚会和畅饮或者"编辑"会议在谢维里亚宁住宅里交替举行。伊戈尔周围聚集了相当多的诗人。其中三人获得崇高的荣誉,成为伊戈尔的"经理部"。这三人是我,康斯坦丁·奥林波夫——福法诺夫的儿子,毫无疑问是个疯子,但不完全是个平庸之辈,年约16岁;还有一个是格拉阿尔·阿里斯基,身份证上是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过了中年的大学生,十分沉着,但毫无才华。

"经理部"决定采取行动,赢得声誉,进行一场文学革命。每人出一个半卢布,凑钱出版自我未来主义宣言。宣言是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写成,并且按条列出提纲。我记得有这么一条:"风格的棱镜——恢复思维的光谱……"

顺便说一句: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份宣言,并且大部分加以注释,或者很认真地同宣言争辩!

有一次,一位真正的出版商来到波德亚切路,虽然他好像不是在事先规定的接待时间内前来的。的确,他暂时还什么也没出版过,但是看了我们的宣言后,他决定将自己的钱包供"思维光谱的修复家"使用。钱袋虽然鼓得不是太满:为了出版社的需要,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金表常被送到当铺去典当。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了一份周报《彼得堡喉舌》听我们使唤;后来,当它因彻底亏损而停刊后,名人年鉴还是用了这个名称。诗叫诗歌,刊物叫版本,编辑则称经理。到了夏季另一家报纸为自我未来主义者效劳——唉!这份报纸很庸俗地被称

作“下新城人”。它是在下新城交易会期间发行的，报上充斥着价格、收支对照以及有关把鱼销往波斯的文章。但是，出版这张报纸的伊格纳季耶夫的一个叔叔，尽管并不反对一切高尚的东西，却不加选择地刊登侄子寄来的文章。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记得我刊登过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证实梅捷尔林克是言语举止庸俗的人，并且没有才干……稿费当然没有付给我们。

在杰格佳里路和第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路拐角处，在《彼得堡喉舌》编辑部、“自己的”小木屋里经常庆祝“诗节”，为使诗节有“震惊”的效果，编辑们用特殊的通知单告之各家报社的编辑部。诗节活动的节目单叫做“韦尔热”(纸的等级)，节目单编制得引人入胜，内容丰富，并附上晚餐菜单，列入菜单的有香槟酒菠萝，奶油和葡萄酒，童子夜莺里脊肉。实际上当然要简单些。奶油和葡萄酒(Cusimier 公司，叶利谢耶夫处出售)更多的是作为诗歌和优雅的象征点缀餐桌的。但是，伏特加和葡萄酒的数量足够使不少客人陷入不能自拔的状态。有时事情的发生十分古怪。比如，有一次，某个叫彼得·拉里奥诺夫的人(他 45 岁时被未来主义所诱惑，担任负责沙皇农村养禽员这一古怪的职务)，在离开伊格纳季耶夫时剃了个半边刮净的阴阳头(他本留有富有诗意的浓密头发)，脸涂得像印第安人，背上画了个红方块爱司。

这个伊格纳季耶夫，表面上看是个最正常不过的人，圆圆的红红的脸，典型的二等商人模样，死的时候却非常可怕。婚后第二天，他从亲戚家做客回来，大白天拿着一把刮胡子刀直扑妻子，她得以摆脱出来，而他却自杀了。

我同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交情，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学方面的，持续时间都不长。我转入“诗人车间”后同其他的诗人建

立起了更为“合适”的因而是更加巩固的联系。但是,同谢维里亚宁本人分手我感到很遗憾。我甚至企图设法让他同古米廖夫亲近,介绍他入“诗人车间”。当然,这很荒谬。正当谢维里亚宁的名望登峰造极时,我们分手了(后来的二三次会面不算在内)。剪报委员会每天给他寄50份剪报,常常是整篇整篇的,充满欣喜或狂怒的小品文(实质上,反正都是为了“荣誉的手法”)。他的书的发行量对于诗歌来说是空前的。市杜马规模宏大的礼堂也容纳不下所有想参加他那“诗歌晚会”的人。他所有的梦想出乎意外地实现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鲜花、轿车、香槟、标志胜利的在俄罗斯大地的旅行……这是真正的,看来有点像演员式的荣耀。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不善于保持荣耀,就像不善于保持曾经在他以往诗歌中有过的那种真正的魅力一样。至于他现在的诗歌,则最好别提。

第四章

经典著作中对彼得堡的描写几乎总是从雾开始的。

各个不同的城市都会有雾,然而,彼得堡的雾是特别的。对我们来说那是自然的。外国人一上街就皱起眉头:“可诅咒的气候……”

我们也皱起了眉头,但是

我们决不会舍弃,
光荣而不幸的城市,
那豪华的花岗石的建筑,
宽阔耀眼的冰层,
壮丽黑色的花园……

正是雾,雾是这些“冰层和花园”的灵魂……

“涅瓦河浩荡的河水,它的花岗岩堤岸”——岩石上矗立着彼得大帝雕像,涅瓦大街,普希金诗歌的这些抑扬格,——这一切都是外貌,服装,而雾是灵魂。

在那里,在这半明半暗的黄色的地方,有人从阿卡基·阿卡

基耶维奇身上剥下大衣，拉斯柯尔尼科夫去杀老太婆，伊诺肯基·安年斯基穿着海狸皮大衣，浆硬的前胸衬领，心脏隐隐作痛，直接倒在皇村火车站肮脏的台阶上：

彼得堡冬天昏黄的雾气中
铺路石板沾满泥泞的雪

他是那么"痛苦地爱着"这些台阶。

但是，这一切是众所周知的。

涅瓦大街上热闹非凡，轻便马车，电弧灯光，弗多泽的"前灯"，逞能车夫"小心"的喊声，"肩上披着貂皮围脖和戴着面纱"的妇人，军服，发光的橱窗。流光溢彩的欧式街道感觉如果不是在鲁昂，那么就是翁特瓦尔登。就是这里的雾也"不是那种"，而是被欧化了的，中和了的。也许，"那种"真正的彼得堡的雾再也不存在了？

不，它在那里，就在旁边，两步路远。离这繁华仅两步之遥——空旷的街道，昏暗的街灯和雾。

雾中徘徊着奇怪的人们。

沿着小马厩路，拐过角落，过二三幢房子就能见到：

墙壁涂着灰色，
绿色的"裁缝"招牌。

其实，招牌并不是绿色的。根据市长命令，首都主要街道的招牌要保持"得体的统一"。大概市长读了不少库尔巴托夫的书。

裁缝的招牌——黑底金字。招牌的庄严雄伟与主人的身份不相吻合——他是小裁缝。为了不吓退顾客,玻璃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冲淡了招牌的冷峻庄严肃穆:"廉价改制、翻新、熨烫"。字条旁塞了一张略微泛黄的名片:尼古拉·卡尔洛维奇·齐布利斯基,自由画家,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肄业。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在家吗?"

裁缝整理着一堆褐色的东西,或许是正在翻新的有油污的衣服,或许是正在改做的衣料,他没有抬起毛发蓬乱的头,只是阴沉地答道:

"正在睡觉。"

正在睡觉——意味着在家里。在昨天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今天为了积蓄力气,除了睡觉,在家里还能做什么呢?大房间窗帘垂下,半明半暗。朦胧中看得见钢琴、罩着套子的枝形吊灯架、桌子上一堆文件。角落里的一张床上,有人在打鼾……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

打盹的那人笨重地翻转身去,使床垫的所有弹簧都吱吱直叫。

"干什么?滚开!几点了?"

"不早了(事实上是不早了——下午4点多)。起来。"

毛发蓬乱的头沉重地从枕头上微微抬起,两只手从毛皮大衣下面伸出来。嗓音嘶哑,然而悦耳并高傲,稍微有点小舌音:

"劳驾,我的朋友(原文为法文——译者注),如果不太麻烦您的话,请开灯,让我可以看见您的尊容。"

灯光下房间给人的印象改变了。

半明半暗中它看上去相当不错,甚至令人肃然起敬。高高的天花板,打开着的钢琴,"劳动和灵感的痕迹"……可是在灯光下……

地板上尽是烟头、火柴、废纸。一堆堆旧报纸,空瓶子,罐头的盒子。

钢琴上,一支3戈比蜡烛的蜡烛头直接粘在盖板上。另一支蜡烛头烧完了,淌在用珠母砌成的字“别赫施泰因”(钢琴的牌子——译注)上的蜡油像稀奇古怪的钟乳石。墙面上有一块块湿斑和用煤块画的图案:亚当和夏娃正在采果子(十分自然),翘起尾巴的几只猫,一些鬼。床铺简直是五颜六色乱七八糟的一团破烂。床头柜上放着一只瓶子,里面还有很少一点伏特加。

主人,自由画家,“音乐学院肄业”的那位,——胖胖的,有点浮肿,好久没有刮过胡子了。脸部表情是过量饮酒后产生的恶心与讽刺的混合体。然而,他的投手举足,用不听使唤的手戴夹鼻眼镜、点燃长长烟卷的派头,却让人肃然起敬。

“亲爱的侯爵,您能来看望老酒鬼很好。请坐……”

如果说彼得堡的雾气是特别的,那么,夜间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的雾则是最“特别的”。

在大街、小街和中街的交叉路口有几家啤酒店。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街道”上弥漫着雾气、尘埃,笼罩着一片寂静。从十字路口射来一束束电灯光,传来醉汉的低声絮语,传来扩音器里嘶哑的“中国小女子”的歌声:

茶余饭后休息时,
在黑龙江流经的地方,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子……

有的啤酒店是很出色的。

啤酒店是德国人在80年代开设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可靠和

悠闲的顾客——也是德国人。结实的大理石小桌子,沉甸甸的带把啤酒杯,装酒杯的瓷托架上有类似"谁早起上帝就帮谁"(原文为德文——译注)的题词。

墙壁上用瓷砖砌出选自浮士德的几个场面,玻璃柜里放着供隆重场合使用的餐具。这些餐具很久以来就一直被锁着——很久没有体面的老的顾客光顾了,很久没有听到神气的德国话了。现在在这些"埃德尔魏斯"和"莱茵"啤酒馆里,每到晚上,聚合着彼得堡漂泊文艺家的渣滓。

……放肆的"中国女子"一会儿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一会儿发出嘶哑声。墙上被题词弄得支离破碎的镜子贴面闪烁着黯然的光泽。油腻的白色泡沫沿着厚厚的玻璃慢慢地流淌着。

"人! 还有一对情侣。胆大妄为的人!"

温热的啤酒"使人疲惫不堪"。冷酒只有"纨绔子弟"才喝。

……中国女子,中国女子,
我的中国小女子……

将近晚上 10 点,"埃德尔魏斯"酒馆人满为患。"买卖"正式进行到 12 点——客人们坐到 1 点。然后去涅瓦大街营业到凌晨 3 点的"多米尼克"酒馆……而 4 点钟,在干草大街,马车夫的茶馆开张——肮脏的褐色斑斑的台布上尽是煎蛋皮和从打碎了的壶里流淌出的酒精。这叫做"换店"喝……

……中国女子……中国女子……

几乎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在一个角落里,一棵积满灰尘的棕榈树下,三张桌子移到了一起。这个角是诗歌—文学—音

乐角。齐布利斯基正担任主持。一群人在进行着无休止的谈话。

这是诗人Ш,老留级大学生,高个儿,黑黝黝的,仿佛烧焦似的,他穿一身褪色的长襟常礼服,是个不同寻常的学者,半疯子。他“换店旅行”是从早上开始的——喝的不是咖啡而是一杯伏特加,另加两块鲱鱼。他已经完全烂醉如泥,用阴沉可怕的嗓音在扯着尼茨舍的什么事。Г也是一位诗人,也一样喝得酩酊大醉,呛得喘不过气来,还打断Ш:

“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诺瓦利斯……浅蓝色的一朵花。”

还有一些人,也是诗人,或许是音乐家,或许是哲学家,谁知道他们呢。吵得最响的是M——不是酒鬼,甚至没有喝醉——只是佯装醉了。为什么要佯装呢?大家都清楚,他从多米尼克偷偷溜回家睡觉去了。要知道明天要排练,可别耽误了。并且他不爱喝酒,也不舍得花钱——可又不仅为自己,还为别人付酒钱。究竟干吗他要这么做呢?

为了名誉。名誉,似乎是种奇怪的东西。去你的吧……

M大声地嚷嚷着碰杯,故意把酒洒出来,叫着闹着说些莫名其妙的祝酒辞。他边做手势,边捶胸哭泣……“我们为艺术干杯……我们要建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唉,青春,你在哪里……”

真正的醉汉们互相碰杯,喝了一杯又一杯。他们知道M是佯装的,他没有什么“破灭了的希望”可隐瞒的,他只是个爱开玩笑爱逗乐的人,是个言语举止很庸俗的人。但是,同谁喝酒,听谁闲扯,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一切东西都早已无所谓了。世上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人!还有一对情侣!……”

……中国女子——中国女子……浪漫主义……蔚蓝色的远方……查拉图什特拉那么说过……

齐布利斯基的嗓音既沙哑又狂妄，突然掩盖了所有的响声：

“如果灵魂不灭……是的，是不灭的……并且上帝问我……在那里……尼古拉，你做了些什么……演奏吧！我给他演奏……是的……我给他演奏黄雀。”①

“我是……对的，啊？”

“对的，对的……”众酒鬼扯着嗓门喊着。“说得真好，齐布利斯基……就是该这样。给他演奏黄雀……干杯……”

M. 异常欣喜，一个劲儿地要同人接吻。

你要是接触各种圈子的“漂泊文艺家”，就会有些奇怪的发现。

在漂泊文艺家的败类中更多的是多才多艺的和精明能干的人。

怎么回事呢？也许，问题在于艺术的本质与节制是对立的。“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者往往占绝大多数。然而，社会的上层人物同社会渣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某人“完蛋了”。但是，他原本是能够成为王侯的，也许，还比别人高尚些，但是不走运。什么东西妨碍了他，例如头脑“虚弱”，缺乏意志，于是，“王侯”的情况发生逆转，他“完蛋了”。可是机会曾经是有过的。而中不溜秋的、“干干净净的”、“受人尊敬的”的人，无论怎么样，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机会——他们的本质完全是不同的。

意识到同精神世界的联系，越过可尊敬的人的世界是社会渣滓的骄傲。当然是一种可怜的骄傲。

齐布利斯基开始时很出色。

“……音乐学院曾经有位男孩叫齐布利斯基，多么富有天赋啊，”将军老头居伊回忆说，”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他对音乐的理解会彻底改变的。什么样的天赋，什么样的气魄啊！”

“齐布利斯基倒是没有死。不久前尤尔根松那儿还有他的一首抒情曲。当然是非常有才华的,虽然……”

居伊摇着头表示不同意:“抒情曲?有才华?不,不是那个齐布利斯基,不可能是那个。要是那个还活着的话,会证明……”

因为齐布利斯基没有死,也没有“彻底改变对音乐的理解”,所以他唯一的选择是睡觉。

……裁缝的房间在马厩路。两支正在淌油的蜡烛头。高高的天花板在夜幕下显得越来越高大,钢琴盖打开着。

看不见外层剥落的墙,潮湿的霉斑,烟蒂和空瓶。房间显得空旷和庄严。蜡烛头的火苗在晃动。

在这晃动着的烛光中也看不见齐布利斯基脸上在“白天无情呆滞的光线中”显得那么引人注目的东西:连续不眠之夜的浮肿,很久没刮过的脸,正在堕落的人的绝望的窃笑。一双眼睛警惕地紧盯着破破烂烂的乐谱手稿……

齐布利斯基弹奏二三曲和弦,然后挥手打落掉谱架上的乐谱。

“见鬼去吧!我就那么弹。”

“那么”——意味着即兴弹奏。即兴弹奏有各种各样的,但齐布利斯基弹的却什么都不是。

起初是“漱口声”——他本人是这样称呼自己所弹的前奏曲的。有点类似一个用心的女学生在弹音阶练习曲,只是在这音阶练习曲中有某种问题,有某种危险的缺陷。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个别一些音调汇成不明不白的、均匀单调的噪音。1分钟,3分钟,5分钟,噪音集聚起来,沉重起来,变成轰隆的响声。这就是即兴弹奏!犹如成千上万只木制汤匙在击鼓时所发出的一种声响。这究竟算什么音乐?……

嘘……别打断，细听一下。您听见了吗？还没有？啊……现在听见了吗？

……在成千上万只木制汤匙中有一只是银制的，并且它正在敲击薄薄的发出清脆声音的玻璃……

您听见了吗？

勉强听见，与其说是听见，不如说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确实存在，它那尖细的、轻轻的丁咚声正在渗透、领会，使木头的轰隆声完全变样。同时，轰隆声已经不是木头发出的——它沉寂了，退却了，衰弱了……

齐布利斯基没有将手指从琴键上移开，他把脸转向听众。他面红耳赤，神情痴呆。高声喊叫压倒了琴声：

“吸血鬼磨着牙撤退了，他们没能吃掉美好的英国人！”

别注意这古怪的“说明”。听吧，听吧……

……噪音消失了。纯洁的，惊人的独特的旋律在欢庆胜利。最好闭着眼睛，闭上眼睛听这欢庆的乐音。无论是马厩路，还是淌油的蜡烛头，被啤酒淹没了的钢琴，现在再也没有了。这一时刻来到了：

一切在消失，只剩下
空间，星星和歌手。

听！现在一切中断了，琴盖呼的一声关上了，嘶哑的噪音在低声地说：

“就别再胡说八道了！”

“您演奏得有多迷人，H.K.。为什么您不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假装傻乎乎的一笑，“记下来？试过，并且不止一次，没记下来……”

“再说有什么用呢？那么听就行了。”“有耳朵的人都听见。”齐布利斯基像教会的助祭一样唱了起来。后来他装腔作势地行礼：

“子爵，请问，您觉得坐在老酒鬼的陋室里和去颇有名气的火绒草酒馆哪个更舒服？”

有一次，已是战争初期，一个傍晚，我顺路去齐布利斯基那儿弯了一下，眼前的情景使我非常惊讶。

他头梳得又平又光，脸刮得干干净净——正用心地在雪白的衬衫上系上“艺术”领结，常礼服……熨得笔挺的裤子……香水味……怎么回事？

齐布利斯基笑了笑。

“子爵，您对我漂亮的梳妆打扮感到惊讶？您想老酒鬼怎么啦？疯了？得了遗产？去相亲？”

“说真的，H.K.，您打扮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

齐布利斯基咂一下嘴：“您会知道很多，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带您一块儿去。保证会有十分有趣的场面……和不错的晚餐。一起去吧，您肯定不会后悔的。”

“上哪儿？”

他露出傲慢的神色。

“圣彼得堡有个非听觉音乐协会。是的，非听觉。没听到过这个术语？可以理解。此项发现暂时保密……”

他改变了刚才那种词藻华丽的高傲腔调，恢复了自己平常的口气：“去吧，您不会后悔的。干吗要解释——您自己会看见一切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事可做。我去了。

……我们走进某幢别墅昏暗的门。看门人默默地向我们鞠躬，脱下我们的大衣。仆人也是默默地领我们穿过陈设不多但

却贵重的几个房间。

我感到不自在：没有人邀请我，而且穿着灰西装出现在陌生人房子里……

“胡说八道，”齐布利斯基回答说，“这儿不以貌取人。这儿更高级些，看一个人的精神实质。喏，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一些人……当然，看书一点也看不懂，这已是‘全人类的通病’，但是追求的心理是美好的……”

……在一间很大的不太明亮的客厅里约有二十来人。几位女士穿着黑裙，胸饰稍稍浆烫过，其他人穿戴朴素些，但也都彬彬有礼，一副有修养的样子。

人们用轻微的鼓掌声欢迎齐布利斯基。他傲慢地行礼致意，和一些人握了握手，他做这一切时都是默不作声的，就像在无声电影里一样。“聋哑人，”他用耳语对我说，“所有人都是聋哑人。他们准备要听的时候，别大声说话，这会激怒他们的。当然，这不是嗓音说出来的，而是动作，嘴唇的动作。神经过敏的一帮人。您就坐在那里，马上开始了。”

……仆人发出拨动开关的响声。灯灭了，台上突然亮起直径为半俄尺的圆面浅灰色灯光。[2]这暗淡的灯光勉强照亮类似一架钢琴的高大乐器，以及乐器后面齐布利斯基臃肿的身躯。其余的一切都淹没在黑暗之中。全场鸦雀无声。

瞧，齐布利斯基使出全力敲击琴键，听见的不是音乐声，而只是低沉的敲击声。突然，圆面追光亮了——金灿灿的橙黄色，后来是蓝色，快速地闪过各种各样的红色，从浅玫瑰色一直到大红色……

这就是它，非听觉音乐！无声的琴键在齐布利斯基手指的强烈敲击下发出干巴巴的噼啪声。橙黄色、蓝色、红色、绿色——在极其刺耳的声调中，在圆面追光中一一闪过。

突然……大厅里听到某种呼哧声、沙沙声、轰鸣声。聋哑听众们开始伴唱。

起初是胆怯的，轻声的，后来越来越响。唔唔叫的不和谐的噪音不断地增强，并且越来越不和谐。已经不是唔唔叫——而是狗叫声，羊叫声，人的喊叫声，狼的嗥叫声，声嘶力竭的喊声充斥着大厅……

圆形追光不断闪烁着，当它突然闪亮时，能够看得见听众。所有人脸上的表情不是极乐就是恐怖。一些人大声哭喊，用嘴做出怪异动作；有几个人仰面跌倒在地，双手抱住头部；另一些人全身不断晃动；还有些人两手来回摆动，就像在指挥合唱团……

看门的聋哑人收下我赏施的20戈比硬币后，发出可怕的哞哞声表示感谢。我穿衣时，齐布利斯基在外厅追上了我。

"您要离开？害怕了？多愚蠢的事?！我再给他们演奏二三支曲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晚饭。留下吧，说真的。如果您没耐心听，那就在随便什么地方找一个房间坐一会儿。"

我借口头痛，并且，事实上，头的确开始痛得要裂开了。齐布利斯基耸了耸肩膀。"那么，再见了，这么说，不喜欢音乐？顺便说一下，您知道我演奏的是什么，他们唱的是什么吗？要知道他们在音乐会之前就准备好了，根据乐谱学会了第九交响曲！……"

注释：

① 演奏黄雀——演奏最起码的儿童乐曲。

② 俄尺——旧俄长度单位，=0.71米。

第五章

名片上写着: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普罗宁——美学博士,Honoris Causa。其实,在女仆转递给您名片,您还来不及读一遍这个响当当的尊号时,兴高彩烈、容光焕发的"美学博士"已经将您拥抱在怀里。对普罗宁说来,拥抱和来几下清脆的碰着哪儿就哪儿的亲吻是问候的合乎情理的形式,就像同不太热情的人握手那样。

吻过主人之后,他把帽子扔在桌上,手套扔在角落里,围巾扔在书架上,开始叙述某项计划。为了完成这项计划,他要求您不是出钱,就是张罗,要不一定参与。没有计划普罗宁是不会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拜访朋友,——他是个极其善于交往的人,而只是时间不够。他总是有什么事,并且显然是刻不容缓的事。事情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和思维。一旦一件事情不再使普罗宁感兴趣的话,就会有新的事情机械地跳将出来。哪里还顾得上友好的拜访呢?

普罗宁对所有的人都称"你"。"你好"——在"野狗"俱乐部门口他会拥抱突然遇到的随便什么人。"你怎么多日不见了?日子过得怎么样?快走,我们(向空间做了个很大的手势)的人

都在那儿……”

首次来到“彼得堡艺术协会”——正式名称为“野狗”的来访者——律师或者工程师，遇到这种情况都大为吃惊或感到荣幸，他们不安地四面环顾一番：“我初来乍到，也许把我当作另一个什么人吧？”然而普罗宁已经走远了。

要是问普罗宁：“你现在是同谁在打招呼？”

“同谁？”他满脸堆笑，“鬼才知道。一个下贱的人！”

这样的回答是最有可能的。然而，“下贱的人”在“美学博士”口中并不带有侮辱人的意思。而且他拥抱随便碰到的一个人并不是出于什么企图，而是由于精力充沛。

普罗宁带着方案来了，连珠炮似地向交谈者发问。别指望企图反驳他、打断他或者提个问题。“你明白……你知道……我发誓……绝妙极了……不可思议……三天……梅伊尔霍德……市长……伊达·鲁宾施坦……韦尔哈……预算……苏杰伊金……妙极了……”他那不停地笑着的嘴连珠炮似地说着。很少有人不被这种场面惊呆，也很少有人拒绝他，特别是第一次。

“绝妙”的事当然没有成功，显然是由于“小细节”。普罗宁并不泄气。现在一切都作出规定。绝妙……不可思议……令人惊叹……里查·施特劳斯……

有丰富阅历的、被迷惑的人犹豫不决。

“要知道上一次照您的话来说，一切也都将安排好的。”

“哎呀，我的天哪，这算什么人哪，”普罗宁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不想理解简单的事情。要知道那时是失败了，因为他进行阴谋活动。现在他是我们的人。现在进行的一切将是不可思议的，你定能看到……”

有人边叹气，边重新开支票或者去部里张罗，或者写剧本，尽力参与这台空转机器的运转，这台机器被叫做鲍里斯·普罗宁

的活动。

然而，机器不完全在空转。这台看上去能磨数百普特东西的粉碎机不管怎么说还是磨了一些小碎粒。最终获得“一点东西”，或者正如普罗宁所表达的“滚上一点东西”。

于是“这些东西”按顺序出现了——“幕间剧之家”，然后是“野狗”，最后是“演员休息地”。在它们身上花费的精力，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其实是不少的，尽管不清楚究竟是多少。

普罗宁忙忙碌碌地张罗安排“演员休息地”。“机器”拼命地运转。工人要钱，钱没有；某个军事机关派士兵来清理场所，原来，这个军事机关有权拥有这个场所；四面墙上有水溢出来（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是从刚刚安装好的壁炉里也淌出水来：没有壁炉究竟该怎么烘干墙壁？

抽水机在抽水。浸湿了的劈柴被取走了，堆满了新的柴火，水来自莫依卡河，“休息地”坐落在小河拐角处。这些干柴又被淹没了。普罗宁衣衫不整，脱了西服上衣，不顾寒冷（激动时他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脱下上衣），穿着雪白雪白的细麻纱衬衫，领带歪到一边，全身被烟黑和颜料弄脏了，但他仍在命令，喊叫，打电话，撵走士兵，并向泥瓦工发誓明天（这个明天已经拖了近六个月了）他们一定会拿到钱，他自己一会儿卖力地揿抽水机，一会儿在点不着的柴火上浇汽油……

他热情地迎接来拜访他的人，并且领他们去看自己的房地产。

普罗宁指着四壁满是褐色痕迹、地板尽是石灰土浆的泥泞不堪的拱形房间说：“这是——‘威尼斯大厅’。它将由苏杰伊金大师来布置。基调是黑色的，再饰以金线。那里是舞台。没有任何粗俗的椅子——只有无靠背的丝绒般的板凳……”

“那样将多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板凳嘛,有低矮的,倾斜的,威尼斯式的……不过没关系,自己人将坐在后面,椅子上。而这个是专门给资本家设的——10卢布一张票的位子……

“而这里是蒙马尔特尔小酒吧。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一切都将安排好,惊人的安排。你瞧,煤气管道已经铺好,完全像在巴黎一样。”

墙上凄凉地立着煤气“喷嘴”,整个天花板上都有电工工作时留下的痕迹。这个角状物在整个住所里是唯一的。

“专门安装的,”普罗宁高傲地敲打这角状物说,“花了7百卢布,不得不铺设专门的烟道。然而论排场完全同巴黎的一样。资本家将在这里抽烟,发出惊叹声。”

“这里是什么?”

普罗宁自己还没决定,这里,小酒吧和威尼斯之间将是什么。但他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

“这里,这样的,这个角落放点织物,地毯,宽大的沙发……”

“而这个房间使人想起浴棚。”

“浴棚?”普罗宁眯缝起眼睛说,“浴棚?妙极了！令人惊叹！正是的,这里将是东方浴棚。明天我吩咐毁掉游泳池,放满水(水倒是足够的)！彩色的墙壁,玻璃……池子里天鹅游来游去……光线从上面打下来……”

“喔,光线从上面打下来,难以安装……”

“一点也不难,凿穿天花板。”

“这要凿穿六层楼?”

“这有什么?我把所有住宅拆掉,凿穿……然而,我只是幻想……”

“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跑进来一个童工匠,脸上的表

情既担忧又兴奋,“水!”

“啊,见鬼!”普罗宁同自己的帮工一样,也是既兴奋又担忧的样子,向“威尼斯大厅”跑去。从那儿传来淹没地板的低沉的溅水声。

普罗宁本人未必想到要放弃米哈依洛夫斯基广场那住惯了的地下室,并且去从事莫伊卡河和马尔索沃广场拐角处的“黄色炸药爆破”工作。“野狗”是他身心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身心的话。事情进展顺利,也就是说,房东是个和善的人,温顺地等着理应归他的报酬,利用免费出入自己地下室的权利和“野狗朋友”的荣誉称号来抵销利息。餐厅老板,意大利人弗兰切斯科·塔宁,也甘心情愿拨出自己的酸葡萄酒和非优质的白兰地让来客在读书时饮用,他聊以自慰的是,至今他那半空着的小餐馆成了整个彼得堡漂泊文学艺术家的总部所在地。然而,大部分新的来访者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支付现钞,多数情况吃饭都是赊账的。

在这位弗兰切斯科·塔宁那儿常常临时安排酒宴。比如,有一次,普罗宁早上起来,发觉今天是他的命名日。但是打电话或者发便函都已经太晚了。普罗宁就这样做:他沿着涅瓦大街向阳一面散步,邀请所有他碰上的熟人。普罗宁的熟人相当多。到了约定时间,“弗兰切斯科”又小又挤的地方塞了近60个愿意来庆贺“亲爱的过命名日的人”的客人。他们把桌子移到一起:有点酸的卡别尔奈红葡萄酒,有点混的沙勃利白葡萄酒、不特别名贵但神秘莫测的法国公司“主角”的非常浓烈的白兰地都被喝上了,当然还有基扬季酒。“过命名日的人”喝,他的“朋友们”喝,老板喝,可尊敬的像著名小提琴手的白发意大利人也喝,最后“统统吃光喝尽”。酒馆该打烊了。给普罗宁递上帐单。普罗

宁用他那不听使唤的手指展开账单。

"这是……这是什么呀?"

"账单,先生,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

"而这是?"手指像鸟一样在空中晃悠一阵,选地方想坐下,指着账单数目。

"200卢布,先生……"

惊奇和恐怖的神色在"过命名日的人"带点傻气的脸上闪过。他沉默了一分钟,然后激动人心地喊道:

"卑鄙的人们! 究竟谁支付! ……"

不,普罗宁本人未必会自己想离开米哈依洛夫斯基广场的。改换"野狗"的简朴房间的想法,把草凳子、桶箍的枝形吊灯架换成"休息地"的威尼斯式大厅和中世纪小教堂都是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授意的。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肖像,出自"休息地"的"小薇拉"的肖像,只应当由索莫夫来画,而不是别人。

无论艺术时尚的严格维护者如何冷嘲热讽,索莫夫是自己时代,即悲剧性的令人陶醉的"皇家彼得堡"黄昏岁月的最非凡的肖像画画家。

我是这么设想这幅未画完的油画的:半小时之前在杰利克罗理发师那儿刚精心烫过黑黑的头发,——已经有点散乱;非常露的束胸从一只肩膀上慢慢地滑落下来,刚好看不见乳房;束胸是黑色的,一个角深深地插入大红的丝绒裙子里;白得出奇,就像漂白了的一双胖乎乎的手,软弱无力,又不好意思地紧贴在心脏一边的胸口上;整个姿势也是说不出的一种软弱无力,说不出的不知所措的松软。某种不入时的旧式东西:巴黎连衣裙的褶

纹像钟式裙贴在身上,长长的卷发使人想起假发。

微微眯缝起来的一对灰色眼睛,微笑着的一张小嘴巴,在这笑容中含有某种诡诈……

战前不久韦尔哈尔来到彼得堡。依照惯例,朋友们亲切殷勤地招待他,也是依照惯例,招待会开得杂乱无章,甚至对于著名的客人来说似乎是不快的,就是说负责招待的想法是最好的,他们是认真张罗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事情本身的发展变化却未遂人愿。宴会刚开始,大家就都这么觉得——组织者,被邀请者,并且好像韦尔哈尔本人都这么觉得。一些针对"亲爱的大师"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在刀叉的碰撞声和骂骂咧咧声的伴奏下,无缘无故的"乌拉"从远处桌子的尽头传来,那里,社会地位低下的文学同行在及时地痛饮。"小雅拉斯拉夫人"的"餐具",洗过蒸浴戴着线织手套的仆人,过多的质量不太好的葡萄酒酒瓶……总之,这次宴会还是不举行为好。

几乎所有的出席者我都认识,至少知道他们的面孔。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与韦尔哈尔坐在一起的是位我完全陌生的女士。她穿着豪华,别具一格,耳朵上戴着闪亮的钻石,一对灰色眼睛眯缝着,两片小嘴唇含着笑……

这是谁?我问了旁边人,他不知道。还问了一个人,也不知道。韦尔哈尔按老年人习惯皱着鼻子,殷勤地、兴致勃勃地与这位陌生女人交谈。他不听对他的欢迎词,因为讲话中每隔三个词就会出现一次"乱七八糟",每隔五个词就有一个"吹得天花乱坠"。

她会是谁呢?恰巧普罗宁走过,响当当的普罗宁——"美学博士","野狗"经理,他那燕尾服的背心钮扣已经解开,满面春风,两只手都捏着香槟酒瓶的细颈……

“鲍里斯，这位女士是谁?”

什么事都有份的美学博士耸耸肩膀说：

“不知道，并且谁都不知道。自己来的，自己坐在韦尔哈尔旁边……”

接着，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

“也许这是他的妻子或者(得意的笑容)，或者……外孙女。”

看来普罗宁很快就确认自己对神秘女士猜测的错误。至少过了半年，当彼得堡出现了另一位感情丰富的客人——波尔·福尔时，普罗宁在给他介绍认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时这么说：“这是‘野狗’的女主人和狗的情人。”(原文为法文，含双重意思。——译者注)

他想说——“野狗”的女主人。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已经是放荡的快活的“美学博士”的妻子了。

当我们熟悉以后，我听到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下述自白：“我会同意经受任何痛苦，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温迪那一样，处处经受痛苦，就同滚钉板一般。我只要支配权，支配人们的权利……”

“支配灵魂的权力或者……喏，像县警察局长或者沙皇那样?”

“啊呀，任何权力！开始我只要一点点权力，甚至就像县警察局长那样就够了。即使那样的权力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只要善于利用……”

“您最好去墨西哥，B.A.(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俄文缩写——译者注)，在那里，这是可能的，选妇女当省长。”

但是她没听我说。

“权力，”——她说的时候拖着长音，就像在掂这个字的分

量,“权力……支配灵魂？但是,要知道任何权力都是支配灵魂的。控制任何人,都意味着贬低他。贬低他就是抬高自己。周围人的屈辱感越多,贬低人的人就越高……”

她笑着。

“您干嘛这么看着我？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是从巴尔扎克那儿读到的,也许是于斯曼……”

同时,她神秘地,就像透露秘密似地说：

“权力——这是金钱。在世上我最想要的是金钱。”

“大家都想,B.A.。”我同样以那种神秘的耳语的声调回答她。

她在跺脚。

“别说了。难道我是那么想要吗？并且,顺便说说,您知不知道,谁是我童年时心目中的英雄？”

“卢克列齐娅·波尔日阿？”

“不,捷列扎·埃姆别尔。”

并且,她“用脚后跟敲着镶木地板”说：

“挖苦人是最甜蜜的。”

由于法兰西鞋后跟敲击地板,蓝瓷碗在涂漆的小桌子上震得一跳一跳的。一只小小的、胖乎乎的、仿佛漂白了的手把装着蛋糕的盘子递了过来……

“我当然是在开玩笑。我是最普通的一名妇女。甚至想当演员的意志都没有。更不用说……”

一双灰色眼睛冷淡地眯缝着,涂口红的嘴唇微笑着,并且在这笑容里含有某种诡诈。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自从嫁给普罗宁成为“野狗”的女主人和狗的情人之后,马上开始改造一切,在“野狗”俱乐部做改变

和扩大工作。当然，到第三个月，她又开始烦闷起来。

怎么会不烦闷呢？“野狗”是个小地下室，是用熟人凑起来的25个卢布那么一点小钱装修的。要是聚集40多个人，里面就显得狭窄了，要是来60个人，那就连转身都不可能了。什么节目也没有——普罗宁一切安排靠运气——“费佳（即夏里亚宾）答应来唱歌……”要是夏里亚宾不来的话，那么就让穆什卡（普罗宁的看家狗）跳卡特里尔舞……总之，“弄出点”什么来……主要大厅里放着瘸腿的桌子和草编的长凳，没有女佣，来客自己去小卖部端食物和葡萄酒。这些来客大部分是“自己人”——诗人、演员、画家，他们对这种方式感到称心如意，也不想改变它……总之，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野狗”里没事可做。她设想过不妥当地引进某些雅致的新玩意儿，同拥有“野狗朋友”光荣称号的所有人都争吵过，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巴黎服饰来说扮演了过分简朴的角色感到乏味后，按普罗宁的说法，她决定“管教住狗的头颈”。每当夜晚，彼得堡漂泊文艺家中失眠的流浪汉不再叫醒米哈依洛夫路和意大利路拐角处门口看门的人；而在第三院子入口处狭窄的阶梯上，通风器的管子也不再发出声响了：为了吓唬误入“野狗”的“资本家”，上面写着带有不祥之兆的题词：“别碰：死亡！”

他们在马尔索沃广场租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不是为了重整《野狗》，而是为了建立宏伟的、从未有过的、惊人的什么东西。地下室上面搬进了这未来的“宏伟的和从未有过的什么东西的”女主人。住宅也很大，相当高大的窗户，天花板也是非同一般的高。里面冷得可怕。在几层楼上面，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住宅里整天生着炉子，地上铺着地毯，窗、门都挂着用厚料子做的帘子，但不管怎么说，从嘴里呼出来的气仍是一缕缕的雾气。而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住宅里既没有地毯，也没有门帘窗帘，时常

没有木柴,甚至窗子也没有全封住。从早到晚石匠的锤子震耳欲聋地在下面敲着。从早到晚正门和后面的扶梯上有一些人不断地扯着铃,他们想照单收钱,但没什么可支付给他们。普罗宁因寒冷和无事可做而睡觉,身上盖满了所有的大衣,而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卷起了头发,化好妆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挂着一层冰的镜子前面,不知幻想着什么——幻想着未来的演员'休息地'(新的卡巴莱酒吧间就这么称呼的),或者幻想着支配灵魂的权力……

因为寒冷,她用毛茸茸的貂皮大衣裹着身子。然而,貂皮大衣有时在当铺,那样的话,她只好用被子裹起自己。

"怎么,B.A. 您在这里还乏味吗?"

"非常乏味。"

"还觉得挤吗?"

"是的。"

"那好,您还将改造和扩大吗?"

"我已经租下隔壁的地下室了。夏天把墙打穿,到那时画廊将延伸到威尼斯大厅。在这画廊里……"

她挥起一只手。

"我不知道,也许不再改造,或许留给鲍里斯,让他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离开,随便去什么地方……

同时她高高地扬起描过的眉毛:

"厌倦了。乏味……"

"休息地"的外貌是豪华的。肮脏不堪的地下室连同拆毁的墙壁真的变成了某种"神奇的王国"。光线从网状花纹的伪装下面隐隐约约地照射到黑—红—金色的苏杰伊金大厅;"小餐馆"全被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画满了惊人的巴黎水彩壁画,——混

合厅用雅科夫列夫的画装饰。古色古香的家具、锦缎，取自古教堂里的木制塑像，几座小扶梯，几个角落，几条神秘莫测的过道——这一切都作了惊人的构思和制作。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丝绸衣服，戴着钻石，兴高彩烈地欢迎来宾——看，怎么样？普罗宁神采奕奕。他穿上燕尾服，带领来访者参观“休息地”各种各样奇迹。他介绍什么东西时都特别热烈，按老习惯抓起翻领，接着马上放开。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在“野狗”完全是自然的，而在这里就不体面了。

“野狗”的老主顾在最初的欣喜之后，因不习惯新地下室的风格而对它有点冷淡了。在“野狗”里谁想坐哪儿就哪儿，自己去小卖部取食物和葡萄酒，自作主张地把盘子随便放到什么地方……而在这里，在有舞台的主要大厅里，位子是对号人座的，有人电话订座并付了昂贵的费用。而所谓“彼得堡艺术协会的先生女士”可以从另一个房间看戏。在这里，您还没来得及坐下，仆人带着餐巾和菜单飞快地来到你面前，一听见您说“不想”要点什么，就用自己浆硬了的餐巾对着“非站着的”客人的鼻子发出啪啪响声。

……卡尔萨温娜在微笑，跳着自己迷人的“波利卡舞曲”。黑—红—金黄色的墙壁融为一体。音乐，掌声，拔瓶塞的喀嚓声，玻璃杯的相碰声……突然，皮肤松弛、喝醉了的作曲家齐布利斯基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双手捧着杯子：“请请求发言……”

“为狗的亡灵祷告，先生们……”他那发僵了的舌头开始说话，“可怜死者……鲍里斯……唉，鲍里斯，为什么你自找麻烦……为什么把这些药剂师都叫到这儿来，”他的头朝前几排穿晚礼服的人点了点。

总之，餐馆被布置得颇具美感，非常美，不过总归是餐馆。

观众很喜欢，观众买贵的门票，喝香槟，看叶夫列伊诺夫穿苏杰伊金式服装……

也好，既然来了就喝香槟。

我回忆起："我最要金钱……"

但是突然，这"休息地"上面的住宅，东印度公司的所有瓷器，所有相当露的服饰原来都是被查封的财产。原来"休息地"不仅没收回本钱，而且遭受可怕的亏损。所有资助人都放弃了它，一星期后，"休息地"被拍卖了。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疲惫地扬起眉毛：

"就这样，不知道，钱不够。我签了期票……"

但是过了几天她遇到我时很快活。一切都成功了。找到了新的资助者，为了准备节目，"休息地"暂时关门大修理。

她站在装饰着雅科夫列夫画的中世纪式的大厅里，靠在一个木制的神像上，一只胖乎乎白得出奇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古色古香的刀，这把刀是古董商刚刚寄来的。

"卢克列齐娅·波尔日阿。"我开玩笑说。

她笑了起来：

"啊？您记得上次的谈话？不，不，不是卢克列齐娅……是捷列扎。喏，看一下。"

我展开纸。

"这是什么？"

"同新资助者的协议书。他有义务一直向我支付，只要'休息地'关着，每月支付……"她说了个很大的数目。

"只要关着？"

她哈哈大笑起来：

"天哪，多幼稚啊！要知道期限没指明，我可以一生不让'休

息地’开张,那么他将一生向我支付……”

“他怎么会签这样的东西?”

她装腔作势地咬着嘴唇:

“噢,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我父亲的朋友。他没看就签字了……”

不知道最后“讨人喜欢的人”是否提出抗议,或者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本人又想经营,后来“休息地”还是开张了。1917年夏天,还是在那张“演员”桌子旁坐着高尔察克、萨温科夫和托洛茨基。而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这个交际场合看上去已是十足的卢克列齐娅。

这几天她非常活跃,非常好看,仿佛她又不“乏味”了,她仿佛开始觉得某种新的“声势浩大”的东西和“机遇”来了。我是从她的样子上推断出的,她没有同我交谈:她有了一些更有趣味的交谈者。

“休息地”拥有了在鼎盛时期所缺乏的灵魂,但还是好景不长,处在毁灭前夕。1917年末1918年初去过那儿的人,恐怕都不会忘记那些夜晚。

天寒地冻,半明半暗。既没有预订的小桌子,客人口中也没有雪茄烟,也没有营养充足的脸。豪华的家具,破旧的墙壁。电灯不亮——有些地方粗粗的蜡烛在淌油……

演员正在排练《绿鹦鹉》。在这样的气氛中演出这样的话剧,思想不是很敏锐吗?施尼策莱罗的台词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演员来说,听起来太有“说服力”。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脸色苍白,没有佩戴贵重饰品,穿着黑裙子,两手交叉在胸前听着。是她想出来排练《绿鹦鹉》的。

天寒地冻,半明半暗。从街上传来枪声……突然从墙外传

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用枪托撞击大门的声音。10个红军战士，在一个背着枪不成体统的女人的指挥下闯进“威尼斯大厅”，“公民们，拿出你们的证件！”

卢那察尔斯基签字的一张什么纸使他们有所克制。离开时他们埋怨说：“等着吧，我们会收拾你们的……”一切又重新开始——淌油的蜡烛，阿赫玛托娃或者博特列尔的诗歌，德彪西或者阿尔图尔·卢里耶的音乐……

……“休息地”并没有关闭，但却毁坏了，散架了，变成过眼云烟。由于烧壁炉，房间里潮气大增，镀金层因此脱落了，地毯开始腐烂，家具脱胶。饥饿的大老鼠变得不怕人地在房间里乱窜，钢琴受潮，窗帘破损……

一个冰雪消融的日子，不知哪些管子破裂，莫依卡河的水，这一破墙的宿敌，把它们全淹没了。

……没抽出来的水，
仍留在“休息地”。
您知道吗？您去过吗？
难道从未去过？

第六章

“园亭”。通常的晚上忙乱时分，我在找有空位的小桌。突然，我的眼睛与过去什么时候曾非常熟悉的一双眼睛（彼得堡，下着雪，1913年……）、俄罗斯的灰色眼睛相遇。这是苏杰伊金娜，著名画家的妻子。

“您在这儿！很久了？”

笑容——漫不经心的“彼得堡式的”笑容。“一个月了，从俄罗斯来。”

“从彼得堡来？”

苏杰伊金娜——阿赫玛托娃的女朋友。当然，我最初的问题之一是阿赫玛托娃的情况怎么样？

“阿尼娅？还住在那里，在夏花园附近的丰塔克。很少到什么地方去——只去教堂。当然还写作。出版？不，她不想。现在到哪儿去出版……”

……在丰塔克……夏花园附近……

1922年秋。我将出国，我去阿赫玛托娃那儿告别。夏花园里呼啸着秋天的声响。工程城堡沐浴在红色晚霞之中。多么空虚孤单！多么惊慌不安！再见，彼得堡……

阿赫玛托娃向我伸过手来。“我在这里不点灯闲坐着。远走高飞吗?”

她那清秀的侧影显现在黑洞洞的窗口,肩上披着著名的深色大玫瑰花头巾:

从你的双肩滑下,啊,
费德拉,拟古典的披肩……

“您要走了吗? 请代我向巴黎致意。”

“而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不打算离开?”

“不,我不离开俄罗斯。”

“但是要知道,生活越来越艰难。”

“是的,越来越艰难。”

“可能会变得完全无法忍受。”

“有什么办法。”

“不离开吗?”

“不离开。”

……不,不打算出版,——现在到哪儿去出版……很少出门——只去教堂……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越来越糟。

生活就是这样的——什么都得自己去做。她本可以去南方,去意大利。但是到哪儿去弄钱。如果有的话……

“她不离开吗?”

“不离开。”

“您知道吗,”一双灰色眼睛几乎是严肃地看着我,“您可知道,有一次,阿尼娅走在莫霍夫路上,拿着大口袋,好像是面粉。累了,停下来歇歇脚。那是冬天,她穿得很少。有位妇女路过……递给阿尼娅一个戈比:‘拿着,看在基督的面上。’阿尼娅把

这个戈比藏到圣像后面,收藏着……"

1911年。在"塔楼"——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住宅中举行例行的文学界聚会。彼得堡诗坛的全部"精英"在这里聚会。诗人们按圈子朗读诗歌,"塔夫利达宫的聪明人"从夹鼻眼镜下面眯缝着眼睛,不时抖动着浓密的金色长发,插嘴说着俏皮话,其间大部分是极其礼貌的插科打诨。俏皮话的辛辣只有一点才能冲淡——它是那么刻薄精确,不可能不同意。相反,赞扬话极其罕见,略微的赞同也很少。

按圈子朗读诗歌。名人和初出茅庐的新诗人都读。轮到一位肤色黝黑、机灵的年轻太太。

这是古米廖夫的妻子。她"也写"。不用说,作家的妻子总是写作,画家的妻子同颜料打交道,音乐家的妻子演奏。这位长得黑黝黝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似乎并没有丧失才能,还是小姐的时候就写出:

对谁而言,这苍白的嘴唇,
将成为致命的毒剂?
傲慢和粗鲁的黑人,
背地里调皮地窥视。

多可爱,不是吗?不明白为什么古米廖夫听到人们讲她的妻子是女诗人时那么生气?

而古米廖夫是真的生气。他也把她的诗看作是"诗人妻子"的怪癖。这种怪癖不合他的口味。有人夸奖时,他讥讽地微笑。你们喜欢?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在十字布上刺绣也非常好看。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您读一下?"

"现在"在座的人的脸上泛出了故作大度的笑容。古米廖夫一副不满的神情,用香烟敲着烟盒。

"我读。"

黑黝黝的脸蛋上现出两个酒窝,眼睛不知所措地但高傲地看着,嗓音有点颤抖:

"我读:"

我的胸部软弱无力,瑟瑟发冷,
然而我的脚步却轻盈如飞。
我把手套从左手
戴上右手……

人们脸上是淡漠殷勤的笑容。这当然不严肃,但很可爱,不是吗?——古米廖夫扔掉没抽完的烟。两只酒窝更深地显现在阿赫玛托娃的脸颊上……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会说什么?很可能什么也不说,沉默一会,指出某种技巧的特点。要知道他让一些真正严肃的诗歌承受无情的评判。而在这里……干吗平白无故去得罪……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沉默片刻,然后站立起来,走到阿赫玛托娃跟前吻着她的手。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我祝贺并欢迎您。这首诗的诞生是俄罗斯诗歌的一件大事。"

在摆着非常好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家具的阿尔卡季·鲁马诺夫办公室里,挂着刚刚出名的画家阿尔特曼画的很大的一幅油画:鲁马诺夫花了对于新画家来说是"惊人的"一笔钱,买下这幅肖像,从而为阿尔特曼的成名奠定了基础。

几种有细微差别的绿色，刺眼的冷色，甚至不是孔雀石——而是硫酸铜。画上的粗线条隐没在这些不安分的绿色的角和菱形里。这里应当画出树、树叶，但它们不仅不像，而且相反，似乎是某种敌对的东西：

在原生昏暗的海洋中，
没有云彩也没有绿色的草地，
而只有立方体、菱形和角，
还有折磨人的金属的丁当声。

刺眼的硫酸铜的颜色，铜的折磨人的声响——这是阿尔特曼的画的背景。

在这背景上是一位妇女——高高的，清秀的，苍白的。锁骨显得很突出，像漆一般黑亮的头发盖住了额头直到眉毛，黝黑苍白的脸颊，浅红色的嘴唇，微小的、发亮的鼻孔，打量着四周的双眼冷淡而又呆滞地望着——就像看不见周围的东西。

……只有立方体，菱形和角。

而且她脸上所有线条，身体所有线条——都棱角分明。棱角分明的嘴，棱角分明的背影，手指的棱角，臂肘的棱角，甚至细长的脚的脚背都有棱角。难道生活中有这样的女人？这是画家的虚构！不，这是活生生的阿赫玛托娃。您不相信？那么晚些时候，早上四点左右您来“野狗”俱乐部吧。

是的，我爱它——那夜间的聚会：
小桌子上冰凉的酒杯，

无奶咖啡蒸腾出精美扑鼻的香味，
红彤彤壁炉中散发出污浊的冬天的热气，
开心的文学俏皮话，
朋友最初的目光束手无策和害怕。

早上四五点钟的俱乐部里，弥漫着烟草味，到处是空的酒瓶。一小时之前这里还很开心、热闹——有人自己给自己伴奏唱些傻里傻气的讽刺歌曲，有人喊着还要葡萄酒。刚才喧哗的人有的走了，有的在打瞌睡。地下室里一片寂静。

很少有人坐在大厅中央的小桌旁边。多数在各个角落里，靠着五彩缤纷的绘饰墙壁，坐在被钉死的窗子下面。

小窗永远被钉死，
那外面有什么——蒙蒙细雨还是暴风雨?

在那里，在大街上，在彼得堡，在世界上，不都一样吗……由于喝醉了酒头发昏，烟遮蔽了眼睛，谈话小声地进行着。

这里许多锁链被打开，
地下大厅将保留一切，
夜间所说的那些话，
别人早上决不会说。

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狂妄的音乐声。瞌睡的人哆嗦着。酒杯在桌上跳动着。喝醉了的音乐家竭尽全力弹击琴键。弹击，中断，现在在弹奏另一个轻轻的、优伤的曲子，弹奏者满脸通红，汗水直淌。泪水从怡然自得的茫然的双眼滴到烈酒并玷污了的

琴键上。

早上四点多。“野狗”俱乐部。

阿赫玛托娃坐在壁炉旁。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无奶的咖啡，抽着细细的香烟。她是多么苍白啊！

是的，她非常苍白——由于疲劳，由于喝酒，由于强烈的电灯光。嘴的两角下垂，两边锁骨非常突出。两眼冷淡呆滞地望着，似乎看不见周围的一切。

我们大家都是这里罪孽深重的人，放荡的男人，
我们在一起是多么的愁闷。
四壁墙上的鸟和鲜花
在云间心旷神怡，

但是——

在原生昏暗的海洋中
没有云彩也没有青青的草地。

草地、云彩、生活、笑声——一切都留在那里——“永远被钉死的小窗”外面。这里只有：

开心的文学俏皮话，
朋友最初束手无策和害怕的目光……

过分开心的俏皮话，过分害怕的目光。

阿赫玛托娃从来不一个人坐着。她身旁是朋友们，爱慕者，恋人们，戴着大礼帽、有着容易使人上当受骗眼睛的太太们。自

从她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家值得纪念的晚会上用失控的嗓音朗读诗歌至今已过去了两年。她是全俄大名鼎鼎的人物。她的名声越来越大。

香烟在细巧的手中冒烟。裹着披巾的双肩因咳嗽而颤抖着。

“您冷吗？您受风寒了？”

“不，我完全健康。”

“但是您在咳嗽。”

“噢，这个？”她的脸上显出疲惫的笑容。“这不是感冒，这是肺痨。”

她撇开惊慌不安的交谈者，扭身转向另一位：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提着大口袋，停下来歇歇。有位妇女……

……穿着晚礼服的年轻人恭恭敬敬地、留神地捕捉阿赫玛托娃所说的每一个字。一双双钟情的眼睛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阿尼娅把这个戈比藏了起来……收藏着……

古米廖夫家在皇村有栋房子。从外表看跟大多数皇村的别墅没什么两样。二层楼，外墙灰泥塌落，墙上爬着野葡萄。但是里面却宽敞，暖和，方便。旧镶木地板不时地轧吱轧吱作响，镶有玻璃的餐厅里放着粉红色杜鹃花。炉子烧得挺旺。图书室里宽敞的大沙发，书架高到天花板……房间很多，一间间不知是不是书房，里面有堆成山的软靠垫，光线不明不暗，散发出图书、旧墙、香水、灰尘的气味……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了寂静，这是鹰钩鼻的白鹦鹉在自己笼子里发怒。就是那只她在诗歌中提到的鹦鹉：

现在我变成了小小的玩物，

就像我那只玫瑰色的鹦鹉。

“玫瑰色的朋友”扑棱扑棱抖着翅膀发怒。“玛莎,把头巾披在它的笼子上……”

在家里,也很少可以看到完全另外一个样子的阿赫玛托娃。

古米廖夫家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5月底,之后,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我是那么高兴,”阿赫玛托娃说,“今年我们不去国外。上次在巴黎烦闷得差点死了。”

“烦闷?在巴黎?”

“是的。科利亚整天整天跑什么奇风异俗博物馆。我对奇风异俗无法忍受。我被博物馆搞出了偏头痛。一个人呆着,常常是那么的寂寞。我甚至为自己养了只乌龟,我看着乌龟爬。反正也是一种娱乐。”

“阿尼娅,”古米廖夫用不满的口气打断了她的话,“你忘了,在巴黎我们几乎天天去剧院,去饭馆。”

“即使是每天晚上去,”阿赫玛托娃戏弄他说,“也总共只有两次。”

接着像小姑娘一样地笑着。

“您现在多么不像阿尔特曼为您所画的肖像上的自己啊!”

她嘲笑地耸耸肩膀。

“谢谢您,希望不像。”

“您那么不喜欢它?”

“肖像怎么啦?那还用说。究竟谁喜欢看见自己成了个绿色的木乃伊。”

“但是有时候,相像看上去是令人惊异的。”

她又笑了:

"您在对我说无礼的话。"她打开照相本。

"而这里,有相似之处吗?"

相片还是在结婚前拍的。快活的姑娘的脸……

"在这儿,您是那么的高傲。"

"是的! 那时我很高傲。现在谦逊了……"

"您曾为自己的诗歌而自豪吗?"

"啊,不,什么诗歌。为游泳而自豪,要知道我游起来像条鱼。"

还是那栋房子,还是那间餐厅。阿赫玛托娃还是往那些碗里倒茶,还是递给那些客人。但是,不知怎么,这些脸有些泛黄,仿佛两年间一下子老了许多,嗓音轻些了。无论在脸上,还是谈话中间,一切东西都蒙上某种阴影。

就是女主人也既不像阿尔特曼所画肖像上的颓废派太太,也不像为游起来"像条鱼"而自豪的小姑娘。现在她身上有某种修女才具备的东西。

……在奥古斯托夫斯基森林牺牲了两个军……

"既没有武器,又没有弹药……"

"Z的两个儿子被打死了。"

"听说很快将没面包了……"

古米廖夫不在,他在前线。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读诗吧。"

"我现在的诗歌很乏味。"

她读"摇篮曲":

……睡吧,我的乖乖,睡吧,我的小男孩。
我是个不好的母亲。
流言蜚语很少飞到我家的台阶。

你的父亲得到一枚白色的十字勋章。
有过悲痛，将有悲痛，悲痛无止境。
圣格奥尔基把你的父亲埋葬……

又是两年。我同阿赫玛托娃有二三次相遇的机会。她越来越不像过去的那个她，越来越像个修女。只有她肩上的披巾是原来的——深色的，红玫瑰，"拟古典的披巾"。哪里是什么拟古典披巾———一条普通的女人的头巾，披着是为了肩膀不发冷！

又是一年。纪念普希金的晚会。一次奇怪的纪念会——有人穿燕尾服，有人穿皮袄——在没有烧暖气的大厅里举行。勃洛克在台上讲普希金——激昂慷慨，但听不清楚。阿赫玛托娃站在一个角落里。身上穿着老式的高腰丝裙。瘦瘦的、可怜的、漂亮的脸蛋。她一个人站着。有人向她走来，吻手。多数是沉默的，对她，那样的一位说什么呢。也不问问"近况如何"。

又是半年。斯摩棱斯克墓地。勃洛克的灵柩在花丛中。又是两个星期——在喀山教堂里举行祭祷仪式，悼念刚刚被枪杀的古米廖夫……

……是的，我曾爱过它，那夜间的聚会，
低矮的小桌子上冰冻的杯子……

神香。带泪痕的脸。教堂唱诗班歌手。

……开心的文学俏皮话……
朋友最初的目光……

第七章

电梯里用图钉钉着一张招贴画。上面画着一个鬼，一张笑脸，一对绿的小眼睛和一条雪青色的尾巴。下面是题词：

"请求勿吸毒草(烟)。"

谁请求的？房东？

不，招贴画是三楼的房客——谢尔盖·戈罗杰茨基贴的。

但是怎么会是他在发布命令呢？要知道电梯又不是他的住房？

喏，无论在哪里，怎么支配。谁又会去禁止他呢？

谢尔盖·米特罗凡诺维奇是个那么可爱的人，那么招人喜欢的人。假如房东想给他提意见——怎么提呢？房东会对他说："我很遗憾，应当请求您……"而戈罗杰茨基没听完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您近况如何，亲爱的？夫人孩子怎么样……"

他很爱孩子，给他们画图——类似于电梯厢里的："小鬼在炉子里"，"九只小老鼠和小猫马尼"；瞪着可怕的眼睛，装"羊"舐人逗孩子，当场写出小诗。——你叫什么名字？彼佳？你就听着：

从前世上有个男孩叫彼佳，
现在世上有很多个彼佳。
只有我的彼佳——
曾经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眼睛是明亮的，目光是坦率的，“诚恳的”。一头浅褐色的卷发。嗓音富于旋律。并不漂亮，但比任何一个美男子都可爱。“具有博得好感的外表”，外表并不骗人：的确，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对任何人都热心帮助，对任何人微笑。街上遇到背口袋的老太婆：“老大娘，让我来。”不会错过乞丐。看见小孩马上给糖，口袋里总是放着小糖果……

他帮忙，开个玩笑，笑一笑，继续走自己的路，口中打着口哨或者哼着小调，眼睛发亮，白牙发亮。甚至那顶带耳罩的楚赫纳人的帽子戴在他仰起的头上不知怎么也特别可爱。

“请求勿吸毒草。”然而，给那些死不改悔的抽烟者，戈罗杰茨基在住宅里拨出一间吸烟室。如果有人烟瘾发作，就去那里。那里的门总是紧闭，他们可以在通向后门楼梯的窗口尽情“吸毒”。吸烟室的墙上画满了有教育意义的不幸事故：“顽固不化的吸烟者和他的不幸事故。”画得很出色。总之，戈罗杰茨基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很完美。而且什么事情做起来都不假思索，顺便做做，一边开着玩笑，带着笑容，十分轻松……就是诗歌也是边开玩笑边写成的——名声雀起。躺下去睡觉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岁大学生，早上一觉醒来出版了《春苗》，成了名人，过了一个月，没有人不读过这首诗的：

呻吟声，丁冬声，丁当丁当声，

呻吟声，丁冬声，睡觉打铃声。
陡峭的坡高耸，
陡坡绿草如茵……

……星期二晚上是戈罗杰茨基家的接待时间。吸烟室门口排起了队。人们划火柴，匆忙吞云吐雾，把位子让给别人，回到客厅。那里，房间中央有一张大圆桌。桌上摆着水晶圆柱体的花瓶，里面插着玫瑰，冒着热气的加德纳岛制造的碗盏，以及甜瓜果酱。戈罗杰茨基的妻子，“自然女神”在作家太太们的陪同下，带着几分笨拙的美，胖乎乎的手正在为客人们沏茶。为什么戈罗杰茨基，一个对任何“古典僵尸”抱有敌意的人把妻子称为“自然女神”？又为什么是“自然女神”？更确切地说是谷神……但是这个外号在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身上牢固地确定下来了，尤其是在戈罗杰茨基的一本题献给“你——自然女神”的书出版之后。

沿客厅淡黄色墙壁坐着两排诗人。

两排。下面，无靠背沙发上坐着客人。墙上，客人的肖像跟真人一样大小，这是房屋主人的作品。

如果您认识了戈罗杰茨基，开始去他家作客，并且是位诗人的话，他一定会把您画下来。稍带色彩，但画得很像，“可爱”，而且一定是画在粗席上。

戈罗杰茨基总是画在粗席上——这是他的发明。并且价廉——其中有某种“平民百姓”的东西——他内心感到快活的东西。虽然老百姓是绝对不用粗席来绘画的，——戈罗杰茨基真诚地觉得，在粗席上精心画出的马克斯·沃洛申：穿着常礼服，衣襟上别一朵菊花，比一模一样地画在画布上的他更接近“亲切的充满活力的自然”。

一方面是"自然现象",另一方面是意大利。彩绘的一块块粗席小方块,这难道不是镶嵌艺术品吗?

戈罗杰茨基对意大利的强烈情感,是受了不久前认识的古米廖夫的影响而产生的。现在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一个钟点之前对此还完全是淡漠的戈罗杰茨基,同古米廖夫在"餐厅饮酒谈论"意大利之后,马上就对这个国度"爱恋"得充满热情。他深深爱恋,原因还是充满热情,不即刻亲眼目睹意大利,怎么也不能再在彼得堡呆下去。

一星期之后,戈罗杰茨基已经在威尼斯散步了,抖动着他那卷发,装羊舐人逗"意大利孩子"。没关系——他喜欢。

粗席上的肖像画闪耀出各种色彩。沿墙就座的那些肖像的原型看上去很自然,更加日常生活化。他们分为普通客人和贵宾。前者穿着短大衣,里面是小领子衬衣,用"现已不流行的知识分子死语"谈话。后者拖长声调说话,重音在字母 O 上,穿紧腰细褶长外衣和领扣在侧面的竖领男衬衫。

尽管戈罗杰茨基的观点和爱好变幻莫测,但他有个"志向"一直不变:热爱粗俗的"俄罗斯精神"……他在不同时代无论是用空洞的,还是动听的,或者唠叨的诗歌来"歌颂"都无关紧要。这些诗歌粗俗的实质始终是不坏也不好。"迎接沙皇"与对布琼尼的颂歌没什么区别。把对威尼斯的描述顺便献给"俄罗斯人民的茶馆"……

戈罗杰茨基从人民中发现人才和使自己周围都是人才的意向成为对"俄罗斯精神"好感的自然补充。

要是有名望有影响的彼得堡作家那么友好、那么全面、那么乐意地协助新作家,那看起来有什么不好呢。况且是协助来自农村的在最初阶段最没有经验、最孤立无援的新作家。看起来,

这是件好事。

但是结果都不好，甚至很不好。

结果是这样的。年方十六，生性胆怯，热衷于诗歌的叶赛宁来到彼得堡。他的梦想是成为“真正的作家”。他脚登草鞋而来，但是胸怀摆脱自己一切“愚昧无知”的坚定意念。为了与“城市的”“学者”没有太大区别，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出全力”，给自己添置了“三套马车”。然而他明白，主要的区别不在于衣着。他以自己全部十六岁时的“坚毅”努力抹去这种差异。当然，这种努力也不是没有危险的。——过分努力地“去抹”，会磨掉别具一格的特性和清新的风格。这时非常需要一个对你有好感的和有经验的年长同志的帮助。除了这种职业上的帮助外，还需要另一种帮助——对一个处于完全陌生环境中张皇失措的人伸出友好的手。在传统的彼得堡“寒冷”中冻僵过的叶赛宁和所有“叶赛宁们”，一旦遇到戈罗杰茨基就觉得非常幸福，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农村来的新作家，带着一本“各路作家”的诗歌集，经过一个月的历程，感到困惑不解和失望。

作家们——是一群“冷酷”、漠然的人，他们看待他就像看待文学大军中一名普通的新兵。这种夹着本子来来去去的新人很多很多。勃洛克冷淡的赞许……吉皮乌斯通过单柄眼镜的严厉目光……索洛古勃吹毛求疵的评论——您这行不坏，其它的都不成熟……这些少而又少的夸奖都带有同一段副歌：学习，学习，再学习。创作，创作，再创作……

突然认识了戈罗杰茨基，那么一位知心、亲切、可爱的人，那么“亲近的人”。在第一次同这位亲近的人谈话中就听到他的充分的“过高评价”。从农村来的新诗人(就像任何新人)，自己当然也认为“社会对他估价不足”，但在同“亲近的人”谈话之前未

必明白，这个无情的世界又聋又瞎已到什么程度。原来，他是个天才，这是毫无疑义的。并且，他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天才，而且是全民的，大大高于一般的天才，而且质朴得多。通过顽强的工作来获取成功。这是知识分子、底层人做的事情。而全民天才的事业则是“显示出本能”。就是这样的事业。原来，“愚昧无知”完全不需要抹掉，“愚昧无知”就是“本能”。宁愿从头脑中赶走“死板的学习”，宁愿让草鞋回到脚上，宁愿让紧腰长外衣、手风琴、大胆豪放的四句头回来。[①]

为自己的每个季度由新的“被诱惑的乡下人”充实的“民间学校”，除了家常谈话(“天才”，“超过普希金”之类的话听起来像寻常的赞扬)以外，戈罗杰茨基还安排了公开晚会，可以说是“宫廷盛典”。那里

……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可爱……

主席台上挂着科列佐夫的肖像，上面覆盖着铁皮制的镰刀和木制的叉子。下面是两捆“牧草”(由于使用频繁而显得相当散乱)和一块绣着许多十字架的毛巾。背景用戈罗杰茨基办公室里的小俄罗斯长条粗地毯装饰，以此使主席台“知识分子的无个性特点”不明显，并制造出一种接近“称心如意”的情绪。应当使听众更接近俄罗斯农村的环境，——取消普通的操纵铃，代替它的是一种锣不像锣、鼓不像鼓的东西，带有铃铛……平时它挂在戈罗杰茨基办公室里的炉子旁边。

戈罗杰茨基走上主席台，敲起这面鼓。他容光焕发，充满激情，温柔并带着一副劳神操心的样子。他的鬈发蓬乱，穿着浅蓝色或“红色”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衬衫……眼尖的人有时能看得到

他衬衫下面硬衬领的轮廓——这意味着晚会后他要去“自然女神”喜欢用晚餐的优雅俱乐部，穿着衬衫是为了到时候换浆硬的内衣和戴晚礼服黑色领结时速度快一些。

戈罗杰茨基敲着“鼓”请大家注意。灯光灭了，只有科利佐夫的肖像和两捆草在反光灯明亮的光线照射下。

谢尔盖·叶赛宁……

绣有深红色花纹图案的绿色厚方格布帘被掀开了。叶赛宁走了出来。

他身上也穿着领扣在侧面的竖领衬衫，质地是粉红色的丝绸。金色的宽腰带，波里斯绒的灯笼裤。头发微微卷起，两颊红润。两只手里，噢，天哪！一束纸做的矢车菊。

他双手叉着腰走了出来，全身不知怎么“雄赳赳”地摇摆着。想必已排练了不止一次。笑容豪放……不知所措。这种笑也一定是排练过的。但是他越来越惊慌不安。上台后他一言不发，不安地四面环顾。

“快点，开始吧，谢廖扎。”听得见厚方格布帘后面戈罗杰茨基鼓励的嗓音。“快点，拘束什么?”

真的，拘束什么?

叶赛宁振奋起来。嗓音听起来更有信心。满面绽开豪放的笑容。我是在半年以前见到叶赛宁的，在他认识戈罗杰茨基之前。可是他怎么变了，而且诗歌怎么也变了……

调子，衬字，自动演奏的古斯里琴，自动发声的琴弦……叶赛宁以前未必听到过这些自动演奏的古斯里琴和调子……有时从他朗读的诗歌中跳出一个有伤大雅的“下流猥亵”的字眼。这种字他当然以前就知道，然而因“缺乏经验”便认为，大概，这种字眼不要说是诗歌，就是谈话中夹带进去也是不好的。现在他大胆地喊着，还打量着听众：什么？怎么样？……

谢尔盖·克雷奇科夫……

从合唱队中走出货郎打扮的克雷奇科夫。他拖着长调读，像唱歌的盲人。仍是那些调子，古斯里琴，只是比叶赛宁更呆板，更少些机灵。不久前他也是举止憨厚，诗也写得比较质朴，比较好。现在，真要谢谢指导者，他“找到了自我”，否则的话全完了——准备考大学——背拉丁文……

尼古拉·克柳耶夫……

克柳耶夫在调度室镜子旁匆忙揪下紧腰长外衣，为两颊胭脂补妆。他像芭蕾舞女演员那样将眼圈描得很浓。一双聪明、冷酷的眼睛四周的皱纹（克柳耶夫约四十岁）自然而然化妆成做作的、甜腻腻、傻乎乎的笑容。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快点！……”

“我来了……”他拖长声调回答，恭恭敬敬地画着十字，“我来了……只是有点胆怯，老弟……豁出去啦，上帝保佑……”他一点也不“胆怯”，克柳耶夫是个过来人，知道自己的价值。这只是他在进入“憨头憨脑乡下人”的角色。

后来他从容平稳起来，举止得体地向“诚实的民众”鞠躬，恭恭敬敬地 O 音很强化地开始朗读：

啊，你，鸟儿，天堂的鸟儿，
金色翅膀的德列别兹达……

写这种体裁的唯一一个真正的诗人恰恰被戈罗杰茨基忽略了。戈罗杰茨基读过他的手稿却没引起注意。发现克柳耶夫的是“死气沉沉的”勃留索夫。

可是，克柳耶夫来到彼得堡后，马上受到戈罗杰茨基的影响，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乔装成乡下人的手法。

"喂,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您在彼得堡安置得怎么样?"

"谢天谢地,天哪,庇护者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找到一间斗室,我们还要什么呢?来吧,孩子,让我感到快乐吧。在海洋路,我在拐角处住……"

有一次,我顺便去克柳耶夫处,斗室原来是法兰西旅馆的房间,有整条地毯,宽大的土耳其沙发床。克柳耶夫坐在沙发床上,穿着小领衬衫,打着领带,正在读海涅的原著。

"略懂一点,"他发现了我惊奇的目光,"略懂一点,只是没有心思做事。我们的夜莺们声音洪亮些,喔,洪亮些……"

"我这是怎么啦,"他非常激动,"我是怎么接待贵客的?请坐,孩子,请坐,亲爱的。用什么招待你呢?我茶不喝,烟不抽,蜜糖甜点不储存。要末,"他使了个眼色,"如果不着急的话,或许一块儿去吃点小吃。这儿有家小餐馆。店主是个好人,虽然是个法国人。就在拐角处,店名阿尔贝特。"

我并不急。"那好吧,多美妙啊,现在就打扮……"

"你干吗要换衣服?"

"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呀——难道可以就这样去吗?狗也会笑话的。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好。"

他从屏风后面出来时穿着紧腰长外衣,擦过油的靴子,深红色的衬衫。"瞧,这样好些!"

"要知道这样穿戴恰恰不让你进餐厅。"

"我们不是去公用餐厅。我们乡下人去哪儿?去绅士中间?人人都应安分守己,我们不去公用餐厅,我们去斗室——小房间,也就是说单间,那里我们是可以去的。"

观众鼓掌,观众满意,戈罗杰茨基容光焕发。

他真诚地感到幸福,这位可爱的、招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

有才干的人。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一切都那么好,大家都那么喜欢。他,戈罗杰茨基比所有人更喜欢。他用那明亮坦诚的目光快活地环视大厅,拍拍这人肩膀,握握那人的手,再拥抱一下另外一个人……

当然,有时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索洛古勃在告别时以老人的方式埋怨道:

"你们的主管在哪里?"

"哪个,费奥多尔·库兹米奇?"

"是列伊费尔特,负责服装的。有人在他那儿借过草鞋吗?"

但是,索洛古勃对"人民艺术"懂些什么?

古米廖夫在苏维埃时期常常叹气:

"可惜戈罗杰茨基不在了。"

"好像他在白军那儿?"

"是的,在南方什么地方。这倒更好。要是他留在这儿,肯定会给活活枪毙掉的。"

"不枪毙我们?"

"我们是另一回事。他太孩子气了:轻信他人,热情洋溢……头脑简单。他公开进行宣传鼓动,对布尔什维克劈头盖脸说真话,会因为某首诗歌而被捕……一定会把他枪毙掉的。谢天谢地,他在白军那里。但少了他我常常感到很孤寂,少了一份从他那儿得到的快活。"

他又含笑补充道:

"实质上,我们同他的友谊是成人同孩子间的友谊。我是严肃的、枯燥无味的成人。而戈罗杰茨基活着就像玩沾人游戏一样。[②]我们之所以相互吸引大概是因为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1920年春,戈罗杰茨基来到彼得堡。来时口袋里装有新的

党证，跟随在共产党员拉里莎·赖斯纳后面。赖斯纳的丈夫，著名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波罗的海舰队的政委，在前线一个什么地方缴获列车“奥斯瓦加”的同时，也俘获了在“奥斯瓦加”车上工作的戈罗杰茨基。

……这一次主席台墙上挂着的不是科利佐夫的像，而是列宁的像，交叉着的也不是大叉子，而是镰刀与斧头。戈罗杰茨基身上穿的已经不是领扣在侧面的竖领男衬衫，而是四个贴兜带扣带的弗伦奇式的军大衣。

赖斯纳说了开场白。“我们中间谁会责难他？我们中间谁的手没……没有被‘议论’的脏墨水玷污过？”

“他曾经迷过路，现在他是我们的人。让我们忘了过去吧……”

赖斯纳之后，戈罗杰茨基朗读有关第三国际的诗歌，他先甩了一下鬈发，用一双可爱的、善良的灰色眼睛扫视了一下听众。古米廖夫耸耸肩膀说：

“的确，怎么去责难他呢？对他的这种失去自制力我们曾经给予鼓励，其实，我们就是为此才爱他的。不也是因为诗歌吗？他又在继续玩沾人的游戏……

“只是，”他补充道，“现在我看到了。去它的吧，这种天真幼稚。我对天真失去了兴趣。最好同普通的、对自己负责的人，而不是滑稽可笑的人一起生活。”

1922年秋，动身出国前夕我在莫斯科。在一家卖烟的小店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原来是戈罗杰茨基。

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么可爱地望着，那么笑着。

“而我，”他脸上泛起笑容，渐渐地这一笑容变成孩子般的，“而我，谁会想到，到了老年成了烟鬼……您说，‘印度流浪舞女’

是好烟吗？……"

收起找头时，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又一次转向我。这时他的那双灰眼睛忧伤地、"诚恳地"看着我：

"可怜的古米廖夫！……那么的不幸……"

我默不作声。

注释：

① 四句头——俄罗斯民间短歌，相当于对歌、快板等民间文艺形式。

② 沾人游戏——一种儿童游戏，一人须用手触及或用球投中跑着的其余参加者之一。

第八章

早上六点多钟,那些还坐在“野狗”俱乐部里的人的脸都变得像死人的脸一样。耀眼的电灯光,五颜六色的墙壁,桌上和地上是客人留下残羹剩饭和空酒瓶。喝醉了的诗人在吟诗,但是没有人在听,喝醉了的音乐家脚步摇晃不定地向撒满烟蒂的钢琴走去,他敲击琴键,弹奏送葬曲或者波利卡舞曲,或者别的什么曲子。衣帽间的服务员忘记了托付给他的大衣,正昏昏欲睡。“野狗”的经理——鲍里斯·普罗宁坐在门口盖满积雪的狭窄台阶上,抚摸着毛茸茸的小恶狗穆什卡,痛苦地哭诉:

“穆什卡,穆什卡,你干吗吃了自己的孩子!……”

一张张脸都像死人的脸。有人睡着了,有人佯装精神饱满。但是,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饱满……

有人关了大厅里的灯。现在只有隔壁的小卖部亮着灯。从通向扶梯的门里射进一束狭窄的灰蒙蒙的晨光。普罗宁正在台阶上哭泣。在这朦胧之中一个人从角落里走出来,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走近看时,他的头发好像是棕色的,目光忧郁凝集。我不知道他是谁,第一次看到。

“您一个人坐着,我也一个人。让我们一块儿坐会儿吧。”

“好吧，”我说。

“醉了？”

“一点也不。”

“我可是醉了。但这不要紧。这甚至很好。但如果您不醉的话，干吗坐在这里？等电车吗？”

“等火车。去加特契纳。”

“等火车，去加特契纳。”那人沉入幻想地重复道。“加特契纳，火车来了。雪，白色的，不，——蓝色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太阳升起来了。耀眼——看得眼睛发疼……几个卖牛奶的女人慢腾腾地走着……蒸汽，树木披上一层霜……”

他在打瞌睡。“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就像这里发出的油烟味一样。请告诉我，您干吗住在加特契纳？”

我说我一点也不醉，但这不是实话。我稍微有点醉。我不知道我的交谈者是谁。我住哪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我不完全清醒，所以他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没有回答，说：“住在那儿是因为喜欢那儿”，或者“那儿空气比较干燥”。我对他说实话：我迁到加特契纳是因为我恋爱了，我所爱的人住在那里。我的交谈者默默地听着，抽着短烟斗里的烟。他没有打断我的话——我重复着他刚才对我说过的关于雪和升起的太阳那番话。是的，我稍微有点醉，但是这不要紧，甚至还好得很。我对一位陌生人泄露了秘密，我只知道他抽烟斗，却泄露了一切，甚至泄露了“她昨天才对我说的话”，还有前天才写成的爱情诗：

金色的晚霞，
雪地染上一片琥珀色，
加特契纳对我来说多亲切，
完全如同昔日一样。

我泄露了一切，后来我觉得难为情，话没说完就突然中断了。抽烟斗的人沉默不语，接着，他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说：

“最好是在拂晓时自杀。当然，不是吃毒药。早上吃毒药使人恶心，整个身心都会发抖。人的构造是这样的。您决定去死。要死的话，您必须吞一杯药水或药片。但是您是一回事，而您的肚子是另一回事。它可不想死，它反抗，它想吃的不是药，而是乳脂咖啡……可是在拂晓时枪毙却很轻松，要我说，很快活。”

“吊死也快活吗?”我不使谈话中断。

“吊死不可能快活，”他严肃地回答，“上吊必须很隆重。当然，要是匆匆忙忙，就像监守自盗的工匠那样，用自己的裤带……但是，您设想一下，您一切都做得慢条斯理。丝带被均匀地擦满肥皂，钩子钉得很结实，绞索系得很仔细。可以读一遍祈祷文，抽完最后一支烟，喝完最后一口白兰地。刽子手在催促：够了，该动手了。您不用争辩，没用。您把绞索套上脖子……——生活多好啊！……我不愿意！——这是您的肚子、肺、肌肉在抵抗……但是大脑，刽子手，是无情的。还跟我谈！啪！脚底下被打掉的椅子滚到角落里。永别了，洛齐那—洛津斯基先生，永别了，不称心的诗人柳比尔！……”

这时我不开心了。我知道柳比尔是几次自杀未遂、最终在不久前自杀身亡的一个诗人的假名。我读过他的诗，有时毫无意义，有时非常清晰，甚至太明白了，带有某种反常的色彩。不管怎么说，诗歌是精湛的。提到他的名字我不开心。为什么要惊扰对死者的纪念？我把这句话说出声来。

“偏见，”我的交谈者打着哈欠说，“为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活着的时候，人们可以不恭敬地谈论他，而他死了以后就不可以？胡扯。况且……”

他没有说下去况且什么。“我该走了，对了，您也该走了，恋

爱者先生。坐上马车，然后火车，——太阳，雪……她甜蜜地睡着了……"

在这阴暗的清晨别唤醒她，
让我们吻一下半睡状态，暖和暖和……

"不过，这跟您的情况无关。所有这些接吻安年斯基毫不隐瞒地不予接受。他知道这些接吻意味着什么……"

"这些接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边找大衣边问。他不吭声。我没有再重复这个问题。大门口有几辆马车。我的交谈者坐上了其中的第一辆。

"再见。"

"等一会儿，"他猛然勒住刚要出发的马车，"听着，也许，随便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这是我的名片。我很高兴，很高兴……关于接吻，请相信，安年斯基知道并且始终记得——露出的细齿，眼内房出水，[①]肥胖的脸颊……走吧！"

冻透了的马猛地带走了雪橇。我看着名片：A. 柳比尔……洛齐那—洛津斯基……某某街……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青铜骑士"协会寄来的一份纪念诗人柳比尔的会议通知书。这一次（我们会面之后约三星期）自杀未遂者达到了自己目的。

晚会开得很荒唐。在斯维亚特洛夫斯基教授很大的现代化的办公室里聚集了约30个人。先是某人做了一个枯燥乏味的报告，然后M. 洛津斯基朗读柳比尔的诗歌，他像往常一样读得很出色，但是朗读之后，某个愚蠢的大学生犯了一个错误。他提议向"死者的兄弟和其作品的伟大朗诵者"表示同情。其实朗诵

者只是同姓，从来没有见过死者的面。为了消除印象，主人，也就是教授，安排亚沃尔斯卡娅朗读他自己的作品——十四行诗，这些诗是题献给各个不同诗人的。当亚沃尔斯卡娅以演员的激情结束献给库兹明的十四行诗的朗读时：

……赤身裸体的青年
忘了羞耻，藏到壁龛中去……

有人吹口哨。教授的脸红得像甜菜。场面更加尴尬。

侍者开始分送茶水。大家默默地喝着，默默地咀嚼着小点心。一个年轻人为了让协会成员快活起来，忽然想到在钢琴伴奏下唱一首亚美尼亚讽刺歌：

我有一个同志，
住在梯弗里斯，
长得非常可爱，
只是十分愚蠢。

拉里莎·赖斯纳那时几乎还是个小女孩，听着，听着，然后站起身，跺了跺脚，大喊大叫起来，说这一切都令人生厌，不成体统。她来参加悼念诗人的晚会，而用来招待她的，却是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大家各自拿上帽子，匆匆地打道回府。主人送别客人，脸因难为情而涨得通红，令人敬重的胡子在抖动，两只手也在发抖。

晚会举办得不成体统无话可说。但是，当我走回家路过特罗伊茨基桥时，我回忆起不久前夜间交谈者的冷笑。我仿佛觉得，或许这个不幸的人对这样的悼念正中下怀。

注释：

① 眼内房出水——一种眼病。

第九章

长期以来，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一直相互敌视。彼得堡人嘲笑“狗广场”和“死胡同”，莫斯科人则数落彼得堡那种不是“俄罗斯灵魂”所固有的过分的拘礼。市侩们相互敌视，两个首都的艺术活动家相互敌视。

1919年，迷恋电气化和其它伟大构想的时代，有位诗人向苏维埃政府提出将两个首都合二为一的方案。方案很简单。除了尼古拉铁路沿线以外，禁止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建造房屋。按方案的发明者推测，十年以后，两个城市将合并为一个，即彼得斯科，中央大街为库兹—涅夫斯基莫斯大街。方案没能实施是由于一件小事：无论彼得堡还是莫斯科都不进行建设——一切都被毁了。太遗憾了！也许这种合并会结束两个世纪的纠纷。

象征主义时代莫斯科粗俗但却繁荣的鼎盛时期结束了——《天平》关闭了。

“兴高采烈的反应”创办了彼得堡的《阿波罗》杂志，格奥尔吉·丘尔科夫在《阿波罗》敌人尸体（《天平》）上跳野蛮残暴的舞蹈。失业的莫斯科二流“明星们”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光顾彼得

堡。有的单纯找口饭吃，有的打算“从内部瓦解敌人”，策划阴谋和建立新的学派。

有一次，我意外地参加了这种策划阴谋的会议。写过一些诗歌的年轻人K把我领到旁边一个什么地方，神秘地说，鲍里斯·萨多夫斯基很想同我认识。我感到很荣幸。我当时18岁，还没有被荣誉特别宠坏。是的，几天以前，在“野狗”，某个长着资产阶级外貌的先生向我作自我介绍，说是我的狂热的崇拜者。他说：“您是那么的年轻，就已经那么的有名。”对此，我故作谦虚地反驳说：“哪里，我哪有名啊。”他满怀激情地叫了起来：“哪能呢，有谁不知道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

于是，我感到很荣幸，并对K说，我也很高兴去认识萨多夫斯基。K很快活地点了点头。“这就太好了，明天晚上您上他那儿去——我通知他。”

马车把我带到科洛缅斯基路一幢阴森森的房子旁。大门上面一块表层剥落的牌子上写着不知是“土伦”还是“马赛”，肯定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地名。“这是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间”。我小心翼翼地沿着阴森森的扶梯走上楼。光脚的服务员拿着烧开的茶炊，我告诉他找萨多夫斯基。“跟我走——恰好我给他们送茶炊。”

他没敲门，用膝盖抵开门，进了房间，使跟在后面的我晕头转向。就这样，我跟在手捧茶炊的服务员后面第一次——不意味深长吗！——来到了把自己的一本书叫做《沏茶机》的诗人那儿：

如果要了结充满痛苦的生命，
在自己的茶炊旁，
捧着瓷碗喝茶时，

煤气中毒而悄然死去。

我自己对这次会见的想象稍有不同。我想,迎接我的是一位仪表令人肃然起敬的先生,他的相貌带有他的职业,即象征主义诗人的印记。喏,就像丘尔科夫或者鲁卡维什尼科夫那样。他从深圈椅里站起来,把一册梅捷尔林克的书放在一旁,撩开额上的一绺诗人头发,将手向我伸过来。"您好,我很高兴。您是为数不多的善于掀开伊西达遮布瞧一下的年轻人……"

……在狭长的"房间"里挤着二十个左右的诗人——都是最幼稚的青年。一些人我认识,还有些人则第一次见到。烟草的浓烟遮住了脸和物品。一片可怕的喧哗声。在一只床上,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着一个瘦子,秃顶,黄脸,面容憔悴。他那一双恶狠狠的小眼睛不断地在使眼色,一只手神气地敲打着吉他。他用颤抖的假声唱着:

俄国沙皇的士兵们
乐意牺牲自己,
不是出于金钱,不是出于报酬,
而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名誉。

他身穿贵族礼服,钮扣闪着光,但扣子没扣上,露出天蓝色丝织竖领衬衫。一只患痛风的小脚恶狠狠地打着拍子……

我莫名其妙地站着——是这儿吗?要正是这儿,那要离开吗?但是,我熟悉的K已经注意到我了,并对弹吉它的人说了些什么。一对恶狠狠的小眼睛好奇地盯着我。歌声停了下来。

"伊万诺夫!"房子的主人用鼻音大声地说,重音放在O上。"欢迎光临,伊万诺夫!喝伏特加吗?鱼子吃光了,不该迟到!

现在煮热糖酒来弥补吧!”[1]

他朝着摆满各种各样瓶子的桌子做了个邀请动作,又重新唱了起来:

嗨,你,伏特加,
骠骑兵的大妈!
嗨,你,热糖酒,
骠骑兵的老婆!……

“小伙子们,跟着唱!”他突然喊叫起来,已经完全像只公鸡一样。“唱啊,俄罗斯贵族!乌拉!上帝保佑我们!……”

我环顾一下四周。“俄罗斯贵族”都醉了,主人也醉了。煮着热糖酒,滚烫的酒洒在地毯上,读诗,唱歌,跟唱,喝酒,喊“乌拉”,相互拥抱。我也没有清醒多久。“伊万诺夫没喝酒,给他一个大鹰酒杯!”萨多夫斯基吩咐道。推辞是不可能的。一大杯可怕的混和酒马上改变了我的情绪。我觉得这伙人非常可爱,连主人既盛气凌人又友善的腔调我也觉得十分自然。

烟草的烟越来越浓烈。酒杯越来越频繁地从在场的人的手中掉下来,哗啦啦地打碎了。恍恍惚惚地,我记得尼古拉一世傲慢死板的面庞,正从四面墙上在看着我们,记得萨多夫斯基的浇满了酒的制服,记得他干瘦的黄手指点到我的面前,还记得他那开导式的耳语:

“酗酒是我们身心同宇宙音乐的交媾……”

仍然是那个房间,仍然是那个噪音,仍然是秃顶下面那双犀利的恶狠狠的小眼睛,但是房间里秩序井然,并且萨多夫斯基的假声听起来拘谨而可爱。穿着黑色的长襟常礼服的他更像诵经

士，而不像放荡的骠骑兵。

墙上，桌上，床头——到处是尼古拉一世的肖像，有 10 幅。骑在马上的，侧面的，穿军大衣的，又是骑在马上的。我惊奇地看着。

"这个男子汉，"萨多夫斯基解释说，"国君中最伟大的一个，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全世界。""儿子，"他把词藻华丽的腔调改为老太婆般的絮语，"儿子可并不怎么样，竟生出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解放卑贱的人，卑贱的人把他杀了……"

在房间所有角落挂着和放着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开始的所有俄国沙皇的肖像，就是没有亚历山大二世的。

"萨多夫斯基贵族房子里没有他的位置。"

"可是，您来彼得堡不久，怎么您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肖像？"

"是的。"

"无论到哪儿？"

"哪怕去西伯利亚也带着！如果要外出很长时间，比如两个月左右，我就带上所有的肖像；外出一个星期的话，我只带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亚历山大·布拉戈斯拉文内、好妈妈叶卡捷琳娜和彼得的像。喏，还带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像——是的，作为女皇，她平平常常，不过脸蛋漂亮，像个女商人！我喜欢！"

萨多夫斯基在叙述自己的"思想"时，一双犀利的眼睛盯着交谈者：对方认真接受吗？已经有人及时给我说过农奴制和贵族阶层都是假的，因此，我没有认真地接受他的话。

一对敏锐的小眼睛犀利、狡猾地看着。"高级阶层的神圣使命……"他突然停了下来，没说完这句话。"可是，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让我们谈谈诗歌吧！……"

"好吧。"

鲍里斯·萨多夫斯基是个水平不高的诗人，确切地说，他不是诗人。俄罗斯诗人的品质他只具备一种，即懒惰。懒惰妨碍了他从事他直接的事业——成为评论家。

如果人们还记得萨多夫斯基的名字，那是得益于他平淡而认真的诗歌，而他的文章则被大家忘却了。忘却是不公正的。说实话，值得为萨多夫斯基的两本书《秋播》和《浮冰》写许多"可观"的批评著作。

文学的敌人称萨多夫斯基为"《天平》用链拴着的一条狗"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有人从他评论中摘选的常常是没刊登过的尖刻的抨击，可以占小号字体印刷张的半页之多。

在尖刻的抨击后面是机智和对诗歌透彻的理解。

为了争论、了结恩怨、维护贵族的怪僻、纪念尼古拉一世，他都写过十分精采的篇章。

顺便说一下，萨多夫斯基的功名是一个例子，说明作家过傲慢孤寂的生活是多么危险。坐在自己的住处写诗——好，那就这么办吧。可是，当他同莫斯科颓废派的联系(他们的联系是偶然的和不牢固的)中断后，他企图"随波逐流"，从自己"鲍里索夫卡庄园，又名萨多夫斯基庄园"中发出"自由之声"。这一来他便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秋播》和《浮冰》出版后遭到人们的起哄、戏弄。不幸的是，萨多夫斯基俏皮话说漏了嘴。"关于诗歌按普鲁士模式：勃留索夫——威廉，古米廖夫——克罗普林茨和他们的'中尉们'。"奥斯伦德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拍打胸脯写道："古米廖夫在前线流血，我们决不允许……"跟在他后面拍胸脯的是戈罗杰茨基"我们决不允许"。当时是战时——萨多夫斯基的处境很糟。在"受侮辱的"古米廖夫之后，谁也不去读、也不评价他写的哪怕是有关莱蒙托夫的出色的文章——这也许是我们文学中最好的文

章。

“莱蒙托夫的长诗集——实质上是一大堆天才的草稿，诗人之死妨碍了草稿的誊清……”

萨多夫斯基周围的人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人，也是“原莫斯科人”——诗人吉尼亚科夫—奥金诺基。在萨多夫斯基跟前，他不是侍从就是副官。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老弟，跑一趟买包香烟。”吉尼亚科夫买来了香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去买啤酒！”“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坎特是在什么地方说这句话的？”吉尼亚科夫流畅地给了回答。

这是个样子可怕的人，脸上长满胡子，衣衫褴褛，拖着一双破旧不堪的鞋。但他极有学问。他研究过一切，从古代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到催眠学。他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犹太教圣法经传，对此他研究得十分详尽，而叙述起来则有其独到之处。吉尼亚科夫清醒时很温顺，有着一种受折磨和优郁的样子。而喝醉酒时——他几乎一直是醉着的一则变得精明强干。

“野狗”俱乐部。一张小桌子旁坐着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偶然来的客人，用“野狗”的暗语来说，是“药剂师”。他们每人付了3个卢布门票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漂泊的文艺家”。

吉尼亚科夫脚步摇晃地走过他们的身旁，他停了下来，用使人惶惑不安的目光盯着他们。他问也不问就坐到他们的桌子旁，拿起女士的杯子，倒酒，喝了起来。

“药剂师”感到惊讶，但没有抗议。“漂泊文艺家的神经……甚至很有趣……”

吉尼亚科夫又倒了杯酒。“我读首诗，想听吗？”

“漂泊文艺家的神经……诗人……多么有趣……是的，请朗诵，我们非常高兴……”

吉尼亚科夫打着嗝朗读道：

我吐痰，吐的痰真好看，
沿着沟渠漂浮
光滑的侧面紧偎着……

“喂，怎么样……喜欢吗？”“当然，非常喜欢！”“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了什么？喂，用自己的话叙述一下……”

先生不知所措，“喏……这些诗句……您说……您吐出的痰……和……”

吉尼亚科夫的拳头可怕地敲打着桌子。瓶子飞到地上。女士吓得要命，跳了起来。吉尼亚科夫野蛮的噪音在喊叫：

“啊！我是吐出的痰！我是吐出的痰！……那你……”

这个吉尼亚科夫1920年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彼得堡。他像往常一样，总是不刮胡子，衣衫破烂，肮脏不堪。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从事什么工作？有一次他到作家Г那儿作客。他们天南海北谈了起来，后来话题转到了政治。吉尼亚科夫问Г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看法。Г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

“啊，原来这样。”吉尼亚科夫说，“就是说你是工农政权的敌人！没想到！即使我们是朋友，我也应当在你这儿搜查。”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某某省肃反委员会颁发的委任状……

1916年我在莫斯科，一天，我同萨多夫斯基在“布拉格”饭店共进早餐：萨多夫斯基为我“接风洗尘”，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早餐很丰盛，账单数目好像很大。当找头送来后，萨多夫斯基一一点清并收藏好，然后在口袋里翻寻一阵，拿出2个5戈比铜

币。“奴才!”他把铜币扔在桌上,“给你买伏特加。”“十分感谢,鲍里斯·亚历山德鲁维奇”,侍者卑躬屈膝地行礼,就像收到了数额大得难以置信的“小费”。我十分惊讶,“宠坏了的百姓,”萨多夫斯基埋怨说,“在好妈妈叶卡捷琳娜时代10戈比可以买头小牛了……”

他慢吞吞地穿上自己的破旧大衣,一个侍者给他递上手杖,另一个送上围巾,第三个拿来贵族大沿帽。

过了几天,我一个人去了“布拉格”。给我服务的还是那个侍者。“我冒昧的问一下,鲍里斯·亚历山德鲁维奇没病吧——好像很久没见他了。”“不,他健在。噢,谢天谢地——那么好的老爷。”“好像他用小费宠坏你们?”仆人冷笑一下。“您这是在说那10戈比?他有时给10戈比,有时大方地给25卢布……我们不抱怨,真是个好先生……”

注释:

① 热糖酒——将罗姆酒或白兰地酒与糖一起溶化后再添水果、香料而成。

第十章

1910年秋，从来自国外的列车的三等车厢里走出一位年轻人。没有人迎接他，他也没有行李——唯一的一只箱子他遗失在路上。

旅行者穿着古怪：肥大的破旧斗篷，阿尔卑斯皮帽，鲜艳的棕红色皮鞋—没有擦拭过，鞋跟也踩歪了；方格厚毛围巾搭在左手，右手拿着夹肉面包……

就这样，他手里拿着夹肉面包，向出口处挤去。彼得堡并不友好地迎接他：侧路渠上空飘着寒冷的小雨——令他联想到囊中羞涩。而浑浊的天空下，阴暗的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大街上站着穿漆布雨衣的警察，则叫他想起"居住权"的问题。

这位旅行者叫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在艾恩德昆宁遗失的箱子中，除了牙刷和贝格松诗集外，还有翻破了的诗歌小本子。不过，真正丢失的只是牙刷：自己的诗和贝格松的诗他能背诵出来。

……在你这个年龄，我已经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

凌乱的眉毛威严地蹙紧在鸟一般的小脸的上方。一只盆子

蹦到桌子中间,里面的汤泼洒出来,餐巾飞到角落里……

父亲情绪不好。他,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常常情绪不好。他是个倒霉的商人,患肺痨病,受人迫害,一生充满幻想。他总抱有一种希望:皮革业会有起色的。而现在他得到的只是失望:不走运,不成功,失败了……

母亲——肥胖笨重,萎靡不振,软弱无能,然而却是个善良的人,暗底里塞给儿子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一个卢布。90岁枯瘦的奶奶,鼻子上架着放大三倍的眼镜,弯腰驼背读《圣经》:计算着救世主降临的日期……

冬天,彼得堡阴森森的住宅;夏天,凄凉的别墅。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在令人恐惧的沉默中吃饭,小声说话,害怕门铃,害怕电话。法警的眼神礼貌而不讲情面,冒烟的棕色火漆……母亲的眼泪——我们怎么办?父亲仿佛是个电容瓶,只要碰一下,就会爆炸……

吊灯凄凉地发着光。茶水不往喉咙里去。

"我们怎么办?"——票据拒付证书……

沉闷的寂静。隔壁房间里传来弯腰驼背奶奶读《圣经》的嘶哑低语声:可怕的,令人不解的希伯来语。

不要紧,——设法应付过去。法警撕去印章,票据同意改签。重新有了希望:好像,出口油的事情会有眉目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任何事情都不会有眉目,一切都是不确实的,变幻不定的。——一定会有某种可怕的结局——心力衰竭,自杀,破产,贫困。

……又黑又瘦、其貌不扬的少年,终于摆脱了叫人心烦的喝茶消遣,在自己房间里读起《纯理智的批判》。很难读懂。但是,库诺·菲舍尔被扔在桌子底下——库诺·菲舍尔见鬼去吧。

"用头脑"还难以理解坎特,但是全部身心已经像吸入空气

一样,吸入他的"神奇的寒意"。头脑里的低语声也是"神奇的":最迷人的就是这样的阅读,不是通过智慧,而是预感……

他放下书,走到窗前。空荡荡的石头岛大街上亮着路灯。冬夜的星星在寒冷的天空闪烁。那儿,在彼得堡,在世界上,在宇宙空间,天地是多么的广阔……

"奥西普,去睡觉。父亲又要发火了。"

"噢,马上就去,妈妈。"

……头脑里一片迷雾。坎特……音乐……生命……死亡……心脏开始怦怦地跳……嘴唇开始颤动。

你的形象痛苦而又模糊,
我不能在雾中觉察。
天哪！我说错了话,
自己也没想说的。

上帝的名字像一只大鸟,
从我胸中飞走了——
前面浓雾滚滚
后面则是空空的鸟笼……

曼德尔施塔姆是世上最爱笑的人。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无论他多忙——只要向他眨一下眼,那么所有的严肃认真便会一扫而光。刚同相当有学问的要人进行重要而又深奥的谈话,突然:

"哈—哈—哈—哈……"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充满泪水。交谈者感到惊讶、难堪。谈论问题时那么聪明、

那么深思熟虑的年轻人出什么事了？他没有生病吧？

噢，不，他没病。不过，就说他有病吧。反正这比解释笑的真正原因更近乎情理：某个人打了个喷嚏，苍蝇停到某人秃顶上……

“干吗写幽默作品？”曼德尔施塔姆真诚地困惑不解。“要知道一切本来就都是可笑的。”

有一次，我们沿着谢尔吉耶夫基路走过两年前曼德尔施塔姆住过的房子，他是因“暂时”可恶而被父亲赶了出来(这事经常发生)，住到舅舅和舅妈那儿去的。曼德尔施塔姆觉得那儿的日子比家里好得无法比拟。舅妈是个纯朴、快活的人，胖胖的像个球，给他吃可口的东西，瘦削和谢顶的舅舅请他抽好烟，喝白兰地，往口袋里塞一张张 5 卢布的纸币。曼德尔施塔姆也真诚地爱他们。

“非常好的老人，可爱的老人……”

我们经过这些“非常好的老人”的房子，我发现他们住房的窗户上贴着出租的白色条子。

“你的亲戚搬走了？他们现在住哪里？”

“住哪里？……哈……哈……哈……不，不住这里……哈……哈……哈……是的，搬走了……”

我感到惊奇。

“噢，搬走了，这有什么可笑的？”

他脸涨得通红。

“什么可笑的？哈……哈……而你问他们搬哪儿了！……”

虽然他笑得气喘吁吁，解释说：

“去年……咳—咳……因霍乱……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因自己不恰当的快活而为自己辩解说：

“这样笑真不好意思……他们是那么好的人……但是那么可笑。都因霍乱而死，但你……你……还问……搬到哪儿……哈……哈……哈……搬……搬到……”

他是个爱笑的人，也是个常常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的人。

同曼德尔施塔姆谈了一个小时——不可能不得罪他，就像不可能不引他发笑一样。常常同一件事先是使他发笑，后是使他生气。或者是倒过来。

这其实是“诗人的通病”——非同寻常地强烈地感受到真正的和臆想出来的委屈。在这种情况下他笑话别人，也笑话自己。

曼德尔施塔姆因自己长得难看和贫穷而生气，因别人不听他的诗歌和笑话、他的热情奔放而生气……

而拜伦呢？他则漂亮，出名，富裕，然而，有点儿瘸。喔，一点点，几乎觉察不到。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点点瘸而流行起整个“拜伦主义”的吧……

是的，这是“诗人的通病”。只是管辖诗人命运的恶毒的仙女不知怎么特别“关照”曼德尔施塔姆。她恩施给他最纯洁、最“天使般”的才能，把他抛到世上时却让他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无法适应……尽力挣扎吧。

他是在挣扎：

是我们吗，被抛弃在空间，
注定要死亡，
惋惜美好的始终不渝
并为忠诚而惋惜！

在瑞士或者海德堡，一位俄国大学生创作的诗歌出现在《阿波罗》11月期刊上。这位大学生披着一块可笑的方格厚毛围

巾，褐色的短连鬓胡子剃得精光，使当地居民感到惊讶，使人感到惊讶的还有他在上课时间喜欢到公园的某个角落散步，单调地喃喃念诗(他的诗歌就是那样创作出来的)，这些诗歌的手稿是连同贝格松诗集和牙刷一起丢失的。

给了我身体，我该拿它怎么办，
我那唯一的身体？

为了静静的快活而呼吸和生活，
请问我该感谢谁？

我与园丁，我也与花朵，
在世界的监狱里我不孤独。

我读了这首诗，还读了几首同样“摇摆的”模糊不清的诗歌，它们署的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心中一动：

“为什么这不是我写的！”

这样的“富有诗意的嫉妒心”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感情。古米廖夫认为这种嫉妒心比所有论断能更正确无误地确定别人诗歌的“分量”。如果产生“为什么不是我写的”这种想法，那意味着是“真正的”诗歌。

诗歌是惊人的。正是惊人的。它首先是让人感到惊讶。

我当时非常“敬重”《阿波罗》，也许过分敬重。我自己还从没有在《阿波罗》上发表过作品，我把所有在那儿发表过作品的人看作像受封的人一样。在1910年第11期出版之前，凡在《阿波罗》诗歌栏中发表的所有作品我都真诚地认为是诗篇。但是，刊有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杂志第一次使我陷入“决定成败的沉

思"之中,这本杂志看上去很特别,不同于以往。这并没有使杂志增色。

我第一次感到"斯列布罗卢基"的才华有点衰退了。

我的呼吸,我的热气,
已经永远笼罩在玻璃上……

由名不见经传的"O. 曼德尔施塔姆"签名的诗歌抑扬顿挫,像映在水中的星星一样发出寒光。而在这星星的旁边,周围的一切明显地露出本来面目——印刷油墨和高级"直纹纸"。

过了约两星期,在自己的皇村居室的客厅里,古米廖夫宽容地微笑着(他总是故作大度地微笑)介绍我们认识:

"曼德尔施塔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我打量着他:在虚弱的身体上穿着一套西服(自然,是格子的,膝盖部分自然,伸直到极点,尽管如此,仍看得出他讲究穿戴:丝织手帕,领带歪向一边,但却是带着小圆点的那种,等等);在虚弱瘦小的身体上长着一颗大得不相称的脑袋。也许,脑袋并不那么大,只是它在过细的脖子上夸张地往后仰着,柔软的浅棕红色头发蓬松地打卷并竖立着(头顶上相当大的一块已经秃了),两只耳朵朝外翘着……还有乞乞科夫式的络腮胡子……

眼睛眯缝着,眼皮半开半闭——看不到眼球。动作出奇地吃力。伸出手后马上就缩回去。点一下头,过一秒钟头伸得更直,好像牵线木偶。

他和我谈话时不知为什么用法语,努力用小舌发音,用某种过分的"巴黎的"P音……不知怎么就卡住了。卡住后就不作声,脸上泛起红晕,挺起身来更傲慢……

这就是他,尽管完全不了解我,没跟我说过一句联贯的话,

但已经在生我的气了。为了什么？为的是他不是那么正常地说了些什么，或者不是那么正常地伸出手来，而我发现了这点，因此，他一定暗自思量着什么……

一刻钟后，在喝茶时，他因我偶然说起的一件荒诞无稽的事而笑出眼泪。事情是有关驾车送我的马车夫的——乱七八糟的一件事。他像孩子般地笑着，把脸埋到餐巾里喘不过气来。

当我听到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读诗歌时，我又一次惊讶不已。

对他奇怪的朗读风度我不习惯。所有诗人朗读"各有各的特色"——有的把 C 或 З 读得有点像 Ш 或 Ж，有的鬼哭狼嚎。对谢维里亚宁唱轻佻小曲似的朗读，对戈罗杰茨基的咆哮，对丘尔科夫念亡人经似的朗读，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但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读使我大吃一惊。

他也唱，也鬼哭狼嚎。为了同这种唱合拍子，他还摇晃着被耳朵和络腮胡子加重了负担的脑袋，两只手的动作像是在施行催眠术。配上他的外表，他的朗诵应当是十分可笑的，可是并非如此。

相反，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诵虽然荒谬，但不知怎的具有魔力。他边摇晃着细头颈上的脑袋，边怪声怪气地唱，我有一种冷的感觉，害怕，激动不安，就像在超自然的东西面前一样。诗歌全部本质的纯粹表现都在他的朗诵之中，在他这个人身上（全部，全部，甚至在方格裤子上）体现出来，这我以前还没有见到过。

在我们认识的第一天，我又一次不得不感到惊讶。结束朗读后，曼德尔施塔姆像鸵鸟一样抬起了眼皮。在没有睫毛的红色眼皮底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犀利标致的眼睛。

"政府大楼黄顶"上方，寒冷的太阳球体在发光，并不释放热量。马车载着乘客，部长们坐在豪华的车厢里，洗衣女工捶打冰

冷的衣衫，近卫骑兵团的官兵们在用早餐，但是他，曼德尔施塔姆，确实好像是从火星上突然落到彼得堡马路上的，在沙皇彼得堡的这种规章下他能做什么？他没有钱。他那招风耳朵冻僵了。

一辆辆马车飞入雾中，
谦逊爱面子的步行者，
怪人叶夫根尼为贫困而害羞，
吸入汽油并诅咒命运……

在人行道上行走，吸入汽油的味道，为贫困而害羞，难道这不是职业，也是吧！更何况

……在潮湿的柏油马路上
诗人想要——就能把幸福找到。

曼德尔施塔姆从国外回来不久（父母的房子对他来说完全不是“居住地”）就开始独立生活。

曼德尔施塔姆和独立生活！

反正活着。长时间谈判的代价，复杂的交换代价，用他一大堆没洗过的衣服去交换成衣，从洗衣女工有力的洗红了的手中掉出使人目眩的色彩鲜艳的衬衫，这些衬衫是曼德尔施塔姆喜欢显示的。本性刚毅的小裁缝不知怎么奇迹般地被说服了，边叹气边摇头，为他那不成样子的身材赊帐裁剪大方格西装。这一切和零花钱成了他独立生存最复杂的一个部分。住所和桌子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讨人喜欢的退休上校和好心肠的老犹太人出租房间，他们不太欺侮房客，革命前就住在彼得堡……零花

钱需用在烟草和不加牛奶的咖啡上:为了写成五节诗,曼德尔施塔姆平均需要花去8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内他抽掉不少于50支烟和喝掉半俄磅咖啡。

如果身无分文,那剩下最后一条出路,令人厌倦的然而是可靠的:如同跳人漩涡一般,迅速坐到马车冷冰冰的车毯上——走……

没钱支付。但是必须要支付。就是说,有人会在什么地方支付的。大概,付钱给马车夫的人一定会为搭客找到3个卢布的……

冷冰冰的马车朝"不知道的方向"懒洋洋地行进。旁边闪过其他马车,载着拥有住宅和银行活期存折的乘客,他们知道往哪儿去。叶利谢耶夫商店橱窗里闪现出菠萝和酒瓶的影子,大螯虾的幻影在冰下卷起红色的有鳞的尾巴。马厩路和涅瓦大街拐角处在出售去柏林、巴黎、意大利的国际列车的卧铺票。脸冻得通红的妇女把自己裹进貂皮大衣里,各家花店的玻璃后面有一大堆剪下的玫瑰。——这一切都仿佛是那样……

现实——被风轻轻拍打着的大衣,被迫搬出的房间,不清楚将由谁来付钱的马车,难看的脸加上冻得发紫的耳朵,真实的和虚构的委屈——虚构的常常比真实的更伤心……还是那个唯一可怜的安慰:

……在潮湿的柏油马路上
诗人想要——就能把幸福找到。

……为什么人们写幽默作品——我不明白。要知道,一切本来就都是可笑的……

有一次,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立即去华沙。他恋爱了(自然是

无希望的)。"他的全部命运"不知何故(或者他觉得)取决于这次旅行。那是战时,但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毅力,经过奔走终于弄到所有的通行证并获得批准。但是在张罗中他忘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路途费用。

他必须——"一定要,不然就死",在确定日期之前到达华沙。瞧,没有钱。并且,绝对不可能弄到钱。我在一家编辑部门口碰到他,编辑部对他"杰出的天赋"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预支当然是不行的。那时他说:

"我只是到现在才明白,可以在众人面前死去,而没有人会扭过头来……"

最终,他还是到了华沙,——已故的H.H.弗兰格尔把他抓到自己的卫生列车上。在华沙,他的"命运"中发生了一场灾难——曼德尔施塔姆自杀了,当然,没有成功。在医院里休养后,他回到了彼得堡。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在"野狗"遇到他。他笑得喘不过气来,正在给某个人朗读刚刚写好的四行诗:

不要沮丧,
请坐上电车,
它是那么的空畅,
这辆八路电车……

"十月革命"爆发后,红色政权向所有国家的"倒霉者"允诺又是宫殿,又是午餐,又是各种各样的成功。曼德尔施塔姆站在布尔什维克"那一边",确切地说,挨近布尔什维克。他没有入党(因胆怯,想必白党一来,要被吊死的),当然没当上人民委员同志。但是在外围某个位置厮混着,巴结某个人,同不该握手的人握手——为此得到某种好处。这当然不太好,但是也并不那么

可怕，如果考虑到曼德尔施塔姆是只"上帝的鸟"，是只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并且是个吃不饱的、无能为力的、孤独的"上帝的鸟"）。而且，"俄罗斯文学家"中并不只是他一个（这种情况下，他们远不是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的"鸟"），在回想起1918到1920年、斯莫尔尼宫、"阿斯托里亚"餐馆、克里姆林宫的"白色走廊"时，不得不伤感地叹气：

什么样肮脏的手我没握过
什么都不以为然……

……1918年。米尔巴赫尚未被枪决。苏维埃政府还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就在莫斯科某个被征用的别墅里，正在进行"联合"狂饮。我不能描绘这次狂饮或者类似的狂饮，原因很简单：没去过。但是不难想象：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小胡子和金边眼镜同皮夹克混杂在一起。还有苏维埃太太们。"为可爱的妇女，非常可爱的妇女……""为胖小子……""为共产国际"干杯。许多人，许多酒，许多食品。这时，曼德尔施塔姆在这些眼镜、"胖小子"、"共产国际"、伏特加和鱼子中间。"上帝之鸟"被安排吃鱼子，在烧得很热、照得很亮的房间里，加入加米涅娃明天开的"拨款单"里，如果今天巧妙地向她献殷勤的话。大家都醉了，曼德尔施塔姆也有点醉，一点点，因为他不爱喝酒。他更喜欢冷饮，鱼子，"火腿"……

苏维埃的狂饮当然也可笑：就像所有喝醉的人的聚会，也是"独特的"，"非常可爱的妇女"、苏维埃派头，这"强大的""共产国际"，可笑的还少吗？"联盟"在喝，曼德尔施塔姆在吃鱼子和冷饮。加米涅娃对恰到好处的奉承可爱地笑了一笑说："明天上我秘书那儿。"有人唱着歌曲"洋娃娃"。很暖和，一切都很好，一切

都令人愉快,一切都很好玩。并且……不要喝得太多,然而一杯,又一杯……

突然,曼德尔施塔姆脸上的笑容不知怎的变得黯然了,蔫了,张皇失措了……怎么回事? 喝多了? 还是主人芬芳的雪茄烟烟灰烧穿了刚刚好不容易缝制好的呢料西装? ……

还是因为牙齿,他那不幸的牙齿,一辈子都疼。因为牙医要给牙齿钻孔,所以他没有勇气去牙医那儿,——现在这些牙齿是因为砂糖和糖果而酸痛?

都不是。

曼德尔施塔姆不知所措地微笑着,双手捧着没吃完的馅饼,看着不远处坐着的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曼德尔施塔姆认识他。这是布柳姆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认识并且害怕他,其实他害怕所有穿皮夹克的人。他显然更喜欢卢那察尔斯基微微闪光的眼镜或者加米涅娃洒足香水的和修剪过指甲的小手。他怕皮夹克,尤其是这个布柳姆金。这是个肃反工作人员,行刑者,可怕的人,令人恐怖的人……平时,曼德尔施塔姆设法离他远一些,害怕目光相遇。现在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人,样子是那么奇怪,那么可怜,那么惊慌失措。怎么回事?

布柳姆金喝得很多。但不能说他完全醉了。他动作吃力,但很自信。现在,他在桌上摊开一张纸——一份名单,用手掌摊平,慢慢地再读一遍,慢慢地在纸上用铅笔来回移动,做着某种记号。然后,还是那么吃力地,但很自信地,从自己皮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包不知什么证……

“布柳姆金,你在那里搞什么? 为革命而唱吧……”

就是嗓音,也是那么的吃力,困难地转弯,但是是自信的,他回答:

“等一等,我开逮捕证……反革命分子……”

"西多罗夫？啊，我记得，枪毙。彼得罗夫？哪一个彼得罗夫？喏，反正枪毙……"

曼德尔施塔姆看着的就是这个，听着的也就是这个。无巢的上帝之鸟飞到这儿取暖，啄鱼子，央求得到"拨款单"。

他听见，他看到：

"……西多罗夫？啊，记得，枪毙……"

……逮捕证已由捷尔任斯基签了名，事先开好，并且章也盖了。"极善良的心肠""完全"信任自己的助手。剩下的只是填入姓和……喝醉了的肃反工作人员将铅笔吃力地，然而自信地举到这样一包逮捕证上面。

"……彼得罗夫？哪一个彼得罗夫？喏，反正……"

在牙医机器前如同在断头台前发抖的曼德尔施塔姆，突然跳将起来，跑到布柳姆金跟前，夺走逮捕证，把它们撕成碎片。

然后，在无论是布柳姆金，还是其他人，没有一个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慌忙跑出房间，滑下楼梯，往前，往前，没戴帽子，没穿大衣，沿着莫斯科夜间的街道，沿着雪地，沿着轨道，只有一个想法：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他整夜在莫斯科徘徊，处于可怕的紧张激动之中。也许幸亏这紧张激动，他，这个因穿堂风也会得咽喉炎的人，现在虽然没穿大衣整夜呆在严寒中，居然没有感冒。"你究竟在想什么？"我问他。"什么也不想。念了一些诗歌，自己的，别人的。抽了烟。拂晓时，克里姆林宫呈现淡红色，我坐在莫斯科河边的板凳上，哭了起来……"

坐到板凳上就哭了起来。后来站起来，走向这座呈淡红色的克里姆林宫，找加米涅娃。

加米涅娃当然还睡着，他只好等着。10点钟加米涅娃醒了。有人向她汇报说曼德尔施塔姆来了。她走了出来，惊喜地

两手举起轻轻一拍,并说:“去洗澡间,头发梳梳好,身上收拾干净!我给您列夫·鲍里索维奇的大衣。不能这个样子带您去见捷尔任斯基同志。”

曼德尔施塔姆在加米涅娃浴室里把自己收拾干净,为自己洒了些加米涅娃的香水,系上领带,给皮鞋擦上黑鞋油。然后同加米涅娃一块儿喝茶,他们默不作声地喝茶。

她沉默,他也沉默。
能说什么呢?我的朋友?……

后来他们出发了。

捷尔任斯基马上接待,他认真地倾听了加米涅娃的汇报,听完后拉了拉山羊胡子。

他站起来,把手伸向曼德尔施塔姆。

“感谢您,同志。您做了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在您的位置上该做的事情。”他拿起电话说:“立即逮捕布柳姆金同志,过一个小时集合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体负责人员审查他的案子。”他又对着因幸福和恐怖而发抖的曼德尔施塔姆说:

“今天就将枪毙布柳姆金。”

“同同志……”曼德尔施塔姆开始说话,但舌头不听使唤。加米涅娃已经拉着他袖子走出办公室。就这样他没说出他想说的话:要求逮捕布柳姆金,将他流放到随便什么地方(如果布柳姆金留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如果可以的话”,不枪毙。

可是,加米涅娃把他从办公室领了出来,带到家里,把钱塞到他手里,吩咐在家里呆两天,哪儿都不要露面,“在这件事没有平静下来之前……”

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必要照这个建议去做。中午 12 点逮捕了布柳姆金。2 点——对他执行了“最严厉的革命审判”，而 5 点一位好心人打电话给曼德尔施塔姆说：“布柳姆金已自由，在全城找您。”

曼德尔施塔姆几天后到了格鲁吉亚才松了口气。他是怎么到那儿的，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反正到了，松了口气，然而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他被当作布尔什维克的间谍，关进了监狱。

过了几个月，布柳姆金被认定犯有比在喝醉状态下签发枪决命令更“严重”的罪行——他枪决了米尔巴赫伯爵。曼德尔施塔姆出于谨慎“期待事变”：事态发展变化得还少吗？然而，一切都很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了监牢，布柳姆金被缺席判决枪毙，消失了。曼德尔施塔姆打算去莫斯科。他没有钱，那种奇迹般地使他从莫斯科来到格鲁吉亚的“恐怖的精力”也没有了。一切都不要紧——安排好了。朋友们——格鲁吉亚诗人帮的忙：他们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张罗，按行政程序将他流放出格鲁吉亚。

曼德尔施塔姆刚刚回来就顺便到诗人咖啡馆去瞧瞧“有什么和怎么样了”，他碰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布柳姆金。曼德尔施塔姆当场昏倒。咖啡馆老板——形象派诗人劝说布柳姆金藏好手枪。然而，布柳姆金的愤怒这两年看来有所冷却：曼德尔施塔姆离开他后在当晚就去了彼得堡，他没去追捕……

第十一章

两间狭窄的房间,小窗户靠近天花板,就像在地下室里。但这不是地下室,相反——第六层。如果踮起脚,或者,站到椅子上则更好——能看得见下面大雪盖满了的塔夫里花园。

房间都不大。家具是组合式的。四面墙上挂着博季切利一家照片,温柔忧愁的小天使,背景是人间天堂不大清晰的风景。许许多多书,要是看一下书脊,便会发现名目繁多。圣徒传和卡扎诺娃回忆录,里里克和拉勃列,列斯科夫和怀特。桌上是翻开的阿里斯托法的原著。一个角落里,暗淡无光的圣像前点着一盏浅蓝色的"高级僧侣"的长明灯。香水,烟草,烧掉的灯芯味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炉子烧得很热。冬天的阳光很亮。

这是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住宅里的库兹明的房间。

第一间是会客室,第二间是卧室。库兹明10点左右起床,在卧室里斜面的高帐桌——商人算帐的那种桌子旁边办公。他站着工作,坐着要睡着的——他肯定地这样说。库兹明在写,写得很整洁,多半不用再誊清。他把几张纸写满后,咬一阵笔端,又不停地写,盖上刚写的,几乎没有涂改的地方。

库兹明工作时,"会客室"里来访者开始聚合。一些是仪表

堂堂的文职人员，一些是军官学校学生。法学院学生袖口翻边是绿色的，贵族学校学生袖口翻边是红色的。

这是唯美主义者们——“彼得堡的怀特”的崇拜者，他们大家是这样称呼库兹明的。

导师工作时，唯美主义者们在小声闲聊。

“我现在在重读里尔伯爵作品，多美啊。”有人说。

另一个文学素养较差的人漫不经心地皱起眉头说：

“这伯爵是哪位，安德烈？”（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维利耶·里尔·阿达恩，我亲爱的。”第三个人嘲笑地插话说。

但是文学爱美主义者没有觉察到嘲笑的意味，他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膀说：

“我不知道……”（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像列昂纳德和温奇这样的天才……

……列昂纳德，列昂纳德——您的列昂纳德算什么！要不是阿基姆·沃伦斯基写了有关他的书，谁也不记得他。喏，克勒韦……

……“彼得卡又在‘熊’酒馆附近大闹了一场，你们听说了吗？”一名完全不学无术的唯美主义者因深奥的谈话闷得发慌而插话说。“喝酒后，吩咐拿来一只钵头，放入一只大螯虾……”议论列昂纳德的人责备地看着他。“拔直喉咙还喊着一些荒唐话。导师会说什么？……”

然而导师恰恰很感兴趣。

“您说什么，若尔什克！又喝醉了！哈，哈！大螯虾放进钵头里！哈，哈！喃，究竟怎么样？后来怎么样？想打架？多么淘气的人！没有违法行为记录就算了？喃，谢天谢地。反正他会受到骑兵大尉的申斥。他来了吗？躺在家里？该去看望一下可

怜的人……"

库兹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女仆拿来茶。唯美主义者们一面嚼着英国饼干,发出咯吱咯吱声,一面吸着埃及香烟,继续闲聊。

……罗歇昨天极其迷人……

就在那天晚上。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有客人。在摆满古老意大利家具的拱形大厅里——"塔夫里哲人"就某个罕见的深奥论题在进行着重要谈话。这不是"文艺界"开会,在这个会客室里常常聚合着整个彼得堡文艺界。而那天只是几个被推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士集合在一起,议论外行理解不了的"艺术的秘密"。

库兹明不在。这是自然的。在白胡子教授中间他能做什么呢?

不,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已经两次派人来问"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回来没有"。最后,库兹明走了进来。嘴上叼着香烟,身上一套时髦的西装,散发出香水味,一副轻率、漫不经心的样子。他在这里能做什么?

"您来了多好啊,亲爱的朋友,"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说。"我们在这里就有趣的哲学题目进行争论。教授觉得我的结论没有说服力。我指望您的渊博知识……"

1909年我认识库兹明时,他刚刚把胡子刮掉。如果谈到别的什么人,可以不提及胡子。但是在库兹明的传记中,刮掉的胡子,西服的式样,香水的等级或者他吃早餐的餐馆——都是最重大的事实,可以说是里程碑。根据这些里程碑可以仔细研究他创作的全部"曲线"。

库兹明刚刚把胡子刮掉,更确切地说,他不再对自己的外表

感兴趣，不再每天更换彩色的西装背心，修手指甲。不再用带有自己纹章印记的橙黄色火漆封信封，不再将极浓的"阿斯特丽斯"香水洒在信件上。简短些：彼得堡的唯美主义者圣徒—涅瓦大街阳面的时髦男子的典范，对花花公子生活和唯美主义不再感兴趣了。

不再感兴趣了。但是，裁剪雅致的西服还留着，沙沙作响的纸上的"阿斯特丽斯"香味还未消失。这些没被穿坏的西装，这些未用完的纸突然具有它们从前所缺乏的——与生俱来的、谦虚的魅力。

这些东西不再是(或者不再使人觉得是)生活的目的，可它们却具有了魅力。

侯爵夫人，美人痣，18世纪，模仿的自由思想，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功绩，荷花，尼罗河，努比亚人，又是18世纪和侯爵夫人——至今库兹明所写过的一切——连同领带和彩色的火漆一起都不再使他感兴趣了。但是，领带还未用坏。库兹明抛弃极文雅的题目——转向普通的题目。然而，他的语言、风度、轻佻保留了下来，并且，在不再成为目的之后，却具有了魅力。

1909—1910年。库兹明就要写完长篇小说《非常美的约瑟》，《秋湖》中最后一些诗歌——是他所写的无论散文还是诗歌中的精华。库兹明那个阶段的作品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散文。仿佛，纨绔子弟诗人成了纯粹的诗人，走上真正广阔的道路。

仿佛……

库兹明没有走上"真正的"道路。1909—1910年间他快写完自己最好的作品。《秋湖》以后的书是《陶器鸽子》——水平下降不算急剧，但很明显。下一部小说——《空想家》——也差不多。旧领带没用坏，新的还没有买。《美好的晴朗》仿佛是危险的轻松。优雅的漫不经心很快转变成粗制滥造。由于摆脱了自己过

去“美学”内容,库兹明所写的东西越来越明显地变成没有任何内容的废话。季娜伊达·彼得罗夫娜是个脾气暴躁的下贱货,她施阴谋作践人,她有一只长长的鼻子,无休止地往上面扑粉。而万涅奇克少尉像个天使……这就是中篇小说,或者就是长篇小说的题材。成为坏作品的《美好的晴朗》给乏味的主人公无聊的闲话增添上越来越多的死气沉沉的照片的味道……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刮净的胡子,香水的等级,库兹明用早餐的餐馆,我重复一遍,是他的生平中最重大的事实。他的“娘娘腔”的本性就是这样:细小琐事与重大事情占有同等地位,有时前者还高一些。这样一些作家的命运——无论他们有多大的天才——完全取决于他们所呼吸的“空气”,甚至像库兹明那么多才多艺的人也不例外。

起初,库兹明处于出色的环境——对他来说,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他搬进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住宅。库兹明所写东西的最好部分,或许都是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这位唯一的诗的行家、鉴别家、诗的朋友的“照管”下写成的。诗人本人冷淡无情,难以相处,文绉绉的——但对别人的诗,别人的才能,没有人能像Θ.伊万诺夫那样去理解和善于指点。

在Θ.伊万诺夫住处的生活正是库兹明所需要的。他开始写得更有信心,他诗歌的“音”变得越来越纯。

但是他们的关系起了变化,变得冷淡了,所以库兹明离开了伊万诺夫。他一个人完全无法安排生活——过了不久,他的周围已是新的一伙人,也是文学界的。他又同其他作家生活在一起。库兹明一个人不能生活——他需要呼吸“空气”。现在空气找到了。库兹明就像呼吸伊凡诺夫“塔楼”的空气那样自由了。

现在他在女作家纳格罗茨卡娅的照管下，住在她那里。她是《狄奥尼索斯的愤怒》的作者。现在她给他出些文学方面的主意。爱美的法学院学生和军官学校学生跟随“导师”搬进这位好客的女作家的沙龙后，都感到满意。库兹明也很满意——他上面没有“任何上司”，没有人“派遣”他。享用美味佳肴后，他懒得进行深奥的谈话时，也没有人“指望他的渊博知识”。在这里，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天才，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兴高采烈地惊叫……

……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您是俄国的巴尔扎克！

……库兹明——是从远古时代来到我们这儿的侯爵……

……他呕心沥血熬得自己的哲学……

《狄奥尼索斯的愤怒》的作者、著名的女作家开导自己新的“同盟者”：

“您是精明的人，您是个敏感的人，这些颓废派的人要您毁了自己的才能，请忘了他们灌输给您的一切……您就是自己本人。”

要忘记，那并不难。成为“自己本人”，那挺高兴。写作而不损害自己的才能是那么轻松。现在不用说改写，就是涂改也不常有了。

而且，主要的是，没有任何的自作聪明，没有任何的暗流：季娜伊达·彼得罗夫娜施阴谋作践人，并且无休止地往鼻子上扑粉。而万涅奇卡少尉是个天使……

二二得四，
二加三等于五，
这就是我们会的一切，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极好,极好……(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他呕心沥血熬得自己的哲学……

"您怎么想的,把这些诗编人我书里?"我问库兹明。

库兹明惊讶地看着。

"为什么不编入呢?当时为什么要写呢?既然写了,那就编入。"

他自己把所写的一切都"编入"进去。顺便说一下,他写他不得不写的东西。十四行诗—贯顶诗,长诗,芭蕾舞剧词,其中一页上有关于拜访过诗人的一名女巫的诗(事实上,这首诗是献给纳格罗茨卡娅的,这样做稍微减弱了诗歌庄重的语气),而在另一页上:

四月的春天是多么的欢快,
它是多么地让人心醉;
下一周的周初
我们去博松那儿照相……

事实上,他的确打算去照相。在阿尔贝那儿吃早饭时众人开始讲起这个方案,韵脚就出来了,整篇"小诗"就在那儿酝酿好了。到家后,库兹明认真地把它抄到本子上。他收集整理新书时,没忘记放进这一首。

……为什么不编入呢?既然写了,那就编入……

他在走路时创作诗歌。上您那儿去——路上就作成了。他在他姐姐的孩子们弹琴的房间里写音乐作品。钢琴上的低音部他不需要:孩子们竭尽全力敲击发低音的键。而从另一头,用高

一些的音，库兹明配新的歌曲，胡乱写出自己“有毒的靡靡之音”。

散文他写得很整洁。——干吗要誊清，我的书法不好吗？

姐妹们，沉重感和温柔感——你们的特征是一样的……

《美好的晴朗》和《危险的轻松》是姐妹篇——对于马虎的眼睛，对于不变得仔细的眼睛来说，你们的特征也是一样的……

但是库兹明本人有着多么稀奇古怪的生活，有着多么奇怪的命运！

……库兹明穿着紧腰长外衣和擦上黑鞋油的皮鞋。

……库兹明穿着日本绸缎和服接待客人，用扇子给自己扇风……

……他是来自伏尔加河的古老信徒派教徒……

……他是犹太人……

……他当过面粉店的伙计……

……他在意大利耶稣会教徒那儿受过教育……

……库兹明有一双令人惊异的眼睛……

……库兹明是个怪僻人……

在这些流言闲语中有不少是胡诌，但是在胡诌中也有点滴事实。

丝织的坎肩和马车夫的紧腰长外衣，古老信徒派和犹太血统，意大利和伏尔加，这一切都是组成言行录的彩色马赛克的一块块拼料。

他的外表也几乎是畸型的和迷人的。小个子，黝黑的皮肤，涂上发蜡的稀少的一绺绺头发沿额头和秃顶分成两半，一双大大的惊讶的拜占庭人的眼睛。库兹明的生活经历很奇怪。他将近三十岁时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在这之前从事音乐创作，但时间不长，而从前呢？

从前,早年的生活充满热情,紧张不安。十六岁离家出走,在俄罗斯漂泊流浪,夜间双膝跪在圣像前,然后是无神论,并且差一点自杀。后来重新信仰宗教,去修道院,梦想过修道士生活。探索、失望、迷恋,数不胜数。接着是书刊,书刊,书刊,意大利的,法兰西的,希腊的。最终,心灵平静的最初闪光是在偏僻的意大利修道院,同一名厚道的神甫的谈话之后出现的。还有对艺术——音乐的最初想法……

库兹明准备成为一名作曲家——向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学习。音乐学院他没有毕业,但音乐并没放弃。库兹明在文学方面很快享有名声,或许,包括自己的整个前程,都归功于他从事了音乐。

音乐评论家B·卡拉特金在某地听过库兹明的演奏,十分赞赏。库兹明作为音乐家进入彼得堡的诗人圈子,在那里,大家看出他有真正的天赋。

库兹明的诗歌创作是勃留索夫“教”的。

“您一直在为音乐寻找词,”勃留索夫劝说他,“您找不到合适的,而别人却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们取第一个碰到的词,就很满意。您却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对您来说词同样重要。这就是说,您应当自己创作词。”

“哪能呢,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究竟怎么样创作呢?我不会。我不会押韵。”

就这样,勃留索夫教三十岁的初学者“押韵”。学生原来很有才能。

顺便插一句有关库兹明的音乐的话。他本人是这样作鉴定的:我写的不是音乐,而是靡靡之音,其中含有毒素。

正确的定义。

彼得堡的某个客厅。女士们和一群年轻人,凑到眼睛跟前的单目眼镜,敬慕的笑容。“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弹一曲。”库兹明娘娘腔地扭扭捏捏。“我真的不知道……”“请,请。”库兹明扭扭捏捏走向钢琴。同样娘娘腔地触动钢琴,回眸一笑。“可是我究竟弹什么呢?我不记得,我忘了谱……”

孩子,春天别伸手去摘玫瑰,
玫瑰到夏天才能摘……

库兹明像老太婆般地唱着,有些音发不清楚,伴奏的音乐是迷人而忧郁的。他没有歌喉。18世纪末空洞愚蠢的词,空洞愚蠢的音乐。不是音乐,是靡靡之音,请闭上眼睛:这难道不是一群儿孙围着的老地主婆在弹唱,在回忆青春,回忆古老的多情善感的情歌?

要是在少年时代就知道,
爱情的岁月飞逝有多快,
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放过,
为的是在这里在那里抓住快乐……

不是音乐,是靡靡之音,而且内含毒素。

现在库兹明已经不是在沙龙里,而是在一批行家中弹唱,卡拉特金,梅特涅尔,布劳多。他们仔细地听这古怪的“奇迹”。模仿?那不用说。平庸无味?平庸无味。肤浅?肤浅。但是……

“米哈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再唱一支,再唱一支……”

刺耳颤抖的噪音,伴着平平常常的曲调,流淌着傻乎乎的多愁善感的“小诗”,不动脑筋的韵脚习惯性地碰撞着:

母亲曾对我讲过：
回避可恶的爱情，
不是用针而是用刺，
冒险地朝它刺去。

我顺从妈妈的话，
将接受她的劝告，
但活到了十六岁，
可以无动于衷吗？

库兹明文学的命运也是奇怪的。

1905年以后，俄国“先进的”读者兴趣爱好开始变化。各种各样的“大胆妄为”使读者感到厌烦。在象征主义最初几年雷声大作之后，读者想要的是朴实、轻松，普通人的声音。

库兹明正是在再合适不过的时候出现的。

他第一本书的第一首诗是以当时听起来像启示一般的句子开始的：

在那儿我找到文体，为的是描述散步，
冰冻的白葡萄酒，烤熟了的面包……

是，正是——恰恰是。大家都因高雅文体而感到厌烦，大家都想要库兹明所宣布的《美好的晴朗》。

那时候，库兹明的名字比起任何人的名字来受到更多的关注，被寄予更大的期望。不仅仅是读者，而且像B·伊万诺夫、因

诺肯季、安年斯基这样的人，都对库兹明表示赞许。对于当时有作诗才能的优秀青年来说，库兹明的名字是最珍贵的。

库兹明早期的作品就是现在看来也还是令人折服的。现在，当新鲜的魅力已经消失的时候，这部诗作的所有缺点都隐约地显露出来了。请重读一下《网》，《秋湖》，《爱情的自鸣钟》，最早的三本短篇小说集。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俄国文学的出色的财富。我想它会留在俄国文学中的。

但是：

……究竟为什么要重抄——我的书法很好……

……既然写了，那就编入……

……他呕心沥血熬得自己的哲学……

……上一周的周初我们去博松那儿照相……

美好的晴朗——危险的轻松。

库兹明已具备了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一切。唯独缺乏——坚强。《风吹向何方》。

风起初吹向低级趣味小说，后来回到摹仿风格，以后转向马雅可夫斯基，接着还吹到某个地方去。对于俄罗斯诗歌的命运来说，这种"风向的转变"早已没有意义了。

第十二章

瓦西里岛路的一个寡妇—官太太为是不是要把房间租给古米廖夫而犹豫不决：

“当然，您是有声望的先生……谢天谢地，我了解绅士派头的人……您说自己的房子在皇村？那样的话，租个小房间有地方过夜，什么时候搬来？这样的话，懂了，现在乘火车是遭罪。我相信，先生，也明白，我了解绅士，谢天谢地。像您这样的房客上我这儿是最合适的。只是……您愿意的话，我给您地址，不远，就在图奇科夫大街，也是出租房间。您去看一下，或许合适……”

“为什么我要去看？我喜欢您这儿。”

寡妇装腔作势地笑着。

“我也喜欢您，先生。谢天谢地……我看得出来在跟谁打交道。自己的房子……房客性情温和，有教养……”

“喏，这么说？那就一言为定。明天我就搬来。”

寡妇沉默了一会儿。

“就在那儿，在图奇科夫大街，拐角，好房间，很明亮。一位中校的妻子出租的。先生，您去一趟，您一定喜欢……而我，对

不起,我担心……”

“您究竟担心什么?”

“要知道您自己说是诗人。而要当诗人的,大家都知道,对不起,不很多。我是个老年妇女,安宁对我来说更宝贵。先生,您上中校夫人那儿去一趟……”

无论怎么令人气恼,必须承认老妇人的嘴里说出了处世之道。“当诗人的”人,说真的,不很多——那是些奇怪的、狂妄的、惴惴不安的人……

诗人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去彼得堡收费最贵的理发师莫拉那儿修面。

“您为什么去那儿?那么贵,而且刮脸的方式有点怪。”

“嗯,”纳尔布特扯着嗓子笑,“嗯,说真的,是贵了的。一下,二下,三下——润肤液和香水,3个卢布。而且刮脸也是,一下,二下,三下,太快了。一下子——一面脸颊,又一下子——另一面颊。可怕——好像鼻子就要给刮下来了。”

“那为什么还去?”

纳尔布特被天花弄得满是麻子的脸笑得更欢。

“嗯!他们那里都说法语。”

“那又怎么样?”

“爱听。像听音乐,好听又不懂……”

这位纳尔布特是个怪人。

1910年出了本书:《纳尔布特·诗歌》。是一本精湛的书。题材是朴直的:雷雨,傍晚,早晨,丁香,初雪。然而诗歌散发出清新和机灵的气息——《天生的才华》。

其中许多诗歌太差,有的有点粗鲁,有的带着土里土气的美(这是因大部分诗歌是在沃罗涅日省的穷乡僻壤作成的),许多

诗简直不成熟。但是，书还是引起了注意，在《俄罗斯思想》和《阿波罗》杂志上勃留索夫和古米廖夫对此书给予非常好的评价。他们不仅对诗歌感兴趣，对其作者也感兴趣——他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原来，纳尔布特是著名画家叶戈尔·纳尔布特的兄弟。他们向画家问长问短。画家直摇头。

"我的弟弟？没什么，小伙子有才能。只是别指望——不会有大的作为。喝酒厉害，总之是个流氓……"

"他在哪儿？"

"在萨拉托夫省自己家里，那里有他的小庄园。想必在酗酒——秋天他总是纵酒：把收成卖光……"

"他不打算来彼得堡？"

"打算来，别担心。特别是现在，你们在《阿波罗》上对他赞不绝口。你们来得及认识……并且来得及后悔认识……"

谈话是在11月。而到了1月，因《阿波罗》合作者，"贵族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的案子，《阿波罗》的秘书作为见证人被传去出庭。纳尔布特最后打算去彼得堡。就在第一天的晚上，因"侮辱执行公务的警察"被拘留。夜间，在从"达维德卡"酒馆去另一家小酒馆的路上，陪同他的一批吃白食者挑逗他，到了阿尼奇科夫桥上，他试图骑上克洛特雕塑的一匹马的马背，把阻止他的警察狠狠地打了一顿……

纳尔布特来彼得堡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骑上铁铸的马，支付根据法庭所判定的应付的罚款和认识文学界人士。他有更为严肃的目的——他要震惊彼得堡和文学界。

当有人对纳尔布特讲起他那引以为荣的从前的诗歌时，他只是神秘地宽厚地微笑：等着吧，是那么回事嘛。很快，许多地方的文学栏透露出消息：纳尔布特出版新书《哈利路亚》。众所

周知，诗人赋于这本书问世的意义与这一事件给读者的印象恰恰相反。根据勃留索夫的统计，读他书的人，全俄有一千人左右。很难怀疑勃留索夫出于谦虚估计过低。而统计时，正是勃留索夫在全俄走红火的当口，读者对他很感兴趣。对新诗人又能期待什么呢？从《阿波罗》和《俄罗斯思想》杂志上认可的评价到享有名声，至少，像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那样，要走很长一段路。纳尔布特尽管非常自信，但也明白这一点。可是因为他很想得到荣誉，等待不合他的禀性，而安于小名气他又不甘心。于是，纳尔布特决定加快事情的进程。

《哈利路亚》手稿送到锡诺达利印刷厂排版，但由于非宗教的内容而被拒绝。事实上内容是"非宗教的"——其中，诗歌的一半的词是有伤大雅的。

纳尔布特需要锡诺达利印刷厂，是因为他想用教会斯拉夫铅字排版。并且不是普通的，而是精选的铅字。其它印刷厂没有这样的铅字。没有办法——只好去买铅字。合适的纸在彼得堡也找不到——从巴黎订购。纳尔布特给排字工人和拼版工人发小费，支付加班费，甚至雇用一个教会斯拉夫语正字法专家……三个星期之内这一杰作印刷好了，用带点浅蓝色的纸做封面，标题用红色大写字母，并且(萨拉托夫自己知道)作者肖像上衣衣襟襻里插着菊花，肖像下面有豪放的签名……

为了庆祝这一重大事件，纳尔布特甚至在"维也纳"安排了在这"文学饭店"里从未有过的丰盛筵席。鲍里斯·萨多夫斯基在早上三点多，用自己的"大口径短手枪"朝镜子射了共 6 颗子弹，仿佛是对费德杰伊·布尔加林的回击，差一点把餐厅主任抛到窗外——已经在台布上晃了一下，差一点掉下来。纳尔布特穿着浇满甜酒的燕尾服，领带歪在一旁，用槲实做成的花冠推在后脑勺，咕噜咕噜地喝着啤酒杯里的某种可怕的混合酒，接受着

祝贺。戈罗杰茨基(槲实做成的花冠是他带来的)比所有人都卖力讨好“受庆贺者”。戈罗杰茨基已经同他喝得以“你”称呼了,现在,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在作预言:

“你……你……我相信……看出来……将是第二个……科利佐夫。”

但是,纳尔布特不满地摇了摇头。

“科利佐夫?不不要……”

“怎样?”戈罗杰茨基大吃一惊,“不想当第二个科利佐夫,那究竟要当谁?尼基京内?”

纳尔布特皱起自己高低不平、没有眉毛的额头。他那一对敏锐的小眼睛调皮地闪亮了一下。

“不……卡布里埃·丹努齐奥……”

《哈利路亚》并没有给纳尔布特带来卡布里埃·丹努齐奥的荣耀。根据法庭判决,书被充公销毁。

我不知道,这一挫折是否影响纳尔布特,或者他所蕴藏的所有创作能力都消耗在《哈利路亚》上了。

……纳尔布特不喝酒了……纳尔布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公共图书馆里……纳尔布特奔走往返于大学……对于了解《哈利路亚》作者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是事实。纳尔布特“老成了”。

在这“寂静”时期我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相当频繁地见到他。记住了二三次谈话。我并不认为,在这个酒鬼和胡作非为的人身上,那么坚定地具有激情,对“美好事物”具有天真的“激情”……

他用蹩脚的烟卷不时地敲击自己不体面的又大又重的烟盒(并且用纳尔布特家族钻石纹章装饰的),皱着有麻子的额头,结

结巴巴地说：

“有人把我当傻瓜，我知道。真是个畜生——收割完庄稼，掠夺庄稼汉，把钱买酒喝光。写诗是为了转移视线，而剥得深些——是个农奴主。不是人，几乎是头猩猩……而我？……”

沉默。一对尖锐的、冷淡的小眼睛的凝集的目光。平时狡猾的“乌克兰人的”冷笑消失了。叹一口气。

“而我？……如果我看着拉斐尔的画并且哭泣，我是什么样的傻瓜啊？这……”他从也是用皇冠装饰的钱夹子中取出一张磨损了的明信片，“这，……西斯廷……圣母……我在国外。那儿是柏林，‘动物园’，用鱼子喂虎，——没什么，吃了还要，——看得出来比人肉好吃，一个冬天的园林。啱，废话，低级趣味。白兰地酒令人厌恶，然而便宜，比伏特加便宜。我们喝醉了，喝醉了。我不知怎么到了德累斯顿。也是和一伙人，醉醺醺地，已经记不得了，怎么来到的，它叫什么……油画馆……不，这是在慕尼黑的油画馆。啱，反正都一样，走啊，看啊，啱，都清楚，——博物馆，图画，裸体女人，野兽……走啊，看啊——记得从一家酒馆沿路到另一家酒馆——偶尔顺便走了进去。突然，在一扇门旁有个看门人，那么老的一个德国人，向我们作了个手势，说这里禁止嚷嚷。我们感到惊讶，但还是咬住舌头，或许在那个房间里威廉或者某个俾斯麦也在参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平平常常的不大的一个厅，墙上挂着这幅……西斯廷圣母。”

“我站在她面前大概有半个小时，我把自己的小贱人打发走，她懂什么。本人站着，眼泪自己淌了出来。也许我就一直站到傍晚。自己强迫自己离开，够你的啦，本来就够受用一辈子啦！那么漂亮，那么纯洁，这是主要的！我给了看门人25个马克——我说不是给你的，为了表示对她的尊敬……他好像明白

了……”

纳尔布特沉默一会儿，他那一对淡色的小眼睛模糊不清。两滴眼泪从没有睫毛的红眼皮下淌了出来……

“……是的，这是美，这是艺术。看了半个小时，受用一辈子。受用一百次生命！在这之后我悲观失望地喝酒，喝得很多。整个德累斯顿被闹得底朝天。差一点上法庭——打了新任市议员的耳光。没关系，用钱赎了出来。是的，这是艺术！或者还有普希金：

格鲁吉亚的山岗上一片夜雾，
阿拉格瓦在我面前喧哗……

“对这些诗歌我甚至不能心平气和地去思考。现在心在开始猛烈跳动。当我在高加索时，特意去看这条阿拉格瓦河，小溪令人厌恶，顺便说一下，是混浊的……

“喏！如果我感觉到美，我算什么猩猩？

“我胡作非为，也不怕勃留索夫，这是因为我知道，对他，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他，第三者——一个价。如果是猩猩的话——那么大家都是猩猩。而普希金——要是去当他仆人我也认为是幸福的。您只要细听一下：

阿拉格瓦在我面前喧哗……

“他见到了名为阿拉格瓦的烤羊肉馆，他为此写出了怎样的作品啊！美丽的诗句啊……”

泪水从纳尔布特眼睛里一滴一滴地淌了下来。他并没醉。二三杯伏特加是刚才喝的，不算什么。

变得老成持重的纳尔布特决定出版杂志。

他懒得张罗安排出版杂志的事,要不是遇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想法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廉价月刊《大众新杂志》的情况在更换了几名出版者和编辑后变得很糟糕。这家亏损企业的最后一位编辑向纳尔布特推荐了这本杂志。他没有怎么犹豫。事情对纳尔布特来说是最合适的了。什么也不用张罗,一切都是现成的:办公室,同印刷厂的合同,纸张,名称。这事好像发生在3月,4月号已经是新业主编辑的了。

《大众新杂志》订户在读了这本4月期刊后可能会疑惑不解。杂志是有"倾向性"的,订户都是乡村教师,女医士,那些被称为"乡村女知识分子"的人。纳尔布特送到这些习惯于奇里科夫和穆伊热利的读者面前的,却是《哈利路亚》风格的诗歌,伊万·鲁卡维什尼科夫的散文,从政治到农村经济的文章专栏部分却是辩论高峰派,其中最前面的一篇是纳尔布特自己的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报告。并且声明,上期出版者允诺的增刊——两本现代消遣性作品,用新的代替——乌克兰哲学家斯科沃罗达的文章和由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翻译的勃德列尔的诗歌。

订户理所当然很气愤。编辑部收到大量困惑不解的和直接骂街的信件。新编辑部作出"勇敢的举动"来回答这些信件。它宣称《大众新杂志》绝不意味着为"所有笨蛋和庸人"办的。要读奇里科夫而不要斯科沃罗达和勃德列尔的订户其订阅将被停止。他们想要满意的话,可以去选择一些拙劣的作品——《欧洲通报》书刊,"纳德松或者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论文。

现在针对纳尔布特的已不再是责备,而是号叫声了。报刊上仿佛能听到"可耻""流氓行为"等等咒骂声。最使纳尔布特大为吃惊的是,他的那些文学朋友,显然认为刊登勃德列尔比奇里科夫好,并且知道斯科沃罗达是什么样的人的人士,现在几乎都

说一样的话。这一点,纳尔布特没有料到。他在指望称赞和支持,结果得到的不是期待中的桂冠,而全是不愉快的事情。于是他决定放弃杂志。但要放弃谈何容易。关闭?那样不仅付清的钱款完了,而且还得要偿还大量的"庸人和笨蛋"的订费。纳尔布特不想这么做。出卖?可是究竟谁会买呢?

买主找到了。纳尔布特在一家酒馆狂饮,同某某人偶然相识,同某某人讲了想出售杂志社的意愿。在这狂饮作乐氛围中(自从编辑杂志不成功后纳尔布特"尽情纵酒")突然碰上了买主本人———一位仪表优雅,胖胖的具有商人气质的先生,好说话的,而且不特别吝啬的人。夜间,某个酒馆,在粗犷的乱喊乱叫和瓶塞的噼啪声中——同饮以你称呼,一言为定。到早上,头发蓬松没睡醒的纳尔布特已经在公证人处签契约了——买主很焦急。

过了约两星期,像是一声惊雷:大家不知怎么一下子都知道了:"颓废派分子纳尔布特"终于还是把"思想先进和民主"的杂志出卖给了俄罗斯人民协会成员、杜布罗温的朋友加里亚辛……

在发生了杂志社卖给加里亚辛这一事件之后,纳尔布特从彼得堡消失了。哪儿去了?要很久吗?谁都不知道。在他重新出现之前,消失了约三个月。

他是这么出现的。所有彼得堡的编辑部都收到了简短而又感人的电报:

"阿比西尼亚,吉布提,诗人弗拉基米尔·纳尔布特已同阿比西尼亚梅涅利克君主的女儿订婚。"

人们很快收到有阿比西尼亚邮戳和邮票的信,邮戳和邮票中央纳尔布特家族纹章引人注目,纹章印在带有金色火星的紫

色火漆上。在邮戳"吉布提，大公宅邸"下的副标题写着：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是我的朋友的话)，请接受寄自吉布提的问候，我很羡慕你们，因为在彼得堡更好些。我来这儿射杀狮子，躲避耻辱。但是狮子没有，耻辱我认为现在也没有：我怎么知道他是黑帮分子？我不像温格洛夫，什么都知道。这里是难以忍受的烦闷。不知怎么鬼使神差上这儿来的？然而，我很快回国，一切面述。

"……我同梅涅利克女儿的婚姻没有成功。因为她不是他的女儿。而且有关梅涅利克本人也有谣传，说他 7 年前就死了……"

纳尔布特从非洲回来，脸黄黄的，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在他马上安排的"招待会"上，他乐意回答好奇的人有关阿比西尼亚的问题，但是，从他叙述中，"金色非洲巨人国"有点像俄国偏僻地区：泥泞，苦闷，酗酒。有人甚至表示怀疑，他真的去过那里没有？

纳尔布特鄙视地看了一眼怀疑者。

"等古米廖夫来了后，就让他考考我。"

"……我究竟怎么考你，"古米廖夫沉思起来，"什么语言你都不知道，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好吧，什么叫做'捷克利'？"

"三分之一糖酒，三分之一白兰地，苏打水和柠檬。"纳尔布特回答得很快，"只是我喝的不放柠檬。"

"嗯……"古米廖夫还说了一个某地方当地的词。

"烤乳猪。"

"不是乳猪，而是一般猪肉。喏，好吧，现在你告诉我，如果你去吉布提，离开火车站往右走，看到的是什么？"

"花园。"

"对的，而花园后面呢？"

“了望塔。”

“不是了望塔，而是古塔的遗迹。要是再往右，塔的后面，拐角处呢？”

纳尔布特没有眉毛的麻脸油光光地笑逐颜开：

“当着女士的面不便说……”

“没撒谎，”古米廖夫拍着他的肩膀说，“去过吉布提。我证明。”

人们很快发现，纳尔布特从非洲带回的不仅有知识，还有疟疾。难怪他脸色黄黄的。令他伤心的是疟疾完全不是异国的。“也许是在平斯克得的吧？”医生问他。

纳尔布特起初去乡下养病，然后去了南方什么地方。1916年曾在彼得堡短期呆过。准尉身上的大衣像只大麻袋，一只手用吊带吊着，样子阴沉。后来谣传纳尔布特给枪毙了。其实没有。1920年我在书店里见到一本薄薄的书，是由国家出版社某个省的分社出版的：《纳尔布特。红色的流言》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我翻开书，“财富”和“恢复”这样的字句马上立即跳进了我的眼帘。我把书扔回了柜台……

第十三章

有的回忆像梦,有的梦像回忆。当你回首“并不遥远的和如此遥远的”往事时,自己有时都不知道,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梦。

是啊,有过“战前的最后一个冬天”和战争,有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情也都曾发生过。但是,如果要回顾得更仔细一点的话,过去的一切便会在那儿交织、消遁、变幻。

……茫茫雾色中,宽阔的河面上横卧着桥梁,座座宫殿矗立在花岗岩堤岸旁,两个细长的金色尖顶泛出微光……有些人在街道上行走,有些事件正在发生。这不,马尔索沃广场上沙皇阅兵……现在冬宫上空红旗飘扬。年轻的勃洛克在朗读诗歌……此刻,“心血耗尽”的勃洛克又正被安葬。拉斯普京昨夜被杀。而这个正在演讲的人(他的话听不清,只听见听众表示赞同的低沉的欢呼声),名叫列宁。

是回忆?是梦幻?

一些人的脸、会面和谈话的情景在记忆中瞬息闪现,没有联系,数不胜数。有时很模糊,有时又像照片一样的清晰……又是茫茫雾色,透过迷雾隐约可见的是涅瓦河和座座宫殿;人们在行

走,天上下着雪。大钟敲奏出帝俄国歌的旋律……

不,大钟敲奏的是“国际歌”。

天上下着雪。走出温暖的车厢,立即感到解冻时节的寒气潮湿、刺骨,直往袖口和领口里钻。深夜来皇村,这是一个什么主意啊?!……但没有办法,已经来了,又没有回程火车。

路灯发出暗淡的光。树枝上挂着霜。天上星星闪烁。

“哎,马车……”

雪橇轻巧地在松散的开化了的雪地上飞驰。在道路的拐弯处,戈罗杰茨基殷勤地搂住我的腰。曼德尔施塔姆坐在我们的膝盖上。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在前面那辆马车上指路——来皇村看夜景正是他们想出的主意。他们自然有兴趣——他们是皇村人哟。“可我们,我们大家”则不尽然。真的,这很蠢。在文学聚会上喝了不少之后,又去另一个地方“喝咖啡”。接着再去一个地方。深夜一点出现在皇村火车站。脑袋由于在这里那里喝的“咖啡”而晕晕糊糊的。

“我们去皇村吧……看看伊诺肯季·安年斯基喜欢坐的椅子。”

“好,上路,上路……”

真的,先前怎么没有想到?没有比这更妙的主意了,不是吗?深夜,踏着积雪,到皇村花园一个僻静的角落——去看一张椅子。作为享受这份快乐的代价,事后得一直等到早晨7点第一班开往彼得堡的列车的到达……

但“咖啡”在起作用,脑袋晕晕糊糊。

“好,上路,上路……”

于是,我们来到了皇村。在温暖的车厢里,颠簸得厉害。在化雪的寒气中,疲惫不堪。真的,多蠢。为什么要来,来到的又

是什么地方啊?!

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他们轻车熟路——他们是皇村人)在前头指路。曼德尔施塔姆坐在我和戈罗杰茨基的膝盖上,他简直冻僵了,人变得很沉,像只大麻袋,一直默不作声。还有两位"阿克梅"派成员坐在后面的第三辆马车上,紧紧地跟着我们:他们没钱付车费,要是落下的话,那可就完了。

在一扇大铁门旁,我们停了下来。随后踩着齐膝的积雪步履艰难地朝前走去。挂上霜的树枝簌簌作响。天上星光暗淡。我们还是按原先的秩序走着,我和格罗杰兹基搀扶着身子越来越沉的曼德尔施塔姆。积雪越来越厚,寒气越发刺骨。噢,上帝……

古米廖夫转过身来。

"我们到了! 这就是安年斯基喜欢的地方。就是那张椅子。"

积雪、大树、椅子。椅子上有个佝偻着身子坐着的人影。还能听见他轻声地、语气单调地读着诗歌……

……深夜,在皇村花园僻静的角落,一个人坐在满是积雪的长椅上,望着星空、朗读诗歌。深夜、诗歌,正是那张长椅。刹那间我害怕起来——怎么会……

但这不是安年斯基的幽灵。那坐着的人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转过身来。古米廖夫走过去仔细辨认……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您? ……我差点没认出您。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你们。这几位是诗人车间成员:戈罗杰茨基、曼德尔施塔姆、格奥尔吉·伊凡诺夫。"那人笨重地站起身来与我们握手,同时自我介绍道:"科马洛夫斯基。"

他的声音不高,嘶哑而呆板,没有语调。握手也很呆板,像机械人一样。好像他对与我们见面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们是来看这张椅子的。对,对,就是这张。当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坐坐。这里是个好地方,安静、偏僻,即使白天也很少有人来。不久前,有个学生在这里开枪自杀了,到第二天才被发现。静谧的地方……”

“就在这张长椅上自杀的?”

“就在这张长椅上。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挑这张椅子。大概是因为它位置偏僻的缘故……”

“晚上您一个人坐在这里不感到害怕吗?”我插嘴问道。

科马洛夫斯基朝我转身微笑。路灯的光线投射到他的脸上。这是一张圆圆的、“普通的”脸——德国中等商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双颊红润。表情和微笑都带点呆板。

“不,身体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除了一个念头:‘毛病会复发。’”

在我们简短的谈话中,他数次重复“我的病”、“我身体好的时候”、“那时我病了”。这个肩膀宽宽、两颊红润的人会有什么病呢?

“……毛病会复发。”我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的最后几个字。

“是的,”他说,“毛病。精神失常。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知道这事。现在我‘神志清明’,所以我出来散步。不过,我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医院里的。”

他声音不变地继续说道:“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急着赶路的话,那儿便是寒舍,让我们去喝点茶、读读诗歌吧。”

……在挂着明亮吊灯的宽大餐厅里,我们用细细的浅黄色的高脚酒杯喝着托斯考伊甜葡萄酒。朝向花园的玻璃门开着,园子里一片冬日景色。壁炉里火烧得很旺。此外,室内灯光耀眼。餐厅和相邻房间所有的吊灯、壁灯、台灯都点亮了,就像在举行舞会一样。但主人觉得光线还不够。他唤来了仆人。

“把枝型烛台点上。”

“是，大人。”

房间角落的四只高大的水晶烛台上的近百根蜡烛又被点燃了。

长着一张圆脸的双颊红润的主人呆板地微笑着：“我不喜欢房间里暗……”

卡马洛夫斯基仔细地听我们读诗。然后，他朗读自己的诗歌。

他坐在一张深深的圈椅里，穿着厚厚的美国短靿皮鞋的双脚叉开着。稀疏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圆圆的红润的脸庞，像由牛排和啤酒滋养的德国小市民一样。脸上的神情表明他诸事顺遂、衣食无忧。双眼明亮，但时而又显得惺松。

……这是个十足的病人。病情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医生们都摊开双手：他怎么还活着。他的心脏极其衰弱，一丁点的激动不安都可能是致命的。突如其来的喧闹声、看见血或者其它一些风吹草动的小事都能使科马洛夫斯基昏厥过去。而“那个毛病”常常会随着昏厥而发作。他注定会猝死，他本人也知道这点。对他来说，穿越马路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而坐火车去彼得堡则更是奇迹了。

他唯一的强烈的愿望是去一趟意大利。但对他而言，这是难以实现的，就如同要去火星旅行一样。他整天读那些早已能背诵出来的旅行手册和描写意大利的书籍聊以自慰。他在诗中写道：

我缓步而行
把小石子放进袋中
在那里，面对新的发现

幸福的温凯尔曼曾喜极而泣。[1]

二三个月——他“平静”地生活。幻想着意大利之行。写诗。夜里，在满是积雪的花园里缓步走向位于偏僻角落的“自杀者的长椅”。

“……身体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除了一个念头：‘毛病会复发。’”

“……把枝型烛台点上。我不喜欢房间里暗……”

二三个月。然后，某天深夜，他醒来，觉得自己被火红色的狮子包围，他高声叫喊着，想躲开狮子……然后便是医院、冰袋、拘束衣……然后，经过好几个月，又是短暂的清醒……

科马洛夫斯基是不久前出院的。那次毛病发作得很厉害。旁人都认为他这次是活不下去了。但他却挺了过来。他用平稳的、有些呆板的声音朗读在“那儿”开始酝酿的诗歌。躺在疯人院病床上的人能向往什么呢？

向往罗马、荣耀、恺撒大帝……

灯盏华光四射，花的香味和壁炉的热气令人呼吸不畅。平稳的声音语气单调地读着：

乌云裂开缝隙，从中射出金光一片，
在金色的缓缓前行的银鹰徽帜的后面
身披阳光的军团正走向
天际中射出金光的那道曲线……

他的诗歌既灿烂又冷峻。大概，是最灿烂也是最“冷若冰霜”的俄国诗歌。与之相比，勃留索夫的“帕耳纳索斯山的诗篇”犹如幼儿癔语。但是，就像科马洛夫斯基的声音和笑容一样，他

诗歌的"灿烂"当中也有某种呆板的东西。还有某种使人不太舒服的熏人欲醉的东西,如同这间壁炉烧得太热、灯光太亮、花插得太多的房间里的气味一样。

……我们听诗,喝托斯考伊甜葡萄酒,交谈着。最后,与主人道别。走出这间带着香味的闷热屋子,舒畅地呼吸新鲜空气是多么惬意啊!那屋子除了闷热之外,在伊斯密尔地毯和塞佛尔花瓶之间还散发着某种气味……

上冻了。黎明前的天空现出蓝色。半小时后就会有火车回彼得堡。噢,在过了一个奇怪的没有合过眼的夜晚之后,多么想快点上床啊!

这是1914年2月或3月间的事情。科马洛夫斯基说过秋季的打算。大夫们希望……如果不发病……去意大利旅行……

他打开报纸,读到战争爆发的消息,便倒在了地上。人们起先认为他是晕倒了。不,原来不是晕厥,而是死亡。

从位于水池路的文学家之家回到石头岛大街的住所,路并不短。在特洛伊茨桥上,我把装黄米的袋子放到地上(我正是为了这袋东西才做此长途旅行的),倚在栏杆上休息一会儿。

晚霞映红了天空。海上吹来温暖、潮湿、"芬芳"的风。涅瓦河上的雪粘在一起变得软软的,融化了的冰水泛出黄色,在岸边浮散开来。如果天气不变的话,那就无法从冰上直接去喀琅施塔得了。然后会出现浮冰,喀琅施塔得就可望而不可及。这样一来……

温暖的风时而轻柔,时而有力地吹拂到脸上。远处传来炮声:低沉的发自要塞,尖利的来自某艘依旧"忠于革命"的巡洋舰。天空发红,预示着要下雪……周围空无一人。"在街上行走"——按规定只可以在允许晚上6点之前。现在是5点,最后

一个小时的开始。但大家都已下班回家了,没有人会心血来潮,要在街上散步。最好还是在家里坐坐。如果天气不变的话……浮冰就会出现,喀琅施塔得就可望而不可及了。这样一来……

我也该回家了。我把袋子放到肩上,加快了脚步。当然,街上可以步行到6点,我还有15分钟的路程,但最好还是快一点……

空荡荡的桥上,有个人朝着我慢慢走来。他步履很轻,手掌拍打着栏杆,显然不慌不忙。他停下脚步,点火抽烟,又把火柴棍扔到冰面上。戒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仿佛同他毫不相干。或许,事实正是如此。那样的话,我们的相遇将会令人不快。"步行"可以到6点,我的劳动登记册也没有问题……但是毕竟……

羊羔皮帽下面露出一绺鬈曲的灰白头发。眼窝浮肿很明显,嘴边皱纹更明显。宽宽的背有点驼。双手因怕冷而插在口袋里。冷漠、"心不在焉"的眼神。

这不是检查证件的肃反人员,这是勃洛克。

红色的天空下,在空荡荡的桥上,我们听着炮声站了一会儿。几声低沉的是要塞打的,轰隆作响的是从巡洋舰上发出的。

"黄米收到了?"勃洛克问,"10磅?这不错。如果煮得稠一点,再加些糖……"他没有讲完这句话。就像想起了一件愉快的事情那样,他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打炮呢,"他说,"您相信会决出胜负吗?我不相信。记得吗,丘特切夫在诗中写道:

与那些为了重新安葬而复活的死人,
我们浴血奋战……

"死人与死人搏斗。因此,谁胜利,都一样。

“顺便说一句，”他又笑了，“您觉得可怕吗？我不觉得。一点都不。这合乎常规。活人……事后才会觉得可怕。”

1913年冬，一天，按彼得堡的标准来说还是很早的时候，女仆把我叫醒了：“有位先生来找您，说是关于文学上的事。”我揉揉眼睛，读了一下名片：米哈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科瓦廖夫？我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这会是谁呢？莫不是某个出版商，喜欢我在《阿波罗》或者《北方》上发表的诗歌，跑来购买我的作品集？什么事不能有呢！……我不无激动地叫女仆把来访者请到客厅里，我这就穿衣起床。但我还没来得及这样做，客人已经径直走了进来。

“您躺着吧，躺着吧。”他说话速度很快，P和Λ音发得不清楚，C和З则念得有点像Ш和Ж。“您躺着吧，我只占用您一分钟的时间。什么？可以坐这儿吗？什么？我马上就走，您继续睡觉。您这儿多冷。什么？您开着通风小窗睡觉？啊，这太诱人了，但我不行。会得感冒的，会得肺病，会死去。什么？我肺不好……”

他突然摆出一个姿势，就像准备做腾越的芭蕾舞女一样：头微偏，手朝向一边，双脚在第三位上，同时速度很快地、拖长着声调、C、Ш音不分地朗读道：

我们并肩而行，
他浅浅一笑，开口说道：
你可知道，我患有肺痨，
我早就在进行治疗。

读完后，他装腔作势地微笑着补充了一句：“我是诗人留里

克·伊夫涅夫。这是我写的诗。"

在他又说又做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地上下打量着他。

他体形单薄,"孱弱"。苍白的、瘦瘦的、"鸟儿般"五官细小的脸不时地在抽动。浅蓝色的眼睛由于近视而眯缝着。他穿着既考究又随便:西服质量很好,但皱巴巴的,都是灰,后襟上还粘了一条线。鞋子没刷干净,时髦的领带歪向一边。心神不定的微笑,心神不定的脸部抽动,每句话后面出现的心神不定的"什么? 什么?"……

"我是诗人留里克·伊夫涅夫。这是我写的诗。什么?"

读完以后,他又C、Ш不分地快速说道:"我是怎么得到您的地址的? H告诉我的……知道吗……这一位……他常去我叔叔X家(此刻,'鸟儿般'的脸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家叔是国家稽查员。什么? 这个H给我读了您的诗,我便喜欢上了它们。什么? 我甚至把它们背了出来。等等,怎么说来着? 对了: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举办舞会的夜晚,
那是一场在老椴树林里举办的夏日舞会,
在那里,河流勾勒出
自己最显著的曲线。

"就是这个'勾勒出',"他拖长音调,"使我着了迷。于是我跑来把这个告诉您。我现在就走,您睡吧……什么?"

我感谢他的美意,同时赶紧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他刚才读的那首诗不是我写的。那是维克多·霍夫曼的作品,路人皆知,早就被印在各种日历上,也被朗诵者多次朗读过,因此……

伊夫涅夫稍稍有点惊讶:"不是您写的? 霍夫曼的? 多奇怪啊! 不过,这无所谓,要知道,那诗很像您的手笔……"

我建议他在隔壁房间里等我一下："我这就穿好衣服，我们一起喝杯咖啡……"

鸟儿般的脸高傲地皱起了眉头："咖啡？谢谢，我已经喝过自己的巧克力早茶了。总之——现在几点了？噢，上帝，10点15分了。12点我要在C公爵夫人的府邸用餐，我要回家一趟，换衣服。公爵夫人美艳绝伦……你们见过？什么？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啊，已经太晚了……"

他点了点头便跑了出去，边走边抽动着脸。他的一只手套被遗忘在圈椅上。手套很精致，浅黄色麂皮做的，有绸子的衬里。但一月里戴这种手套不太合适，尤其是手指处都脱了线脚……

从某时起，留里克·伊夫涅夫成了"野狗"俱乐部的常客。

他整夜坐在烧得旺旺的壁炉旁，独自一人，默不作声。"鸟儿般"的脸显得苍白，好像要比平时更白，近视的亮晶晶的眼睛对着火光眯缝着。在他跟前的"矮桌"上放着一杯正在变冷的黑咖啡：他不喝啤酒。

他不喜欢读诗，别人请他时，他推辞道："下一次吧，我记不住……"但有时，临近清晨的时候，他会自己走上舞台："我为大家读一首……"他的诗不连贯，因情感强烈而显得"气喘吁吁"，要散架似的。大多表现可怜、无援的情绪。不过有时也会突然有某种歇斯底里的发作：

头巾被血染红。
我们的船绕过海岬。
小鸽子，我们的小鸽子，
我们的小鸽子正在死去。

读完以后，他哆嗦了一下，朝着带有醉意的报以稀疏掌声的听众惘然一笑，又走回自己的角落，面对壁炉里燃烧的木柴，眯缝起近视的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听着，留里克，您为啥整夜坐在这里？要知道，这对您不好……"

"不好……"

"苦闷难受……"

"苦闷难受。"

"那您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他抬起双眼。水汪汪的浅蓝色的眸子里闪过一丝痛苦、一丝"异常"……

"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您瞧……在日常生活里，我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非现实性，因而疲惫不堪。而在这里，在这虚幻、怪诞的环境中，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是幻影，周围也都是幻影……我很舒心……"

但紧接着，就像感到了畏惧一样，他脸上溢开了做作的笑容："不过，您是对的，您是对的，这不好，再不这样了。"他像麻雀那样为自己"涂脂抹粉"："噢，我是多么的散漫……"又像麻雀那样做出神气的样子："德茹茨卡娅公爵夫人……光临家叔的晚会……什么？您明天去参观画展预展？什么？"

他叽叽喳喳地说着，好像不是他在半小时前像患歇斯底里狂叫病的女人那样嚷过：

如何躲避这清醒，
如何躲避这肮脏？
难道要用剃刀自刎不成？

上疏受理办公厅主任尽管对各种千奇百怪的请求已经习以为常,但在读了"九级文官米哈依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科瓦廖夫"的呈文之后,大概,还是感到疑惑不解。

"九级文官科瓦廖夫"面对沙皇"伏地求恩",并用"极端忠君的",同时又是坚定的口气声称(这是在 1915 年):他拒绝服兵役。

紧接着做了解释:他科瓦廖夫其实不属于应征之列,至少近期是这样。因此,他所做的上述声明并非基于个人的想法,而是源自对"陛下和俄罗斯"的责任感。对这一责任感他的理解是:放下武器,用钟声迎接胜利者,"作为快乐的抵偿"。

不难想象,假如不是经过多方查询并且了解到呈请人不仅是个"九级文官",还有一位身分不同一般的叔父的话,这份呈文原本会送往哪儿"办理"。

在有关方面知道这层关系之后,科瓦廖夫便得到了这样的"照顾":电话没有打到暗探局,而是打到他叔叔任职的国家稽查部门。于是,不是伊夫涅夫等待的宪兵(呈文递上以后,由于紧张、等待,伊夫涅夫病倒了),而是他那满脸泪痕的婶婶冲进他的屋里,把他带往——不是西伯利亚!——芬兰的伊玛特拉。

两个小房间,又窄、又低、又挤,简直不像房间,像两个盒子。如同在盒子里那样,各种东西都是软软的:小小的沙发上铺着厚条布,低低的绗过的圈椅,绒毛靠垫、铺衬、地毯,两个房间用一个炉子,不过,炉子很大,圆圆的,烧得很旺,令人呼吸都感到困难。藤编的花篮里插着老鹳草。屋角有神龛,挂满了圣像。如果拉开薄纱窗帘,可以看到窗外高高的顶部插着钉子的栅栏,厚厚的雪堆和拴着链子跑来跑去的一条大狗。这是在哪里?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畔?不,这是在彼得堡,伊夫涅夫按自己的口味

找到的居所。从芬兰回国后，他便独立住开了。

在这两个像盒子一样的房间里，每逢星期五晚上总聚集起20至25个人。刚好挤得下。他们就着小点心喝茶，而有一半客人是用茶碟喝的：聚在这里的人与常人不尽相同。

……穿长袍的男孩有一张白里透红的脸，浅色头发，他是谢尔吉耶夫教会会馆的见习修士。旁边那位也长着一张“神职人员的脸”，是个辅祭，谢顶，胖得不得了，他因为和教派信徒有关系而被免去了教职。同他一本正经谈话的是个中年人，“O”的口音很重，穿着长筒靴和紧身外衣，有一双聪敏，冷漠的眼睛。这是诗人尼古拉·克留耶夫，“庄稼汉中的一员”——他是这样自称的。“庄稼汉”抹粉涂脂，洒了很多“罗兹·扎克米诺”香水……

另一位“庄稼汉”诗人也搽胭脂，那是蓝眼睛的叶赛宁。和他们交错着在一起的有贵族子弟学校的学生、法学院的学生、某个被流放过的前副省长、某个“心灵磁石”的发明人（他认为“心灵磁石”是将离经叛道者的心吸引到古老信徒派怀抱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人喝着茶——有的人用茶碟，有的人相当考究地按英国方式，长时间地进行一些奇怪的谈话：关于鸽经，关于心灵磁石和新的耶路撒冷——当战争结束、“基督王国”出现之际它将在“罗斯”建立……

“快了，快了，孩子们，火红的喷泉将要涌出，天堂之鸟会亮开歌喉，泪的圣水盘即将开启，神的真理就要显现。”

“阿门，阿门……”

“上帝保佑我们。”（原文为法语）

主人惘然地微笑着，皱起眉头嗅着泻盐。

这是1915年到1916年的事情。渐渐地，来客的身分在发生着变化。到了1917年，在克留耶夫大谈“泪的圣水盘”时所坐的圈椅上，坐着的是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他

愉快地、流利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还是那样一些贵族子弟学校的学生们恭敬地听着，主人还是那样抽动着脸。微笑着嗅着泻盐。炉火烧得旺旺的，像盒子一样的房间依然非常闷热，令人昏昏欲睡，同时散发着一些神香、香水的味道，散发着一些拉斯普京的气息，一些泽美耳瓦尔德的气息……[②]

1918年，留里克·伊夫涅夫在街上遇到我，他问："想去我们那儿工作吗？不想？为什么呢？苏维埃政权是基督政权。"他心神不定地微笑着："我向您建议的不是革命工作，不是肃反部门里的工作"，说到这里，他抽搐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熟悉的"异常"："尽管我们这里各种工作都是干净清白的，甚至在肃反部门里也一样，是的，在肃反部门里也一样。不过，我要向您建议的不是这个，我们到处都需要人，比如皇家剧院经理和公共图书馆馆长的位置都空着呢。啊？为什么不愿意呢？"

我望着这个"当今世界的强者"、随心所欲地支配经理馆长职位的人，望着他那 抽动的面颊和皱巴巴的西服，感到对他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的、刺心的怜悯，近乎是一种温情。肃反部门里也有干净清白的工作？好吧，灵魂卑贱的人怡然自得……

"您不愿意？"他像麻雀一样哆嗦了一下，做出一副神气的样子："很遗憾。不过……或许，您认为，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天晓得都是些什么人，是群恶棍？"

"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原文为法语)

注释：

① 温凯尔曼(1717—1768)德国艺术史学家。

② 泽美耳瓦尔德：瑞士一城市。1915年9月，反对一次大战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在该市举行。

第十四章

“一块穿常礼服的砖”——这是洛扎诺夫在谈论索洛古勃时用的一个说法。

从外表看，索洛古勃的确不像一个人，而像块石头。他的动作缓慢、笨拙，秃顶、前额很大，小小的、冷漠的专注的眼睛。脸色苍白，缺乏表情，胡子刮得精光。甚至脸上的肉疣也像石头一样。

声音也是这样：

你比百合还白，比宝石还红
你又白又红……

索洛古勃这样读道。给人的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在朗读，而是一把锤子在敲击墙面，发出匀整、没有意义的声音。

“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是这样。

一位被认为是“冉冉升起的明星”的青年诗人给索洛古勃打电话：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是您吗？”

“是我。”

“我是 X。我想去拜访您……”

“什么事?”

“给您读一下我写的诗。”

“我已经在《阿波罗》杂志上读过了。”

“那我想聆听您的高见……”

“对它们我没什么想法。”

索洛古勃是瓦西里耶夫岛上某所学校的学监。那是多么严厉的一个学监啊!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走了!……”听到这话,即使是最胆大的调皮鬼也会立即安静下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学监不喜欢开玩笑……

但是,见到他畏惧的何止是学生呢。1911 年,我第一次被带到索洛古勃面前,他用缺少光泽的浅色眼睛注视着我,慢慢地把像石头一样的手伸给我(是的,那时我已 17 岁),这一刻,我的牙齿微微发抖、磕碰——他周身弥漫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寒意”。

顺便一提的是,首次见面,著名诗人对初出茅庐的诗坛后生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没有读过您的诗作,但不管这些诗写得怎么样,最好还是把它们都扔掉。无论是您的、我的、还是世上其他人的诗作都没人需要。写诗是愚蠢的胡闹和浪费时间。”

这一“愚蠢的胡闹”索洛古勃本人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快 35 岁了。

那在这之前呢?就是刚才提及过的那种生活。

空荡荡的、陈设寒酸的公家住房,给学生打的“一分”成绩,用缓慢的“石头般”僵硬的脚步沿着瓦西里耶夫岛荒凉的“大街”散步。在煤油灯下,面对着“书面作业”,或者,如果作业已经批改好了的话,面对着“石头”一般的——就像他自己和他周围的

一切——《纯理智的批评》这本他所喜爱的书度过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

“一块穿常礼服的砖。”他是一台机器，制造出来就是为了使学生感到畏惧，也是为了使自己寂寞苦闷。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件常礼服里面，在“砖块”的中间有一颗心。怎么能够想到呢，“谁会这么想呢?”只是到了35岁的时候才发现，这件常礼服里面有一颗心。

有一颗准备着因忧郁和柔情、因失望和怜悯而碎裂的心。

一次，与勃洛克交谈时，索洛古勃坦露胸臆，他说：“我想写日记，真正的日记，为自己而写。可我不能写，我害怕。害怕万一被人偶然读到，或者我突然死去来不及将日记烧毁。这种担忧使我却步。但您知道，有时真想写啊。但想到万一被别人读到，我就无法动笔。最主要的东西我不能记。”

“最主要的东西?”

“是的。对生活的恐惧。”

另外，也是在这次谈话的时候，索洛古勃曾脱口说道：“艺术是谎言的一种形式。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美好。真实的艺术，要么是无聊的庸俗，要么是恶梦。恶梦人们不需要。他们的恶梦够多的了。”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所带着的“石头”般的微笑。这番话是1914年他在一个“高级”的文学沙龙里说的。美学界的花花公子们愉快地重复着并且记住了“大师”的这一“恰当的独特见解”——“大师”平时轻易不说这类话。像那些花花公子一样，我也记住了这几句话，过后忘了。但现在又一次想了起来。

索洛古勃的妻子阿纳斯塔茜娅·切博塔列芙斯卡娅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神情惊慌不安。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神情惊慌不

安。在最安宁的岁月里,她也感到不安。对什么感到不安?对一切。在审理贝利斯案件的那些日子里,[1]在美学界的社交圈中,在对贝利斯、对世上的一切都漠然处之的社交圈中,她会拉住一些她并不认识的妇人的手,会把满脑子装的都是怀特的贵族子弟学校的学生拉到屋角,然后眨着那双瞪得大大的、灰色的、"惊慌不安"的眼睛,连珠炮似地问道:"听着,他们难道真的要给他定罪吗?他们难道真敢这样做吗?"

"真是的……岂有此理……"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喃喃说道,同时客气地欠着身子,竭力想早点摆脱她。可她不放他走。她说得更快,更激昂,也更惊慌不安。至于她的谈话伙伴很蠢,除了自己的分头之外对世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她并没有发觉。相反,他说了"岂有此理",当然,他也感到恼怒,就像她一样,他也有不安。对此她已经很感激了。已经把他视为同盟者了……

她为重大的事情不安,也为一些琐碎小事不安。两者之间的区别她好像没有发觉。终日惊恐使她变得多疑。她能轻易地找到臆想出来的朋友,她同样轻易地觉得四周都是敌人。

"敌人们"—自然—想尽办法要侮辱她所崇拜的索洛古勃,给他找麻烦,暗中伤害他,向警察局告他的密(告什么?唉,敌人什么都能想得出来),贬低他的声誉,损害他的健康。她觉得,那个新来的长着一头红发的扫院子人,是被专门派来监视索洛古勃的暗探;而那供职于颇有名气的厚杂志的 X 则是个凶狠的狂热分子,他想的只是如何令读者对索洛古勃失望;至于送牛奶的芬兰人,未必不会把带有弧菌的生水倒进牛奶,而且是故意的、故意的……

这还都是她在"安宁"的和平岁月里的表现,到了战争年代、到了苏维埃时期情形就更严重了。

1921年,在经过长时间的奔走之后,她的理想似乎就要实现了——她睁着大大的熠熠发亮的眼睛,对在街道上、在讲座上、在买面包的队伍里遇到的"朋友"讲述的事情似乎就要实现了。这件事她小心翼翼地不让那些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地增长的、同时变得特别凶恶的"敌人"知道:这便是出国。

"逃出地狱"——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全部的身心力量,全部的"不安"都集中在这件事上。任何其它事情她说也不说,想也不想。"逃出地狱。"经过长时间的、艰难的、痛苦不堪的奔走之后,"地狱"之门已稍稍开启。二三个星期之后出国护照就会寄来。大约就是这样。"朋友们"出了力,"敌人"让步了。

她没有意识到,地狱就在她自身,即便是巴黎——有着"为费奥多尔·库兹米奇准备的白色细毡靴和波尔图葡萄酒"的巴黎也改变不了什么。她在全城奔走、忙碌,充满活力,心情愉快。她把迎面遇到的朋友拉到一边,环顾四周:会不会给"敌人"听见。双眼紧张不安,熠熠发亮,她轻声说道:"大概,再有十天。您来我家吧。"

她一直不明白,"地狱"就在她自身。而那天晚上,当她没戴上帽子就冲进寒风大雨中,如同有人在招唤她一样时,她霎时间明白了吗?索洛古勃不在家。帮佣的妇人(出发前事情很多)问她:"夫人要出去很长时间吗?"她喊道:"我不知道!"或许,她真的不知道。或许,她马上就会回来,吃饭,再过几天就去巴黎……她没戴帽子就冲进雨里,因为,折磨了她一生的惊恐突然间以极大的力度迸发了。

有个海员看到,一名妇女在礼拜堂那里从尼古拉耶夫斯基桥上跳进了涅瓦河……他没有来得及拉住她。当时天色已晚。路灯还没点亮。海员既看不清那妇女的脸,也看不清她的穿着。好像她没戴帽子?好像她身上穿的是黑色的斗篷大衣,就像失

踪的切博塔列芙斯卡娃那样？尸体没有找到。或许，根本就没有去找。谁有兴趣为某个名叫索洛古勃的人的老婆到冰冷的河水中去搜寻打捞呢？彼得堡无产阶级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几天之后（正好是上头许诺——当然也只是许诺——发给出国护照的日子），涅瓦河结冰了。

切博塔列芙斯卡娅在死去前的一瞬间依然"不知道"。索洛古勃从那个秋夜起直到春天河水解冻、他妻子的尸体找到为止也"不知道"。

他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常规。天气好的时候，他外出散步，沿着第九大道走到涅瓦河边，走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大桥附近的礼拜堂旁，然后顺着有太阳光照的那一侧返回。晚上，坐在饭厅里一盏带绿色灯罩的灯下面，写着18世纪风格的诗歌或者为《世界文学》译稿，翻译戈蒂埃、魏尔伦的作品。当有人来访时，他像往常一样，以一种冷淡的客气态度接待他们。有时在谈话中他顺口提起切博塔列芙斯卡娅，那语气就像她离家出去没多久一样。他开玩笑，很乐意地朗读诗歌，朗读他写的那些18世纪风格的牧人歌谣式的纤巧诗作……

带绿色灯罩的灯将暗淡的光线投射到蒙着杂色漆布的桌子上。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书籍和手稿，还有切博塔列芙斯卡娅的编织活儿：一根针插在毛线里，另一根放在旁边。"那天晚上"她就是这样把编织活儿留在桌上的。现在也就照这个样子保存着。

索洛古勃读着诗歌。他脸上的表情很普通，像石头一样冷漠但又彬彬有礼，带着老年人所有的那种平静。声音也和平时一样，没有语气变化，也像"石头"一般。

诗歌就是那些牧人歌谣式的、纤巧的：

……如果您允许，

我可爱的牧人科林……

一次，我在他那儿坐了很久。女佣（就是问太太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位）进来摆桌子准备开饭。

“要么，您在我这儿吃饭吧，”索洛古勃这样建议，“玛莎，请摆上第三副餐具。”

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但我大概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惊讶——如果为我放上的是第三副餐具的话，那第二副餐具又是为谁准备的呢？我的惊讶可能在脸上流露了出来。

像石头一般冷漠同时又彬彬有礼的索洛古勃解释道：“这是为阿纳斯塔茜娅·尼古拉耶芙娜（切博塔列芙斯卡娅）准备的。”

春天，在切博塔列芙斯卡娅的遗体被找到以后，索洛古勃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出门，不会客。有时，他的女佣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取稿费或者去公共图书馆借书。这是一个寡言少语的老妇人，从她那儿打听不到任何事情。她说的只是这么几句话：“感谢上帝，老爷身体健康，依旧在写作，他让大家别担心。”众人感到惊讶的是，索洛古勃借的书都是关于高等数学的。

他要这些书干吗？

后来，索洛古勃的身影又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了，若有人去探访，他也开始接待了。他再也没有把切博塔列芙斯卡娅当作一个活人谈起过，桌子上第二副餐具也不放了。除此之外，他和他的生活好像依然如故。

他为什么需要数学书——关于这一点，人们是后来才了解到的。

一个熟人去看望他，发现桌上有份写满算式的手稿，便问索

洛古勃:这是什么?

“这是微分。”

“您在研究数学?”

“我想检验一下有没有阴间冥府。”

“通过微分?”

索洛古勃“石头般”微笑了一下。

“是的。检验过了。阴间冥府是存在的。这样一来,我又能和阿纳斯塔茜娅·尼古拉耶芙娜相会了……”

……这副餐具是为阿纳斯塔茜娅·尼古拉耶芙娜准备的。

……是的,我写得很多。牧人歌谣越写越多……

瞧,这是昨天写的。

如果您允许
我可爱的牧人科林……

还是那样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微笑,还是那件常礼服——只是针脚处泛白了,还是那些牧人歌谣式的诗作。对了,还有“艺术只是因此才显得美好……而恶梦……”这一类的“独特见解。”

曾经有过许多春天,
现在又是春天。
贫乏的世界难以忍受,
春天也是那样贫乏。

面对我的憧憬
春天以什么作答,
它将展现那种死亡,

和所有的那些花朵——

它们以前也曾出现在
贫瘠的大地上，
它们取悦过上苍，
有过自己枯荣的时光。

就是这些花。就是这种死亡。在这首诗中，有一把理解整个的索洛古勃的钥匙。

“艺术是谎言的一种形式？”索洛古勃真的这样想吗？或许，正相反，他害怕，怕得“要命”，怕有人在他的艺术中“读到”“最主要的东西”，于是想出这样的说法：“谎言的一种形式。”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重要的不是这点。重要的是另一方面。

在索洛古勃所创作的优秀作品中，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任何谎言。相反，他的诗歌是俄罗斯最“真实”的诗歌之一。

它们“真实之极”——在艺术上，在人性上。这既表现在他的与一切表面化的、做作的东西格格不入的沉着、矜持上，也表现在作品反映出的诗人“孩子般”心灵的一目了然的纯洁性上。

不久以前，在一份文学问卷调查中，索洛古勃被称作“伟大的诗人”。这种说法自然是有些夸张了。

在艺术中，“伟大”正是从“战胜”“对生活的恐惧”开始的，而这种恐惧早就永远地征服了索洛古勃。但是，他当然是真正意义上、最高意义上的诗人——不是个普普通通文学家，不是个写诗的，而是个其名字能被列入“幸福的金科玉律”中去的人。

索洛古勃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是 1922 年秋

天,我出国前去向他道别),他说:"现在我剩下的唯一乐趣,便是抽烟。是的,没别的了。好吧——那我就抽……"

他就"这么样地"、"好歹地"又过了五年。抽烟。大概,还写些牧人歌谣。现在他死了。

死的时候,他十分孤独、贫困,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需要他。他是因肺炎去世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头脑还很清醒,但恰恰不能抽烟……

注释:

① 贝利斯案件:1913年,当局和黑色百人团诬陷犹太人贝利斯以宗教形式谋杀一俄罗斯小男孩。此事激起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愤慨。最后,贝利斯被宣布无罪。

第十五章

我与勃洛克和古米廖夫都很熟。听他们朗读过刚刚写好的诗歌，同他们一起喝过茶，在彼得堡的街道上散步，共同呼吸1921年8月的空气——就在这个月里，他们离开了人世，方式不同，但悲剧意义却是一样的。无论我对他们的回忆有多么的不完整，像我这样同时了解他们两个的人，在俄罗斯，或许只剩下二三个了，而在移居海外的侨民中，则一个也没有了……

勃洛克和古米廖夫——在诗歌创作、趣味爱好、世界观、政治观点、外表服饰……可以说，在各个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勃洛克的诗歌透出一种朦胧的光华，古米廖夫的诗作确切、明晰、完美。索洛克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长诗《十二个》中讴歌十月革命："我们在全世界燃起熊熊烈火，叫那资产阶级无处藏身"；而古米廖夫是"白卫军军人"、"君主主义者"。勃洛克厌恶战争，古米廖夫则以志愿者的身分走上前线。勃洛克认为，世界是"可怕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上帝是残酷的或者是不存在的；古米廖夫却极其虔诚地确信："热爱世界和信仰上帝的人心中包容一切。"勃洛克终身憧憬革命，将它视为"美好的必然性"，可古米廖夫把革命当成凶残、野蛮的同义词。勃洛克鄙视

文学技巧、本领和写作训练，以及文学家称号本身，提到某人时，他曾有这样的说法：

> 他只是一个时髦的文学家，
> 只是一些轻慢词句的发明人……

而古米廖夫则把自己学生的小组称作诗人车间，以此强调要将诗歌写作当成一门手艺来研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人的不同也体现在外表上：勃洛克是位北方美男子，有一张吟唱诗人的脸，漂亮的鬈发，穿着雅致的丝绒外套，白衬衣柔软的领子敞开着；古米廖夫相貌欠佳，神态严肃，“斜眼”，头发修剪得很短，身穿刻板的常礼服……

这两个各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人，在并不漫长的一生中或明或暗地相互为敌。勃洛克写的、在去世前不久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心灵”，对古米廖夫及其诗歌、世界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古米廖夫对这篇文章的回答，一如他平日的风格，克制而得体，但从实质上讲，其激烈程度与勃洛克文章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发表时，他已经被枪决了。

1909年秋天，格奥尔吉·丘尔科夫把我引荐给勃洛克。那时，我刚满15岁。我身上穿的是见习军官的制服。丘尔科夫读了我的诗抄本之后，成了我文学上的保护人。

还要描写一下我走进勃洛克居室时的感觉吗？勃洛克当时住在小造币厂街一幢房子的六楼。

窗子很大，没挂窗帘，望出去视野开阔，看得到屋顶、树木和石头岛大街。为了能临窗远眺，勃洛克总是租借层面较高的房间。军官路57号，他去世的那个房间，位置还要高，面积还要

大,空气也更好……"俄罗斯帝国风格"式的红木家具,深色的地毯,两只大大的书橱靠墙相对而立。一只书橱,布幔拉开着,里面放满了书。另一只的玻璃门后面遮着绿色绸布。后来我了解到,里面放的不是书,而是酒瓶——22号叶利谢耶夫瓶装"纽依"酒。上面的酒瓶是满的,下格摆的是空瓶。还有开塞器、几个杯子和一块毛巾。写作时,勃洛克常常走到这只书橱前,倒点酒,一口喝完,然后再在书桌边坐下。一小时以后又走到书橱旁。"没有这个"他无法工作。

每次勃洛克都用一只干净的酒杯倒酒。他先是十分仔细地用毛巾把杯子擦一遍,然后对着光线再检查一下,看看上面还有没有灰尘。勃洛克是诗人当中最超尘脱俗的一个,认真仔细、有条有理甚至到了有些怪异的地步。例如,如果勃洛克将自己锁在书房里,那家里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走路,电话听筒被摘下(我至今记得勃洛克家的电话号码:61200!……)。但这并不表明他正在写诗或者写文章。更多情况下,他是在回信。勃洛克收到的信很多,常常是陌生人写来的,许多信言语混乱或者干脆疯话连篇。但不管是谁的来信,不管信的内容怎样,勃洛克是一定会写回信的。所有的信都被编上号,等待回复。这还不是全部。对每封信,勃洛克在一本专门的本子上都有记录。这本本子很厚,裁口喷金,装订上橄榄色的皮面,放在勃洛克极其干净的——一尘不染的——书桌的显眼的地方。本子的每一页上都划好栏目:信的编号,寄信人姓名,收信日期,回信内容概要和日期……

勃洛克的字体整齐、漂亮、清晰。他写起字来,速度不急,自信而果断。一支质量极高的笔(勃洛克所有的文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厚实的纸张上平稳地前行。透过擦得发亮的窗子看出去,视野相当开阔。房间里寂静无声。在遮着绿色布幔的

书橱里面,有一批酒瓶、开塞器、酒杯……

丘尔科夫怎么也习惯不了勃洛克的这种井井有条,有一次,他不禁问道:"萨沙,你这些习惯都是从哪儿来的?莫非你身上有德国血统?"事后,他把勃洛克奇怪的回答告诉别人:"德国血统?我不这么认为。倒不如说是对混乱的一种自卫。"

丘尔科夫和勃洛克很熟,他走进勃洛克的书房,又长又密的头发轻轻地抖动着,刮得精光得像演员一样的脸充满微笑,他用手指在我的见习军官的制服上轻轻一点:"瞧,我给你带来一个军人,尽管你不喜欢军队,可你别欺侮他……"我跟在丘尔科夫的后面,胆怯地迈动着由于紧张而不大听话的双脚。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勃洛克开始和我谈话的方式:就像和一个熟人、一个成年人在把中断了的谈话继续下去那样。他就是这样开始与我交谈的,以至于我的紧张与其说是消失了,倒不如说是被我忘记了。等我再记起它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我正沿着楼梯往下走,手里拿着勃洛克送给我的一本第一版的《美人集》,书上有他的题辞:"以此纪念我们的谈话"。

后来,我有了好几本这样的书,都带着相同的题辞,只是日期不同。这些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还有过一叠勃洛克的来信,是从他的沙赫玛托沃寄到我度假的维列斯科耶庄园的。信都很长。勃洛克给我写了些什么呢?写的就是在私人会晤中谈论的东西,就是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的东西。有关生命的意义、爱情的秘密、无垠空间中的星辰……总是那么的朦胧,那么有魅力……字迹漂亮、清晰。字母一个一个彼此分开。英国纤维纸窸窣有声。信封带有胭脂红的衬纸。朦胧的词编织成光彩隐约闪现的句子……

勃洛克为什么要给我——一个乳嗅未干的、总是把诗歌技

巧问题挂在嘴边的少年写长信或者进行长谈呢？不时地，这一类问题会从我的嘴里嘣出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十四行诗最后加的一行需要吗？”有一次我这样问道。令我惊讶的是，勃洛克这位著名的“大师”根本不知道这最后多加的一行是什么……

在勃洛克1909年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与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谈普拉东。他离去时像换了个人一样。”在这段记录里，或许能找到对那些长信和谈话的解释。大概，勃洛克没有注意我的年龄，也没有听我幼稚的回答。大概，他与其说是在跟我交谈，倒不如说是在跟自己交谈。当我站在他面前，出现在他的活动轨道当中时，他向我投出自己朦胧的光线，而对我几乎视而不见。

进入勃洛克轨道的人并不多，而那些进入的人，看上去都具有偶然性。勃洛克没有真正的，多少能与之匹配的朋友。他与年轻时的朋友们的关系要么中断了，要么变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就像他和安德列·别雷的关系那样。对一般的文学圈子勃洛克避而远之，而与他接近的人，可以随时来访；陪伴他早晨长时间地散步和夜里时常豪饮的，全都是些怪人。

丘尔科夫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正常的人，另外，也是唯一一个作家，尽管是二流的。但又是什么把勃洛克和这个可爱的、外表上看来颇具才能的“神秘无政府主义”的发明人联系在一起的呢？没有人，包括丘尔科夫自己在内，相信他的这个理论。

勃洛克与皮亚斯特的友谊也令人难以理解。更难理解的是他与叶甫根尼·伊万诺夫和佐尔根弗莱的交情。顺便一提的是，勃洛克有两首杰作是分别题献给他们的：《在青草未被割过的沟壕的土堤旁》和感染力极强的《飞行中队长的脚步》。

皮亚斯特是位业余诗人，语言学爱好者，身材很怪，总是穿

着方格裤子，草帽几乎要戴到12月份，他脑子里总有某种“念头”在徘徊：一会想在艾泽拉岛建一个语言学家区，一会要记录夜莺啼啭的重音并以此为基础改革诗歌创作方法，他带着狂热者的执著向别人讲述的只是正在令他着迷的那个“念头”……叶甫盖尼·伊万诺夫——“棕红色头发的热尼亚”——从胡须到瞳孔都是棕红色的，他在酒精灯上自己做饭，生怕厨娘生起气来往他的食物里“撒砒礵”。“棕红色头发的热尼亚”与爱唠叨的皮亚斯特正好相反，他会连续数小时沉默不语，然后没头没脑地吐出一个含义深邃的词：“上帝”，或者“死亡”，或者“命运”，接下去又默不作声。为什么说“上帝”？死又是什么？可“棕红色头发的热尼亚”只是奇怪地望着，用一双奇怪的棕红色的“眼睛望着，咧开嘴笑，露出白白的，细小的牙齿，就像要咬人一样”，不做回答。佐尔根弗莱则介于皮亚斯特和伊万诺夫之间，话语浅显易懂，逻辑性强。只是他的谈话大部分是关于杀人的宗教仪式的，这是他喜爱的话题。他对此很内行：研究过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与著名教士普拉纳依基斯有通信往来。但偏偏像开玩笑似的，上苍让他长了一副典型的犹太人的脸，尽管从他父亲家族方面而言，他应该算是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若依据母亲的籍贯，他则是格鲁吉亚人……

为什么这些人同勃洛克亲近？又是什么使他们亲近？确切地说，他没有注意他们。他们进入了他的规道，但在与他们交往时，他看到的只有自己，看到“可怕的世界”中自己的孤寂。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甚至他们的怪脾气(他对此已经习惯)——在他眼里，与被毛巾仔细擦干净的杯子、带喷金切边和有“收到——回复”栏目的记录本、整齐整洁的书桌没有什么两样。一切都是那种“对混乱的自卫”……

这四个人——佐尔根弗莱、伊万诺夫、皮亚斯特和丘尔科夫

是勃洛克时常去小酒馆纵饮时固定不变的酒友。是的，他去的是小酒馆。生性讲究、有贵族派头和洁癖的勃洛克只喜欢最脏的、满地痰迹和烟蒂的"寻欢作乐的场所"：拉兹耶日路上的"象"、波尔肖依大街上的"雅尔"。在"象"或者"雅尔"喝酒以后，再去吉卜赛人那儿……

……酒杯，脏兮兮的桌布，酒瓶，小吃。"机器"在嘶哑地唱着"亲爱的，你可怜可怜我吧"，或者"在满洲里的山冈上"。周围都是些醉汉。勃洛克的酒友也有些醉了。"上帝"——伊万诺夫冷不防蹦出一个词，接着又默不作声，龇着牙，眨动着棕红色的眼睛。佐尔根弗莱慢吞吞地讲着贝利斯的情况。皮亚斯特昏昏欲睡，嘴里嘟哝着有关洛贝·德·维加的什么事情……①

勃洛克还像平时一样，还像早晨散步或者坐在自己明亮的书房里时那个样子：平静、漂亮、若有所思。他也喝了很多，但看不出来。

一个妓女走到他身旁："想什么呢，有趣的人儿？请客喝杯黑啤酒吧。"她坐到勃洛克的膝盖上。他没有赶她走。他为她倒了杯酒，像对孩子那样，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对她说着什么。说什么呢？说他一贯的话题：说可怕的世界，说生活缺乏意义，说没有爱情，说爱情像光线一样，反映在所有的东西上面，甚至反映在小酒馆地板上被踩灭的烟头上面……

"萨沙，你是个伟大的诗人！"因喝醉酒而变得亢奋的丘尔科夫喊道，他晃动着手里的酒杯，凑过来要吻勃洛克。勃洛克望着他，目光明朗，神志清醒，若有所思，就像平时一样，并且用像平时一样的清醒、略微低沉的声音，缓慢地，好像是在斟酌如何回答似地说道："不。我不是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会在自己的诗歌中燃烧并且死亡。而我喝酒，在《处女地》上发表诗歌。每行诗收取稿酬半卢布。我所做的和古米廖夫一样，只是没有他

那种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认识。"

勃洛克的创作是俄国诗歌有史以来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对此已没有人持异议了。持异议的人,他们的看法算不了一回事,用济娜依达·吉皮乌斯的话来说,对他们而言,"诗歌的大门永远关闭了"。但在关于诗歌的作者,它的本源,即作为人的勃洛克的问题上,各种互相对立的观点还会长久地存在。如果说这些争论现在平息了,那只是因为没人争论——在那儿,根据政治局的指令,作为"与时代不合拍"的诗人,勃洛克已被遗忘;在这儿,人们忧郁地打发着日子,此外,心中的疲惫和对一切的冷漠也日益增长……但是,关于勃洛克人品的争论肯定会在某个时候以新的规模再次展开的。如果俄罗斯依然将是俄罗斯,俄罗斯人依然将是俄罗斯人的话,那么,这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读者从来也不是,并且,上帝保佑,也永远不会是冷冰冰的唯美主义者、冷漠的"美的鉴赏家"——这种人几乎不关心诗人的人品。在喜爱其诗歌的同时,我们因此也喜爱作者——尽量去理解他、洞悉他,如果需要的话,还要维护他。

勃洛克正是需要维护的。《十二个》是勃洛克诗歌创作的高峰之一,也正因为是高峰之一,它因亵渎俄罗斯和基督而发出的充满厄运的回光便投射到了勃洛克的名声和他所写的全部作品之上。总的来说,真正的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他们的杰作,与诗人的人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既然勃洛克写出了《十二个》,这就是说……

下面我要讲一讲勃洛克去世时的情景。我觉得,光是他临终前的呓语就足以使这个"这就是说"失去意义。但在讲述他临终时是如何对待自己这首既出色又令人厌恶的长诗之前,我想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勃洛克并不因写作《十二个》而背负责任、

名声受损、犯下罪过。

首先,纯洁的人不会做肮脏的事情。其次,最纯洁的人可能会犯错误,有时是可怕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勃洛克是个心灵无比纯洁的人。他与卑劣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用他的诗来表达的话,他

……整个儿是善良和光明之子,
整个儿是一曲自由的凯歌。

但正是他写了《十二个》。在作品里,赤卫队员们昂首前行,去用刺刀结果俄罗斯的生命,而为首者,在勃洛克的笔下竟是戴着“用玫瑰做的雪白的花冠”的基督。怎么能将赤卫队员及其行为与光明、自由和善良放在一起呢?如果勃洛克真的是“善良和光明之子”,那他怎么能为罪恶和污秽祝福呢?

对此的解释是:勃洛克只是看起来像是位文学家、成年人,“沙赫玛托沃”的主人,“租房者”、某些协会的成员……这都只是幻影。在他生活和写作的非现实的现实当中,勃洛克是一个在“可怕的世界”里迷途的孩子,他害怕生活,不理解生活……

勃洛克具有神奇的天赋,他善良、豁达,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和对待自己都极端地真诚。勃洛克是带着“被剥去的皮肤”,带着对不公正、痛苦和恶的极度的敏感来到人世的。作为与“可怕的世界”及其“尘世的琐碎杂事”相对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理想着有一种带来解脱的革命,他像相信现实的东西一样相信这个理想。

在最初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过去之后,二月革命使勃洛克感到失望。预备议会、各部部长、立宪会议选举——在他看来是一种亵渎,“将战争进行到最后的胜利”的口号令他愤怒……

而在……无神论者列宁的……叫喊声中勃洛克感觉好像有种对人的爱和基督教的真理……

勃洛克极端真诚、心灵纯洁——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如若这样，那么，大逆不道的、颂扬十月事变的长诗《十二个》不仅是他为了"善良和光明"而创作的作品，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光明和善良的表现，这一表现最终变成了可怕的错误。

> 我不原谅。你的心灵是无辜的。
> 对它我永不原谅，——

在读了《十二个》以后，济娜依达·吉皮乌斯这样写道。她的这两行诗句印证了我的话。诗句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实质上，就像吉皮乌斯的所有诗句那样，它们非常准确和明晰。吉皮乌斯十分了解勃洛克，也很爱他。她毫不妥协，如此严厉地拒绝原谅勃洛克——这点只能加强她所做出的承认和肯定，即："你的心灵是无辜的。"

由于写作《十二个》，勃洛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不是漂亮的言辞，这是事实。勃洛克明白了写作《十二个》是个错误，为无法纠正这一错误而惊恐不已。就像一个突然清醒过来的梦游者，他从高处跌落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他的的确确是由于《十二个》而死的，就如同别的人由于肺炎或者心脏病发作而送命一样。

简短地列举一些事实。为勃洛克治疗的大夫怎么也无法确诊，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一开始，他们努力要使他那无缘无故快速衰竭的体力得到恢复加强。后来，他开始莫名其妙地觉得痛苦难忍，医生便为他注射吗啡……但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诗人死去，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呼吸。"勃洛克去世前不久在纪念

普希金晚会上说的这句话或许是对他自己病情唯一正确的诊断。勃洛克去世前几天，彼得堡有传言说：勃洛克疯了。这个传言肯定出自亲布尔什维克的文学圈子。后来，一些苏联杂志曾报道过关于勃洛克临终前“神经错乱”的几种说法。但谁也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学识渊博的官员。”现在好像已被顺利地处决了的彼得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约诺夫曾经去看望过奄奄一息的勃洛克。勃洛克当时已神志不清，不停地说着呓语。说的只是一件事：是不是每一本《十二个》都已经被销毁了？别在什么地方留下一本？“柳芭，好好地找一找，烧掉，把所有的书都烧掉。”勃洛克的妻子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耐心地反复说道，书都销毁了，一本也没留下。没有平静多久，勃洛克又开始说了，他要妻子发誓没有骗他，他想起寄过一本《十二个》给勃留索夫，便要求送他去莫斯科。“我要他还给我，不然我杀了他……”彼得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约诺夫听着垂死者的这些呓语……

勃留索夫，这位原先的“狂人”、“魔术师”、“巫师”，战争期间开始竭力靠扰“俄罗斯人民的联盟”，现在在政府部门担任一系列职务：做委员、开会，“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征用私人图书馆。像以前一样，大量地写作诗歌，当然都是歌颂无产阶级和他们的领袖的。可能，按“巫师们”预测未来的习惯，他在讴歌活的列宁的同时，已经在写领袖的挽歌，以备不时之需：

列宁，列宁就躺在那儿，
躺在那儿，面容悲伤，身躯易朽……

作为笑话，皮里尼亚克说过这样一件事：在约诺夫探望过勃洛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勃留索夫在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里，运

用科学术语,详尽地解释了勃洛克神经错乱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党的指示已经被昔日的“狂人”接受、执行了。

在勃洛克生命垂危的日子里,古米廖夫从狱中给妻子写信:“别为我担心。我身体健康,写诗、下棋。”古米廖夫是被捕前不久结束克里米亚之行返回彼得堡的。他是坐涅米兹的火车去克里米亚的,涅氏曾是沙皇的海军将军,后来成了一名红色将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是涅米兹本人还是他心腹中的某个人像古米廖夫一样是塔甘采夫集团的成员。古米廖夫和集团成员坐着专列,在“革命的光荣与骄傲”——共产党员海军的护卫下,在克里米亚各港口,在幸免于难的军官和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关系,向需要的人分发用将军列车从彼得堡运来的武器和反苏维埃的传单。在涅米兹周围的人当中,有肃反委员会的间谍,监视他的奸细——这点古米廖夫是没有料到的。总的来说,古米廖夫容易轻信他人,在与青年人、还有军人的关系中,尤其如此。这个奸细的任务正是要博得古米廖夫的好感。

他个子高高的,人很机敏,眼睛里透出愉快的神情,长着一张开朗的少年般的脸。他有一个著名的航海世家的姓氏,自己也是个海员,革命前不久刚晋升为准尉。除了这些吸引人的方面以外,这个“样样都可爱”的年轻人还写诗,像模像样地模仿古米廖夫的文笔……

回到彼得堡的古米廖夫皮肤晒得黝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满脑子的计划和希望。他对旅行、对新创作的诗歌和与艺校学生一起进行的工作都感到满意。古米廖夫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感觉到生活的充实、风华正茂、成熟和成功,这种感觉也体现在他为自己“未来”的一本书所想好的书名上:《在大地漫游当中》。离在大地“漫游”,确切地说,离在什巴列尔路的牢房里等待处决

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被捕那天，古米廖夫是在凌晨两点回到家里的。这最后一晚，他是在钟爱他的青年人当中度过的。那天，古米廖夫的课结束以后，像往常一样，他们读了些新诗，并用阿克梅派的理论进行分析——必定“带有附加建议”，也就是要说明持某种观点的理由：“喜欢或者不喜欢，是因为……”“不好，是因为……”在讲课和讨论诗歌的时候，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但结束以后，古米廖夫就不再是大师，他变成一个和蔼的同伴。学生们后来回忆说，那晚古米廖夫很活跃，心情相当好，所以会坐得比平时晚得多。几位小姐和小伙子送古米廖夫回家。在莫依卡河滨河街古米廖夫居住的“艺术之家”的大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对此，谁也没有在意：新经济政策已经实行，汽车不像在不久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是令人大惊小怪的希罕物了。在大门旁，他们道别的时间很长，相互开着玩笑，约定“明天见”。而此刻，坐那辆停在大门口的汽车来的人，正拿着肃反委员会的搜查、逮捕证在古米廖夫的家里等着他。

1921 年 8 月 28 日，三十五岁，正当盛年，才华横溢的古米廖夫被处决了。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不，是可怕的，但又是具有深刻含义的死亡。古米廖夫本人也不能为自己设想比这更好的人生结局。此外，他曾带着近乎是卜占的预感对自己预言过的正是这样的结局：

我死的时候不在床上，
没有证人，也没有医生。

谢尔盖·鲍勃洛夫——《诗中之诗》的作者，《离心机》的编辑，一个假绅士，未来主义者和瘾君子，与肃反委员会关系密切，

自己说不定就是该委员会成员——在古米廖夫被处决后，有一天遇到 M. Λ .洛津斯基，他那张唯美主义者罪犯般难看的脸抽动着，他随随便便地、就像在谈论一件可笑的小事一样地说道："对了……你们的这个古米廖夫……我们，布尔什维克们、觉得这个很可笑。不过，您知道，他死得很漂亮。我是从直接经手此事的人那儿听说的。说他当时脸带微笑，还抽完了烟卷……当然，是夸大其辞。但是，连特别部队的战士们也对他印象深刻。纯粹是无聊的逞能，但不失为一条汉子。很少有人这样死去的。但又怎么样呢——胡闹。如果不掺和到反革命组织当中去，而是到我们这边来的话，那肯定会大有前途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另外一个关于古米廖夫受审讯时的表现的说法对上述这段令人生厌的闲扯做了补充。这个说法是我亲耳听到的，不是从业余肃反人员，如伯勃洛夫之流那儿，而是从真正的肃反人员那儿——彼得堡肃反侦察员（当然，是反投机倒把部的）捷尔热巴舍夫。奇怪，叙述的语气和叙述者的人品与鲍勃洛夫的语气和人品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谈到古米廖夫的时候，捷尔热巴舍夫带着真诚的悲伤，他把处决古米廖夫称作"血腥的误解"。当时，彼得堡文学圈里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个捷尔热巴舍夫。许多人，包括古米廖夫在内——尽管这令人惊讶——对他都抱有好感。但捷尔热巴舍夫是个像谜一样的人物。或许，侦察员的职务只是个面具。这样，他在众人心中引起的难以解释的好感，他"个人的"意想不到的在 1924 年被处决都可以得到解释了。

对古米廖夫的审讯更像是一场学术辩论。审讯时，双方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马基阿维利"王子"到"东正教的美"。负责塔甘采夫案件的侦察员雅科普松，用捷尔热巴舍夫的话来说，是个真正的宗教裁判官式的残酷无情的人，集智慧、丰富的知识

与狂热者的固执信念于一身。要将古米廖夫推上断头台的话，恐怕找不出比雅科普松更厉害的侦察员了。假如侦察员要试验他的勇气和真诚，那么，他从古米廖夫那儿自然会是一无所获的。但是，雅科普松对古米廖夫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称古米廖夫是俄罗斯最好的诗人，背诵古米廖夫的诗歌，巧妙地与之争论，然后，在争论中，面对对手智慧上的优势做出投降让步的样子……

我已经说过，古米廖夫很容易轻信别人，如果考虑到他对智慧、博学、智力发明的各种表现都深有好感，再加上那种对古米廖夫而言并非格格不入的对奉承的嗜好，那就很容易想象：古米廖夫是怎样在自己都不察觉的情况下掉进雅科普松为他设制的陷阱的；他是怎样在关于保皇原则的抽象争论中不知不觉地承认自己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分子的；在经过关于革命的学术辩论之后，雅科普松又是怎样轻而易举地“概括地”确定并且记录下古米廖夫的话：承认自己是十月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老实说，即使古米廖夫在审讯时讲话谨慎，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对彼得堡肃反委员会来说，塔甘采夫案件的审理为它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跟前展现自身的独立性和不可取代性提供了机会。那个时候正好在讨论将职权和处决权集中到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手中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雅科普松才这样卖力，这样着急。不过，谁知道呢……假如古米廖夫装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只是偶然卷进密谋活动的文化人，那么，他的声誉（当时，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这还不是个虚的东西）会压倒对他的指控。或许，这样一来，高尔基提出的理由（他为古米廖夫特地去了一趟莫斯科）能够说服列宁……

……七岁的古米廖夫曾经昏厥过一次，原因是比赛跑步时另一个男孩超过了他。十一岁的时候，他试图自杀，因为家人和客人看到他上马动作笨拙而笑话他。一年以后，他爱上了一个陌生的女中学生，他尾随其后，跟着她在街道上闲逛。终于有一天，他走上前去，激动得呼吸急促，他向姑娘表示："我爱您！"姑娘说了声"傻瓜"就跑开了。古米廖夫惊呆了。他当时觉得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彻夜不眠，考虑着报复的方法：烧掉她住的房子？劫持她？向她兄弟提出决斗？十二岁时受到的这次委屈令他如此伤心，以至于三十岁回忆这件事情时，他的笑容里还带着一丝苦楚……

少年古米廖夫躺下睡觉时，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怎样出人头地。怀着对荣耀的憧憬，他早晨起床，喝茶，去皇村中学。他连续数小时在花园里徘徊，构想着千百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方法。当一名军官？学者？发明永动机？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人们能重复古米廖夫这个名字，为他写书立传，为他感到惊讶，羡慕他，这就够了。

渐渐地，孩童时的这些理想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米廖夫信奉了一生的世界观。他确信，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权被称作诗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中，而且在生活中总是力争成为最好的、名列第一的、走在他人前头的人。在他看来，能比他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的弱点、自私、精神上的贫乏、对死亡的恐惧，并且，以身作则，事无巨细，运用意志的力量克服旧的自我——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诗人。因此，天生胆小、拘谨、多病的古米廖夫"命令"自己成为一个捕杀狮子的猎人、自愿奔赴前线作战的骑兵和两枚格奥尔吉勋章的获得者、密谋团体的成员。生活中的一些做法他也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作为一个满怀理想的忧郁抒情诗人，他竭力要使诗歌原本的意义得以回归，他冒险地将自己那纯

正的，但并不响亮的声音弄哑，他选择复杂的形式、“暴风雨般”的词句，写作难度很高的史诗题材的作品。古米廖夫在生活和创作中的座右铭是“逆流而行”。这样的世界观使古米廖夫在文学界里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尽管有崇拜者和模仿者围绕在他的身旁，一个被承认的大师和依旧不被理解的诗人。去世前不久，大概，半年左右吧，他对我说：“知道吗，我今天看别人砌炉子。我真羡慕，猜得出羡慕谁吗？羡慕砖块。它们被砌得这样紧、这样密，每道小小的缝隙都被封住，砖靠着砖，彼此紧贴，连成一片，真是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生活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孤独。我是如此孤独……”

获得承认、声名日益显赫的古米廖夫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被不理解和敌意所包围。在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嘲讽了周围的人和他自己。

我对现实生活彬彬有礼，
但在我们之间存在着障碍——
能使傲慢的它发笑的一切，
便是我唯一的喜爱。

胜利、光荣、功勋——
这些苍白无力，现已被人遗忘的字眼，
在心中轰鸣。如同万钧雷霆，
如同荒漠当中上帝的声音。

噢，不，我不是悲剧演员，
我更会嘲讽，更冷漠无情。

我怒气冲冲,就像细瓷玩具当中
一尊金属的神像。

他记得长着鬈发的头颅,
低俯在他的脚旁,
记得祭士庄严的祈祷,
和颤栗的树林。

他还带着苦楚的笑容
看到永远静止不动的秋千,
在那儿,对着酥胸丰满的妇人
牧人正把芦笛吹响。

格格不入的现实生活既不想知道功勋,也不想知道光荣和胜利,而古米廖夫则反其道而行之,既在诗歌创作中,又在生活中,竭尽全力地要提醒人们记得"诗人事业的神圣"以及:

约翰福音里说:
语言——就是上帝。

古米廖夫用所有能够采用的方法——从把自己少年时写的书定名为《征服者之路》到临刑前平静地将烟抽完——在证明这点、肯定这点。当人们说他是为俄罗斯而死的时候,必须再加上一句:"也为了诗歌"。

勃洛克和古米廖夫带着因彼此不理解而造成的对立离开了人世。勃洛克认为,古米廖夫的诗歌矫揉造作,阿克梅派理论错

误荒谬，而古米廖夫所珍视的与文学社团青年诗人间交往是有害的。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人，古米廖夫在勃洛克心中引起的是反感和私下的忿恨。古米廖夫则特别指斥勃洛克创作了《十二个》。我记得在他们两人去世前不久古米廖夫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他很肯定地说道："由于写作《十二个》，他（也就是勃洛克）又一次将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也再次向沙皇射出了子弹。"

我提出异议说，不看内容，《十二个》作为诗歌作品是极具才气的。"如果是天才之作，那就更糟。对诗歌而言，对勃洛克本人而言，那就更糟。注意，魔鬼也是天才的话，那对魔鬼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更糟……"

他们去世已经多年了，当再也没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和"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军军人"、战争的仇敌、勋章、肩章和"死亡的骠骑兵"（他为"我们光荣的团队"而自豪，还准备撰写它的历史）的时候，当只剩下"勃洛克和古米廖夫"的时候，就像是对我们、为他们而感到难过的人们的一种可怜的慰藉——他们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现在都昭然若揭了：

他们彼此间的敌意是一个误会，作为诗人、作为俄罗斯人，他们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不如说是相互补充。使他们分道扬镳的因素都是暂时的和次要的，而在主要问题上、在对两人来说都是同样宝贵的事情上，他们——尽管自身并未意识到——兄弟般地殊途同归。

两人都视诗歌为生命，离开诗歌他们都无法生存。两人都忘我地痛苦地爱着俄罗斯。两人都痛恨虚假、做作、缺乏诚意——在创作中和生活中两人都真诚之极。最后，两人都愿意为这个"玄妙难解的荣誉"——也就是诗人面对上帝和自身所担负的最高责任——贡献一切，直到牺牲生命，并且最终都以可怕的

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

注释：

① 洛贝·德·维加：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戏剧家。

第十六章

诗人斯卡尔金十五岁的时候进彼得堡一家很大的商业企业干送信打杂的活儿。二十五岁时，他已经是该企业的经理之一了。他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希腊语读完了能用这些语言所读到的一切书籍，成了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朋友，戴着无光泽的高筒礼帽，令彼得堡人深感惊讶。

1911年春的一天，我顺路去大学生美学杂志《我们要欢乐》编辑部。在这份杂志上发表处女作的有刚刚起步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像许多诗人一样，我也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但不是处女作。使我首次"品尝到"目睹自己作品变铅字这一"幸福"的杂志，其名称更为夸张和华丽：《文学、艺术、技术、工业和催眠术之全部新闻》。

有了在这本《……催眠术新闻》上发表作品的经历之后，《我们要欢乐》在我眼里成了"诗歌的神庙"。它的主编是弗·纳尔布特，后来那本《哈里路亚》一书的作者，该书在主教公会印刷所用古斯拉夫铅字印刷，出版后很快因内容淫秽而被销毁。

诗人斯卡尔金被称作《我们要欢乐》的"希望"之一。大家都称赞他的诗歌，但对他本人的情况却无人知晓。斯卡尔金很少

去编辑部，要去的话，也只是匆匆打个照面。

我到《我们要欢乐》的编辑部的时间很不巧。纳尔布特和秘书都不在，也没有来访者。这真令人扫兴。我还指望即使不了解一下我那组新诗的命运，起码也可以尽情地谈谈文学问题。

接待室里只坐着一位我不认识的来访者。他好奇地朝我身上的见习军官制服看了一眼，而我则带着敬意（或许，这是索洛古勃——谁知道他）回望了他一眼：这是一位身穿常礼服、留着奥涅金式络腮胡子、脸颊红红的先生。

我在屋角坐下，拿起一份东西读了起来。纳尔布特还没有来。我在编辑部所有的房间里走了一遍——一个人也没有。前厅里有架电话，那好，就给秘书挂个电话吧。

秘书不在家。电话那头的人问我是谁，我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挂上电话，走到接待室取大衣。

"冒昧地打听一下，"那位脸颊红红的留络腮胡子的先生问我，"您是发表在前一期杂志上的那些诗歌的作者吗？"

我说是的。

"多么令人愉快啊！我正想请纳尔布特介绍我俩认识呢。我是斯卡尔金……"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的友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们的那些长谈和夏季里彼此写给对方的长达几十页的信的内容是什么。当然，主要是谈论诗歌。但在斯卡尔金的谈话和信件——最寻常的谈话和信件——当中夹带着某种秘密的影子：这种秘密他好像不能对我这个不知内情的人透露。这种来自斯卡尔金的"神秘主义"我几乎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了，尽管斯卡尔金的外表也好、性格也好，全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是个节俭的、爱劳动的正派人。如果俄罗斯有朝一日真的成了农民

共和国的话,那部长们在外表上和思维方式上大概将会是这种样子的。卡林的常礼服也好,原版的埃斯库罗斯也罢,[1]都是外来的,是形式。而主要的,“自己的”则源自伏尔加河,在那里,人们用斧子砍杀商人,边在隐修院里拯救灵魂,边(上帝作证!)高价出售臭鱼。这一切魔术般地聚合在斯卡尔金的身上,尽管他的行为举止像西欧人,有时甚至相当夸张。

有的时候,他说一些颇为奇怪的话。

“你是贵族?”

“贵族,怎么?”

“我是个乡下人,爷爷是农奴。”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农奴。”

沉默。“你不理解这个。”

“什么?”

“对我而言当贵族的重要性。”

“是的,不理解。”

“瞧见了吧。你是个贵族,就是说,你有徽章和带五个叉的冠形章纹。可你不需要这个,你的徽章很可笑,是徽章司的某个文书绘制的。一个炮架外带一堆炮弹……但有的人得到的徽章上有三朵百合花和所罗门星,这是因勇敢和所建的功勋而由国王颁授的——这样的徽章应当秘而不示,因为它的拥有者失去了每个退休将军所拥有的权利。”

“带所罗门星的徽章是不是授给了你?”

“或许,也给了我。”

“谁颁授的?”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怎么样,你过继给我当儿子,这样你就能用我的冠形章纹去装饰自己那出色的徽章了?!……”

斯卡尔金微笑着转移了话题，之后便再也无法从他那儿打听到些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斯卡尔金，而我——尽管自己也不太清楚——被吸引的正是他的这种言犹未尽。我当时很年轻，所有神秘的东西都使我入迷。斯卡尔金在"发出"半吞半吐的话语和种种暗示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而我则有理由怀疑，他除了在自己的商行里当经理、写诗歌以外，还过着某种像谜一样的生活。不久前，我兴趣盎然地阅读了于斯曼的作品，我有时在想，我的朋友莫非也是魔鬼崇拜者……

一次，我去他位于石头岛大街的家看他，我是偶然去的，已经很晚了。我在他家门口长时间地无望地按着门铃。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前厅里响起了脚步声。给我开门的是斯卡尔金本人。他穿着燕尾服，脸色比平日苍白。他有些奇怪地看着我。

"是你……我没想到。请稍等一会。我这就好。"

我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便想告辞离开。

"不，没什么，正相反，你来我很高兴。在这坐一会儿，"说着，他把我推进客厅，走的时候掩上了门。

我坐了一刻钟左右，开始觉得无聊。于是，我稍稍打开一点通向旁边房间——餐厅——的门，眼前的景象使我惊讶得几乎要喊出声来。桌上摆放的东西琳琅满目，我没想到斯卡尔金有这么多贵重的餐具：镀金的盘子、高脚酒杯、长颈玻璃瓶。还有一只很大的枝形烛台，插着点燃的红色蜡烛。桌子上已铺好台布，但没看见有什么食物，只是在金色的盘子里放着几块黑面包，两个黄色高脚酒杯中盛着少许的水或酒。我惊讶地打量着这些奇怪的奢侈品。所有的物品上都刻着徽章图案：有星星、百合花，没有冠形章纹。我刚想把一只盘盖打开一点，看看里面有

什么,突然听到夹层——那儿有斯卡尔金的书房——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去看看与斯卡尔金约会的女子这一想法在那一刻特别强烈(我确信,他正在接待一位女子)。我弯下腰,把眼睛凑向钥匙孔。算我走运,孔眼上没有插着钥匙。

……斯卡尔金正将一件皮大衣递给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小个子瘦老头。斯卡尔金帮他穿上大衣以后,又亲自为他穿上套鞋,递给他帽子和手杖,然后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脑袋差不多要碰到地面。老头做了个祝福的动作,又把手伸了过去。斯卡尔金吻了一下他的手。两人一同走出了房间。大概,斯卡尔金把客人送到街上……

等他返回屋里之后,或许,根据我的表情看出我窥视过了,于是,他走到我身边,抓起我的一只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我是你的朋友,也像朋友一样请求你,永远不要问我,假如你已看到或者听到什么的话。无论如何,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请你明天或者随便什么时候再来吧。今天我不舒服……请原谅我……"

第二天,我把庄重的允诺抛到脑后,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对斯卡尔金"纠缠不休"。而他只是以自己的一贯方式开着玩笑敷衍我。

"是的,我这里来过一位女士。"

"灰白头发的?"

"正相反,黑发……一位西班牙女郎。"

"我看见……"

"这么说,你没看清。"

"那刻有徽章图案的金色餐具呢?"

"不是金的,是银的,也不带徽章……"他拿起一只纽伦堡出的杯子给我看,"好了,别再说废话了,你明天去看芭蕾吗?

……"

我的好奇心最终没能得到满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斯卡尔金的友谊有些冷淡下去了。他的神秘感不再吸引我,另外,自从那个奇怪的夜晚之后,他好像再也没有脱口说出些令人捉摸不透的话来。对文学的兴趣也不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分道扬镳。

不过我们依然见面,有时还相互通信。1914 年 5 月底,我从乡下给斯卡尔金写信,请他给我寄些书。我知道他打算出国,所以在信中祝他一路顺风。他在回信中写道:"国外我不去了,为时已晚。眼下,全球性的战争就要爆发,它将持续十年……"

"你这在乱写些什么呀,什么战争?"我又去信问道,但没有收到回复。斯卡尔金离开彼得堡去了高加索。

战争开始了。我想起了斯卡尔金的预言。我找到了他。"你怎么知道会爆发战争?"这是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知道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梦见的……幻觉。"

"你倒可以凭预言赚大钱,就像苔普夫人那样。"

"怎么像苔普夫人?这你也会。在这种事情上她完全是个外行。"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很奇怪。那是 1918 年。晚上,我沿卡尔波夫卡走着。大街上又暗又空旷。迎面走来一个人,他步履有些摇晃,帽子被推到后脑勺上。当我俩擦肩而过时,我认出了斯卡尔金。

见到他我非常高兴,他,好像,也一样。"你去哪儿了?"我问。"一直在这里,在彼得堡。""那怎么到处都见不到你呢?"他含义不明地摇了摇头:"是啊……现在在哪儿可以见面呢……去

我家吧,谈谈,怎么样?我现在就住这儿。”

房子很华丽,但没有看门人,电梯不运行,电灯也不亮。我们上了三楼。斯卡尔金没脱外衣,领着我穿过几间没有灯光的房间。有时他划亮一根火柴,于是便能看见屋内的镜子、很大的花瓶、书籍和古老的水晶吊灯的挂片。这套居室看上去很大,装饰豪华。屋里冷得要命。终于,温度起了急剧变化——壁炉的炉堂里满是燃烧着的劈柴。斯卡尔金点燃了枝型烛台上的蜡烛: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正是那只烛台……

“认出来了?”斯卡尔金问道,他面带笑容。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

他脱下了自己的那件旧大衣。穿着西服的他看上去和以前一样,稍稍瘦了点。

“想喝茶吗?或者来点酒——我这有。”

“你为什么问我‘认出来了’?”

“因为你认出了枝型烛台,干嘛装模作样的?”

“认出来了。那好,既然你自己提起这事,或许,你现在给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有什么可说的。”斯卡尔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看些东西。但没什么可说的。另外,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我们喝了点烫过的纽伊酒。我们的谈话不怎么顺利。我们谈到布尔什维克,谈到面包短缺,谈到诗歌——谈什么都是一样地无精打采。

“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问道。

“啊……你问这个?有必要吗?第一,我觉得,那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另外,你像个神经过敏的孩子,你会害怕的。”

“什么害怕?你这是故弄玄虚!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就给

我看吧。”

“好吧，只是有言在先：别要我做解释。”

斯卡尔金从老式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只普普通通的粘土做的钵，然后走出屋去，回来时带着一罐水，他往钵中倒满水，熄灭了所有的蜡烛。壁炉里的火光很亮。

“现在，”斯卡尔金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你看！”

“看哪儿？”

“看水里……”

我将信将疑地朝水里看去。这是普普通通的水。他在捉弄我。我正想这么说，突然，我觉得钵底有个像金鱼一样的东西显现出来。斯卡尔金将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你看！”水里又有一些东西显现出来，接着，如同在照相机的毛玻璃上那样出现了一些轮廓线，起先较为模糊，后来变得清晰起来……我哆嗦了一下：这是斯卡尔金老房子里的餐厅。就像那天晚上那样，餐桌已经布置停当——金色的餐具、鲜花、点着蜡烛的枝型烛台。我站在门口，然后朝桌子走去，环顾四周，正用手去揭盘盖……

……灯光大亮，一切随即消失了。这是电站为了让苏联公民高兴（也是为了让他们惊恐——突然又要搜查）而接通了电闸。天花板上挂着的巨大的水晶吊灯华光四射。

“嘘……”斯卡尔金阻止我：“记住我们的约定。忍住，下次我给你看更有趣的东西。”

但是，不仅“更有趣的东西”，而且连斯卡尔金本人，我再也无缘见到。两天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张纸条：“别来我处，我家里有埋伏。我只得离开彼得堡……”

注释：

① 埃斯库罗斯：古希腊诗人、剧作家，“悲剧之父”。

中国剪影：文学肖像

勃洛克

1921年春的一天，我去小剧院参加勃洛克诗歌晚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楚科夫斯基在做报告。他一副奉承的样子，像泥鳅一样灵活地欠身、鞠躬，面带微笑，舞动着长长的双臂：他在证明——勃洛克是位伟大的诗人。

楚科夫斯基的表演效果极差，简直是糟透了。一切都不那么到位。引言不贴切，惊喜的表情也很做作。也许，楚科夫斯基没说一句假话，但他所做的，不是他拿手的事情，因此，效果就不佳。楚科夫斯基的事业、他的使命、他写作的全部意义就是谩骂和贬低别人。在这方面，他有罕见的才能和令人惊诧的机敏。假如要把勃洛克——不光勃洛克，甚至普希金、托尔斯泰——碾成粉末的话，那他大概就能把这匪夷所思的事情办成，而且会干得相当出色。但是，要他连续一个半小时发出赞叹，赞叹得合理、真诚、天衣无缝，还要引用安德烈·别雷的"象征主义"……那他的发言便会像一锅烧糊了的粥，不会给他增添成功的荣耀，而勃洛克则更不用说了：对他而言，饶舌的楚科夫斯基的"承认"含有某种侮辱性的东西。

在楚科夫斯基讲完以后，勃洛克用自己的诗歌为报告"配了

插图”。他朗诵的时间并不特别长。比起早年写的、更负盛名的作品来,他显然更乐意朗读近几年所作的那些平淡、不太令人愉快和朦胧的诗歌。《飞行中队长的脚步》!《陌生女郎》!《意大利诗笺》!——听众中有人向他喊道。[①]勃洛克向众人鞠躬,面带冷淡的、漫不经心的微笑,用自己那令人惊讶的、呆板但同时又带有魔力的嗓声朗读了《我朋友的生活》或者是另一首可怕的诗作。

如果没有沙皇
去维护法律,
那这一切原本是枉然。
只是不要去寻找宫殿,
真诚善良的脸,
和那金色的王冠:
他从遥远的荒漠走来
出现在稀疏的路灯
　　射出的光线里面。
脖子上裹着头巾,
从破旧的帽沿下
露出一张微笑的脸……

勃洛克还颇受欢迎。我这里说的“还”,指的不是他去世后所享有的声誉,而是那份更为热烈的感情、那份不断增长的、在1910至1915年间成为一个独特现象的“对勃洛克的钟爱”之情:在俄国诗歌史上,很少有人能像勃洛克那样在生前受到读者如此的喜爱。到1918年的时候,公众对诗人的“热情”有些冷却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随它们去吧。但即使到了1921

年，勃洛克还是很受欢迎。听众朝他热烈鼓掌。晚会结束后，勃洛克费力地从向他致意的青年人群中挤出去。人们同他握手，将鲜花抛在他的脚边，用充满爱意的眼睛凝望他。但是，尽管大厅里坐满了人、喝彩声不断、众人的目光爱意盈盈，在这个晚会上还是能感觉到一种明显的疏远——相互间的疏远：听众疏远了自己喜爱的诗人，诗人疏远了自己的听众。好像，热烈的气氛和赞叹只是出自习惯，原先的那种“交流”已经没有了。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依旧向他鼓掌，抛鲜花（两周以后，相同的晚会在莫斯科这座更为“先进”的城市举行，勃洛克受到的欢迎已是相当冷淡）。但假如马雅可夫斯基走进这个大厅的话，众人就会把勃洛克忘掉。这能够感觉到。

好像，勃洛克本人也感觉到了。他先是听楚科夫斯基荒诞不经的赞扬，然后朗读诗歌，然后挤出向他鼓掌的人群，脸上一直带着疲惫、冷漠的表情。其实，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表情。我记得勃洛克的另一次“辉煌成功”——好像是在 1913 年：由梅耶霍尔德导演的《临时小戏台》的上演。当时，场面没有这样隆重，人也少一些，但实质却是相同的：勃洛克看着，别人是怎样曲解他的，而观众对这种曲解又是如何从心底里深感喜悦的。《临时小戏台》是按“艺术的喜剧”的风格排演的，演员们粘着假鼻子在台上跳来跳去，梅耶霍尔德容光焕发，观众们鼓着掌。他们怎么能不鼓掌呢？要知道他们是经过挑选的、先进的、有教养的人士，他们同情每一种探索和创新。

勃洛克就是带着那种冷漠孤寂的表情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的。勃洛克的“损失”已经开始了——奇怪的、可怕的“损失”，1918 年它表现在《十二个》那不祥的成功里，1921 年则表现在他的死亡里……

大概，损失也开始于对生活、对人的冷漠和蔑视，在勃洛克

人生的最后阶段、“夕阳西下”阶段,这种情绪在他的谈话当中流露得越来越明显。

……黑夜。街道。路灯。药房。
毫无意义的昏暗的灯光。
再活上哪怕四分之一个世纪——
一切仍将如此。没有终场。

死去,仍要重新开始,
一切循环往复,保持原样:
黑夜。运河上冻结的波纹。
街道。路灯。药房。

烦闷——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题目了。诗人非常烦闷……读者怎不更烦闷呢!但正是通过描写烦闷、无望、无意义和恐惧,勃洛克才达到诗歌的“冰雪覆盖的顶峰”。如果从勃洛克的文集里抽掉几十首这样的“诗歌”的话,我们就认不出这位最“痛苦”的、在我们时代最敏锐地打动读者心弦的诗人了。如果把这类诗歌拿掉的话,剩下的与波隆斯基写的东西也就相差无几了……

这是彼得堡春天一个温暖的夜晚。在参加了勃洛克诗歌晚会以后,一些人正沿着叶卡捷琳娜运河走着。楚科夫斯基走在最前头,艺校的男女学生们嬉笑着簇拥着他。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勃洛克和古米廖夫。我与佐尔根弗莱走在最后。我的这位同行者不爱多说话。周围很安静。前面的人的说话声不时地传到我的耳边。

“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之间不可能建立起联盟。我们走的道路不同……”

“就是说，要么是差强人意的和平，要么是战争？”

“差强人意的和平也不会有……”

古米廖夫轻声地笑了起来，“我说，您全然不会像外交官一样地说话。不过，我喜欢这样。战争就战争吧……”

楚科夫斯基开的玩笑引起的大学生们的哄笑声盖过了这一谈话。过了一会儿，古米廖夫带着笑意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在我们这场比武中，您的骑士颜色是哪种？”

勃洛克认真的声音：

“黑色。我的颜色是黑色。”

……这是一个温暖的彼得堡之夜。我们大家朝位于铸造大街的由于古米廖夫的努力而得以开始筹建的“诗人之家”走去。

过了不到四个月，就是在“诗人之家”的舞台上，它的承包人、一名餐厅服务员，在因节目单中的某个问题而向众人致歉时，心直口快地解释道：

“节目单上的计划没能实现，因为出了三件不幸的事情：古米廖夫被捕了。勃洛克死了。另外……电线烧坏了。”

介绍我和勃洛克认识的是格奥尔吉·丘尔科夫，那是在1910年。

丘尔科夫有个习惯，就是不时地发现某个“新的天才”，为他张罗，将他引荐给社会名流，把他的诗歌读给遇到的每一个人听，并推荐给杂志社，等等。

丘尔科夫这样做并非毫无私心：在亲切照拂“文坛新人”并且把他“引进”文学殿堂以后，丘尔科夫开始向年青人灌输由他发明的“神秘无政府主义”。这样一来，双方关系通常会产生不

可避免的疏远,因为对“神秘无政府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1910年,轮到我跟在丘尔科夫的左右并且聆听他大谈“伊西斯的盖布”的传说[2]。我们到勃洛克家时将近晚上了。他当时住在皇村贵族子弟学校附近造币厂街一幢很大的现代化房子的六楼上。

书房宽敞,也很亮堂。从窗户里望出去,外面是皇村贵族子弟学校的花园、烟囱、民居屋顶和教堂的圆顶。勃洛克看上去和他在肖像上的样子很相象(那幅肖像很有名,他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只是眼眶发黑,嘴边有皱纹,目光疲惫。

勃洛克正伏案写作,见到我们便站起身来,跟我们握手。照着自己的习惯,丘尔科夫立刻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又谈我的诗,又谈自己的伊西斯,还谈论天气情况。他把额前那一绺文学家的头发捋向一边,拖长声调读起了一首描写原始森林的作品……对丘尔科夫的闲扯,勃洛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他赞扬了我的一首诗歌(当然,他一点也不喜欢它),慎重地对丘尔科夫的话提出自己的异议。接着,他为我们沏茶,还是那么稳重,那么客气。不过,显然,我的诗歌也好,伊西斯也好,我们的来访也好,勃洛克都不需要,这一切都令他厌倦。为我们沏茶、与我们交谈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主人,而诗人——他的幽独被我们打破了——却不在场,他哪有工夫顾及我们。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觉得很不自在。

临告辞的时候,丘尔科夫到前厅去打电话。我面对沉默不语的勃洛克坐着,心中暗暗抱怨丘尔科夫——此刻,他正对着电话娓娓动听地讲述着某人的“奇异的舞蹈”。突然,默不作声地坐着的勃洛克换了一种神情看着我:直接注视着我的眼睛,坦然、亲切、友好。

“瞧……您是这样的年轻……您几岁了?”

我脸红了。我对自己十六岁的年龄感到特别难堪。

“是啊…如此年轻……您觉得,写诗是一种快乐? ……诗歌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是可怕的重负……”

“吻您的手,亲爱的,”丘尔科夫对着听筒热情似火地说着,“特别是您的小手指。请您一定要来:这不是一般的芭蕾,简直是魔法,是宗教神秘剧……”

“这样吧,”勃洛克把手放到我的肩上,“过两天再到我这儿来吧。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来吧,”他朝门口瞟了一眼,“一个人来,不要带盖奥尔吉·伊凡诺维奇……他善良可爱,但是,”勃洛克咧开嘴笑了一下,“他……太那个……活跃了……”

我不止一次地“顺便去过”勃洛克那儿。现在,对在空荡荡的、宽敞的、窗外有着屋顶和落日余晖景色的房间里谈话的回忆,对勃洛克的缓慢、惊人的声音、不连贯的但又令人着迷的谈话的回忆,在我的脑海中融汇成一团闪烁着冷光的雾气。我们谈过些什么? 确切地说,他谈过些什么? 因为我通常只是听,竭力去理解,接受他那不甚明确的、无具体对象的、变化莫测的独白。

勃洛克的主要话题是死亡和爱情。爱情比死亡更强大吗? 勃洛克摇摇头:这是南法抒情诗人的臆见,死亡更强大!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斟酌自己的想法:是的,死亡比爱情更强大。

“您为什么要画风景画、做雕塑? 这不是诗人的事情。诗人应该只记住一点:爱情和死亡……”勃洛克有一次在从萨拉托夫的沙赫玛托沃寄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勃洛克送给我的一本书上有这样的题辞:“纪念有关爱情的谈话”;在另一本书上——“纪念有关死亡的谈话”。

在勃洛克的谈话中,星星、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恐惧、忧郁、柔情等常常包裹着这个话题。有时,话谈到一半,勃洛克会

停下来，打开某本书，往往是很巧，也很奇怪——翻到的内容几乎都是对刚才所说内容的回应。

记得有一次，已经是战争期间，1915 年或者 1916 年，我偶然顺路去拜访勃洛克。我们之间偶然展开的谈话又突然"转向"那个方面：我俩已很久没有过这种谈话了，勃洛克曾经和我，一个少年进行过这种如雾团般的谈话。勃洛克谈起了死亡，谈起了自己的日益临近的死亡。我，就像人们在这种场合下习惯做的那样，表示着不同意："别这么想，您……"勃洛克默默地从桌上拿起丘特切夫的诗集递给我。翻到那页上印的正是"悼亡兄"

……日子屈指可数。损失无法估量。
鲜活的生命早已成为过去，
前面已空无一人，而我，就这样，
首当其冲，厄运临头。

"要成为一个诗人，应当在生活的秋千上尽可能用力地摇荡……"

"只有当您爱某人胜过自己的生命时，生命才会获得它的价值……"

我记得勃洛克当年(1911 年或者 1912 年)在给我的信中说过的这两句话。

在一次"朦胧"谈话中，勃洛克若有所思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大家……说话都温文尔雅……写诗时只关心各种四音节韵脚……不久前，福法纳夫去世了……想当初他在水沟里打滚，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星星什么的。他的作品很一般，但里面有我们所没有——或许，连普希金也没有的东西。"

"是什么呢？"

"很难确切地表述出来……与上帝、与永恒的某种直接联系……光推敲韵脚是难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

"这样说来,喝醉了酒躺在沟底要比坐在这样的书房里工作对诗人来说更有益喽?"

勃洛克若有所思地微笑着:"或许。更有益!"

勃洛克的生活与彼得堡作家的一般生活不同。铸造路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沙龙引人注目。在塔夫里路,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宝塔"品味更高,书卷气更浓。还有几十个更小一点的"中心",它们共同编织着文学界的生活:斗争、分裂、组合。勃洛克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但总是与众人保持着距离。他的"主要"生活是在一旁进行着的,他有二三个密友,也都是"旁观者"。

这是怎样的生活? 这又是怎样的一些朋友呢?

……勃洛克过着隐居者的生活。他起得很早。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家人细心地为他保持着室内的宁静。如果有人打来电话,总是妻子或者女佣去接: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出去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病了……为了与勃洛克见上一面,事先得进行长时间的、复杂的联络,而付出的努力常常又是没有结果的:病了……出去了……

勃洛克既没生病,也没出去。大概,他正忙于某项亟待完成的工作。但也不总是这样。更多的情况下他坐着,双手放在背后,眼睛盯着前面的某一点。他能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二个小时、三个小时、一整天。窗外是贵族子弟学校的花园、民居屋顶、教堂的圆顶。桌上是一瓶刚打开的叶里谢耶夫"纽伊"酒。整套居室相当安静。

勃洛克看着某一点。有时,在一个幸福的日子里,从壁纸和家具里,从朝向贵族子弟学校花园的窗外,从放着纸张和"纽伊"

酒瓶的桌上会聚汇起一片云。慢慢地,这片云会变成一张浅灰色的闪着光亮的帆。如果这时突然响起烦人的电话铃声,那一切就烟消云散了。但四周一片宁静。在帆的中间,开始显现出一只鹭的身影。它一动不动地单足站立。鹭像玻璃一样晶莹,透出微弱的光。逐渐地,这一微光变得越来越明亮,光彩夺目。水晶般耀眼的鹭站在蓝色的帆的中心,面对着勃洛克凝神专注的目光。勃洛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奇特的景象,双唇开始翕动,重复着正在酝酿的新诗的最初几个字。不见到自己的鹭,勃洛克是写不出诗来的。

"我今天多想写些东西啊,"他说,"我相信,那只鹭会出现的。可多遗憾——坐着,等着,却一无所获。"

"没写出诗?"

"没有。"

当然,勃洛克不总是在期待着那个发光的幻影。

他在桌边坐下,拿出几本订在一起的本子,并把它们打开。这是手稿?不是。这是一本书,记载着他与人通信的情况。里面有很仔细的栏目划分。一栏是登记信件的号码和收信的日期。另一栏里标着回信的日期。勃洛克是世界上最认真仔细的人。

在另一本本子里贴着他所写的评论的剪报。第三本本子里是他发表的诗歌,旁边有勃洛克亲手写的说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发表等等……

……黑夜。街道。路灯。药房。
毫无意义的昏暗的灯光……

还有记载着通信情况的本子,被仔细地划好的栏目:收到

——回复！

……对众人来说，勃洛克没有在家。但是，对他的几位密友而言，却不存在任何限制：弗·皮亚斯特——行为荒唐、蓬头垢面、半疯半癫的诗人；佐尔根弗莱——举止稳重的绅士、工程师、凡尔纳作品的爱好者、神秘哲学的行家；叶甫根尼·伊万诺夫——时而显露出一些才气的怪人，很像安娜·卡列妮娜梦中的红发男子。勃洛克对这些客人的到来总是感到很高兴。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勃洛克与他们长时间地交谈（他与佐尔根弗莱谈些什么呢？不会是谈热·凡尔纳吧），长时间地散步，然后在日记中写道："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和皮亚斯特一起在拉赫塔散步并吃了香肠。"

……半夜两点，彼得堡的某家小饭馆——"雅尔"、"切列别尼科夫"或者"达维特卡"。雾气腾腾，食客们说着醉话。一张小桌子后面，坐着勃洛克。喝空的酒瓶排成一线，越来越长。又有人在桌边坐下。有人过来碰杯。勃洛克醉了，脸红红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点看着。他在那儿看到什么？自己那张蓝色的帆？还是福法诺夫看见过的星星？还是那个女子：

她慢慢地在醉汉间穿过，
总是独自一人，没有同伴，
她在窗边悠然坐下，
身上散发着香气和雾气。

或者，最有可能的是：

运河上冻结的波纹，
街道。路灯。药房。

和生活中可怕的，难以忍受的烦闷：为了不辜负这种生活，应当爱上一个比生活更强的人……

……皮亚斯特一边喘着气，一边像念诗一样嘟囔着什么：关于坏牙和爱德加·坡。格奥尔吉·丘尔科夫捶着胸膛喊道："萨沙！萨沙！"他满脸都是因喝醉酒而流出的眼泪。"为永恒的女性美干杯，萨沙！"

……在生活的秋千上应当尽可能有力地摇荡……

从天性、受过的教育和自小养成的习惯等方面来看，勃洛克是个平静、稳重，喜欢劳动和安静生活的人。

听上去也许颇为刺耳，但我们只是做一个暂时的假设：假如勃洛克不是诗人的话，那人们很容易把他想象成一位安坐书房的学者，或者一个成功的地主，或者某家资产雄厚且管理得法的企业的主人。

认真仔细、有条不紊，优雅的风度、审慎的谈吐、聪慧的目光——一切都与此吻合。要想象出这个漂亮、正直、聪慧的人的生活是多么容易啊。当然，是一种幸福安宁的生活。

但是，勃洛克是位诗人，而且度过的是不幸的、不安的、苦闷的一生。

诗歌是某种类似羊癫疯般的东西。当病情隐而不露时，只有相当仔细的目光才能在患者的脸上辨别出某些不祥的征兆，例如，"嘴唇的翕动"，声音中不同寻常的调子，眼神里"不对劲"的地方。但是，突然，羊癫疯出人意料地发作了，患者变得难以辨认。

来自勃洛克的"可怕的世界"的缪斯艺术女神就是这样拜访他的。当"发作"过去以后，勃洛克颤抖地回忆起"你的这些可怕

的爱抚”。诗人的情绪越冲动，读者听众的呼吸就越难受。

……在你心中的曲调里，
有着宣告死亡的噩耗，
有对神圣遗嘱的诅咒，
还有对幸福的指责……

是的，在缪斯的歌唱里应有尽有。“心中的曲调”也没有说谎：当人所珍视的一切被诗人诅咒的时候，死亡就来临了。

……你的钱在哪里？拿到小酒馆去了。
心在哪里？被抛到漩涡中去了……

对诗人和艺术家，对所有杰出的人士，在他们死后，人们通常说：“他耗尽了所有的精力”，“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种表达的方法而已。但是，勃洛克确实是由于写作诗歌而死的，就像其他人因肺痨和癌症而送了命一样。

“我们不是在他死去的时候失去他的，而是更早：在他创造出自己生活理想的那一刻”——可以把勃洛克论述画家伏鲁贝尔的话运用到他自己的身上。“自己生活的理想”，自己的“可怕的世界”的终结和果实——长诗《十二个》，勃洛克创作于1918年……

也是引自同一篇文章中的话：

“未曾有过的落日余晖为未曾有过的紫蓝色群山染上一层金黄……”

注释:

① 《飞行中队长的脚步》等都是勃洛克作品的名称。

② 伊西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女神。她是丰产和母性的庇护神,司生命和健康的女神。

古米廖夫

一

1921年8月27日，古米廖夫被处决。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但实际上，对古米廖夫的生平传记来说，对他自己所希望拥有的传记来说，很难再想象出一个比这更好的结局了。他——一个诗人、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格奥尔吉勋章获得者，一个勇敢的谋反者，在荣誉的巅峰，在年富力强的时刻遭逮捕、被处决了……

古米廖夫说过，诗人应该"虚构一个自我"。他就虚构了一个自己，而且如此认真，以至于对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而言(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他的面具成了他的真面目。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才知道另一位古米廖夫。当然，为了了解他的真实面貌，应当知道两个古米廖夫，即被虚构者和虚构者。我先讲讲前者。

这是1910年的事情。我家的一位熟人用朗读"颓废派"诗歌来让大家解闷、开心。我那时16岁，已经开始写诗，也是颓废

派风格的,一打一打地写。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索洛古勃的名字我很熟悉。但是,朗诵者在读完《船长》之后报出了古米廖夫的名字。他的诗因其明晰、辉煌和出色的音韵令我惊讶,我记住了这个第一次听到的名字。

一年半以后,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我先是与未来派为伍,后来脱离他们,“增聘”进了刚刚成立的“诗人车间”。戈罗杰茨基在宣布我的加盟时说,古米廖夫喜欢我的诗作。不知为什么,古米廖夫的赞许要比我认识的戈罗杰茨基或者丘尔科夫的表扬更使我兴奋。我当时几乎没有读过古米廖夫的诗,也没见过他本人。

我们是在“野狗”俱乐部里,在为巴尔蒙特举办的晚会上认识的。那天,“车间”的所有成员都要到场,我作为新加入的一员也出席了。我自然到得很早。逐渐地,其他人也来了:他们中有津凯维奇、曼德尔施塔姆、玛拉芙斯卡娅。戈罗杰茨基来的时候,腋下夹着“车间”的标志——木制的七弦琴。在节目开始之后,只听有人说:“瞧,古米廖夫。”

古米廖夫正站在售票处买入场券。他笨拙地低着头,慢慢地数着手掌中的零钱。在他身后,站着一位女士,瘦瘦的,个子很高,皮肤黝黑,穿着一件与肤色不协调的蓝盈盈的连衣裙——那是他的夫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的外表令我感到惊讶,他看上去像个步履缓慢而又庄重的木头人。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他那大大的,像用硬板纸剪贴而成的鼻子,他那用推子修剪过的脑袋和没有眉毛的漠然斜视的眼睛。古米廖夫的穿着也很古怪:黑色的长襟礼服和橙黄色的领带。有人介绍我俩认识。他就我的诗歌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表示好感的话。而我立刻就在心中感到了对他一种近似畏惧的恭敬。只是在与他密切交往几年之后,这种感觉才最终消失。我并不是唯一有过这种体验

的人,古米廖夫能使他周围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当时我觉得,古米廖夫的外表怪得有些畸型。他的确很不漂亮,但他有一双很美的手和罕见的极具魅力的微笑。

“诗人车间”是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建立起来的。极端与极端会走到一起——只能用这条规则来解释这个存在时间自然并不太长的联盟。孤芳自赏的古米廖夫和“朴实的小伙”戈罗杰茨基——他们两人之间,两人的诗歌创作之间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是“车间”里正式的平起平坐的主人。他们轮流担任主席。两人都有极大的特权——开会时坐在深深的圈椅里。而其他人,包括库兹明和勃洛克在内,只能坐一般的维也纳式的凳子。

通常情况下,戈罗杰茨基总是在各方面支持古米廖夫。但有时,大概是为了做做样子,也会与他争论。古米廖夫说:“很好!”戈罗杰茨基反对道:“很糟!”

当然,古米廖夫总是胜利者。总的来说,他很喜欢与人争论,但从来没有被驳倒过。与一些稚嫩的对手,例如他当时的学生辩论,要达到这点并不难;但在与一些高手争辩时,甚至在他明显理亏的情况下,他也总能找到办法,最终占得上风。“车间”主人和普通成员的关系就像团队长官和年轻军官之间的关系一样。“列队”时——也就是开会时,纪律严格之极。自然,“教师们”和自认为是教师的人们很快由于各种原因而感到受了委屈,便不再参加“车间”的活动了。留下来的都是些稚气十足的年轻人,而最为“忠实”的成员日后则组成了阿克梅派小组。

会议结束以后是愉快的晚宴。又是像在军队里一样,长官古米廖夫和“年轻人”一起喝酒,用表示亲热的“你”称呼,开玩笑,说趣闻,显然是个热情、和蔼的主人,但是,“等级关系”一刻

也没有被忘记掉。

古米廖夫到非洲去过三次。他一去就是几个月。回来以后,他那间皇村住所里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书房”便会被新带来的兽皮、绘画和各种其它物品装饰一番。这都是些令人疲惫的、花费昂贵的旅行,而古米廖夫身体并不强壮,手头也不富裕。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前往非洲的。他深入到那些未被考察过的地区,研究民间创作,说服彼此反目的当地酋长们言归于好。有时,自己也与他们发生冲突。由他组织起来的黑人队伍在撒哈拉边走边唱:

最好的武器是毛瑟枪!
最好的卫队长是艾—贝尔—贝克!
最好的长官是古米廖夫!

他最后一次赴非洲考察(那是在1913年,战争爆发之前)已经主要是由科学院出资安排的了。我清楚地记得他动身前后的情景。一切准备就绪,行李已经托运,轮船和火车票也已订好。出发的前一天,古米廖夫病了,头部剧痛,高烧四十度。大夫来看了以后说,可能是伤寒。古米廖夫整夜都在说胡话。第二天早晨,我去探望他。高烧依旧未退,意识还不清楚;他会突然中断谈话,说起什么会认字的白兔的事情,说到一半又打住,重新颇有条理地跟我谈下去,接着再次打断。

我告辞的时候,他没有把手伸给我:“你会被传染上的,”接着又补充道,“好吧,再见,祝你健康,我今天可是一定要上路的。”

第二天,我又去看望他,因为我不怀疑,关于他要上路的那

些话，就像那会读书认字的兔子的故事一样，是病人的呓语。迎接我的是满脸泪痕的阿赫玛托娃："科里亚走了。"

火车发车前两小时半，古米廖夫要求为他准备好刮脸用的水、外衣。家人试图说服他，但没有奏效。他自己刮了脸，自己把没整理好的东西整理好，喝了一杯掺白兰地的茶，就出发了。

1914年秋的一天，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社喝茶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又好像是不经意地宣布，他要去参军。闻听此言，大家都感到吃惊。古米廖夫是二等民兵，当时并没有考虑征召这种人入伍。他从来没有当过军人。

这样说来，他是个志愿者，战士？

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穿上军装，奔赴战壕——不光我一个人觉得这样的念头很奇怪。

古米廖夫的想法则不同。一开始，他体检不合格，为了达到入伍的目的，他费了不少周折。

一个半月后，他穿上了枪骑兵禁卫军志愿入伍者的制服，并且很快就上了前线。

古米廖夫偶尔返回彼得堡短暂休假。他那时还没有写出下面的诗句，但已经有权利这样说自己了：

他体验过饥渴的苦痛，
体验过惊恐的梦境和没有尽头的征途，
但是，圣格奥尔基勋章已经两次
触摸过他那未被子弹触摸过的胸膛。

战争没有使他改变。谈起战争的时候，他讲述一些可笑的琐事，就像在说野餐会的情形，他还读军官妻子写的题诗给我们

听：

就像饰满玫瑰、身披丝绸的美人
在穆斯林的伊甸园，
你们服役在皇后陛下的
禁卫军枪骑兵团。

当有人祝贺他获得圣格奥尔吉十字勋章的时候，他笑着说："这算不了什么，小玩具而已。我准备到春天的时候能得一个'完整的蝴蝶结'(所有四级勋章)。"他那时候写诗，即使描绘战争，也把它写得像舞台布景一样好看，如同过节一般：

沿着敌人退却时
留下的冒烟的道痕行进，
我们快乐地为胜利戴上珍珠一串
就像在替姑娘梳妆打扮。

我只有一次感觉到，在战争中，古米廖夫不像他想要表现的那样快乐。有一天，我们坐了很长时间，回皇村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我便带古米廖夫去我家过夜。第二天早晨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房间好极了。在巴黎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房间。我原本也可以这样生活的，而现在却老是战壕啊战壕。我已经有些累了。"

古米廖夫累了。为胜利"戴上珍珠一串"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在有虱子的战壕里终日枯坐取代了骑兵的勇猛冲锋和获得一个"完整的蝴蝶结"的希望。在那些日子里，他写出了关于拉

斯普京的出色诗篇:

他走进
我们高贵的京城——上帝保佑啊,
广阔无垠的罗斯,
她的公主正受到他的迷惑。

噢,多么悲哀!
喀山大教堂上的十字架
伊萨克大教堂上的十字架
却没有弯曲,也没有倒塌。

2月27日,古米廖夫回到彼得堡。对他而言,革命来的不是时候。他累了,整日在皇村的家中闭门不出。就在那间摆放着宽大的沙发的藏书室里,在关着凸鼻子鹦鹉的鸟笼子下面(就是阿赫玛托娃曾经提到过的那只鹦鹉:现在我也变成了小小的玩物/就像我那只玫瑰色的鹦鹉),古米廖夫写作、阅读。由于不久前生过一场病,他显得消瘦,肤色发黄。他全身裹在一件亚洲式的条纹长袍里。很难在他身上寻觅到以前那个英武的骑兵的影子。

当来访者谈起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疲倦地摆摆手:"我不读报纸。"

报纸他自然还是读的。要知道,即使在非洲沙漠他也没有停止过阅读,在回答第一次看到撒哈拉沙漠有什么感受时,他曾说过:"我没有注意到它,我当时正坐在骆驼上读龙萨的作品。"①

我记得他难得的一次对时局所做的脱口而出的评语:"'克伦斯基'——一百多年后将会是一个多好的悲剧题材啊。"

当年夏天,古米廖夫去希腊的萨罗尼加出差。

古米廖夫没有到达萨罗尼加。他在巴黎停了下来。由于他的关系,彼得堡和巴黎之间开始了复杂的通信联系:从彼得堡发来命令,要"古米廖夫准尉"速去萨罗尼加,而在巴黎的军事长官们——他们已被古米廖夫迷住——则抵制执行这道命令。正当信件往来之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古米廖夫在巴黎逗留了不少时间,然后去了伦敦。

在旅居国外的一年里,古米廖夫写了许多诗,创作了一个大型剧本《有毒的图尼克》,翻译了一批作品。他在把耗费在前线的时间补回来。

在国外,古米廖夫得到了休息。但是,这"休息"的时间拖得太长了。人们对俄国人侧目而视,钱也快用完了。古米廖夫说起过,当时他和他的几位军官朋友曾聚在咖啡馆里讨论未来该怎么办。有人建议加入外籍军团,还有人提出去印度狩猎。古米廖夫说:"我同德国人打了三年仗,也猎过狮子。而布尔什维克却从来没见过。我为什么不回俄国去呢?这未必会比去热带丛林更危险。"别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无济于事。他谢绝了他的有影响的英国朋友为他在非洲安排的一份体面的、有保障的工作。他赶上了一艘去俄国的轮船。启程前的准备时间并不长。送行的人给古米廖夫带来一顶在毕卡第一家有名的帽子店里买的灰色便帽,使他能有一副与无产阶级国家相符合的打扮。

1918年夏天,古米廖夫又回到了彼得堡。他在满目凋敝的涅瓦大街上散步,坐在寒酸的咖啡馆里喝咖啡,拜访朋友,还像

以前一样的镇定和高傲。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旅游者。但是,毕竟要生活,加上古米廖夫又刚刚结婚(第二次婚姻,古米廖夫娶的是 A·H·恩盖尔茄尔德)。此前,古米廖夫还从来没有要靠自己挣钱过日子——他的收入来源是地租。不过,古米廖夫并没有因此而手足无措。

他对我说:“现在,我的诗歌可以来养活我。”

我笑了:“它们能养活你吗?”

“应该能的!”

他做到了这一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靠自己的文学劳动生活的。他先是出版新诗,再版旧作,后来又为《世界文学》翻译了许多作品。他有一大家子人。古米廖夫能“用诗歌养活他们”。人人都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翻译、创作,他还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波罗的海舰队和各种各样的艺术学校讲课。这些单位都是用实物付报酬的:面包、米。古米廖夫对此很喜欢:以精神粮食换取物质粮食。他也喜欢那些听众——海员、工人。他们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这一点并没有使古米廖夫感到有任何的拘束。讲课结束后,他被自己的无产阶级学生簇拥着往回走。路过教堂时,他旁若无人地摘下帽子,庄重而又幅度很大地划着十字。先前,谁也没有听到过古米廖夫谈起自己的政治信仰问题。而在苏维埃的彼得堡,他甚至对陌生人,甚至对显然是布尔什维克的人公开表白:“我是个君主主义者。”我记得,当古米廖夫朗读道:“我赠送给他的有比利时手枪/还有我的君王的肖像”时,一阵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滚过坐满工人的礼堂。

有人劝古米廖夫小心点,他笑着说:“布尔什维克鄙视路标转换派,尊重怠工者。我更愿意别人尊重我。”

在这里,我再回忆另一次谈话来作为对比。那些日子,恐怖

活动盛行,谈话是在旧体制的绝对拥护者中进行的。当时的形势是,有某个白卫军军官的部队发动了进攻,布尔什维克打了败仗。在座的那些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久就要垮台的人大声地讲述着他们对“掌权”日子的期待。这些期待充满血腥味。众人说起了某个姓Π的人,他出身于“上流社会”,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和“彼得格勒公社”的头头。谈话者中的一个人准备“亲手”掐死他,另一个人则想“像杀一条狗”那样开枪结果他,等等。

“那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会怎么做呢?”

古米廖夫将烟卷在自己那只硕大的玳瑁烟盒上轻轻地点了一下:“要是我的话,我会调他去特维尔或者卡卢加,让他负责食品供应。彼得堡对他不合适。”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的那些日子里,两位年轻的艺校女学生在路上遇见古米廖夫。古米廖夫头戴形似军帽的便帽,穿着破旧的、不合身的夏装。他的奇异装束使女学生们感到很滑稽。于是她们哈哈大笑起来。

古米廖夫对她们说了一句她们在他被处决后才明白的话。

“女士们是这样为走向死亡的人送行的。”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换了衣服以后前往工人住宅区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当时,他已经是那个倒霉的“组织”的成员,他就是由于参加这个组织而送命的。

大家已经知道,被捕那天,曾有人提醒过他有危险,还建议他逃走。他的回答也是众所周知的:“谢谢您。可我没有必要逃跑——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动我。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古米廖夫是带着福音书和荷马的作品进监狱的。被捕时,他显得很镇静,受审时也一样;行刑时,无疑也是这种神情,就像

当年捕猎狮子、带领枪骑兵冲锋陷阵和面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员宣布自己忠诚于“自己的君王”时那样。

在被处决的前两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别为我担心。我身体健康，写诗，下棋。请寄些糖和烟叶来。”

二

我不知道，在古米廖夫摇篮里放进自己的礼物——自尊心——的是善良的仙女还是狠毒的巫婆。这种自尊心不同寻常，极其强烈。这一天性帮助古米廖夫成为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一个人，这一天性也将他引向毁灭……

当年，古米廖夫是个身体孱弱、举止笨拙、相貌难看的孩子。但他常向强壮的孩子挑战，同灵活、漂亮的孩子竞争。失败只会促使他加倍努力。

慢慢地，一个征服世界的周密计划在他脑海中形成了。应当依照自己的志向行事——写诗，这些诗歌要比现有的一切诗歌都出色，它们应当令读者震惊、着迷、发疯。应当令读者震惊的不仅是他的诗歌，还有他本人，他的生活。他应该完成一些危险的旅行，建立功勋，征服女人的心。

这些童年的理想古米廖夫事实上奉行了一辈子。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的自信开始被“人类是愚蠢的”这一信念所代替。

在位于普列奥勃拉仁斯基路的住所里，古米廖夫大多数时间是坐在前厅的。苏维埃时期，正门被封了，前厅就成了一间舒适的小小的书房。在那儿，沙发上方挂着一幅画，画的是古米廖夫全家成员在客厅里的情景。这幅画很可笑。特别滑稽的是画

上的一位大叔,他疲惫地站在钢琴旁。不过,他没有双脚——画家忘了将它们画完了。古米廖夫很乐意讲述画中每个人的情况。

古米廖夫喜欢坐在一只圆型的铁炉子旁边,用儿子的玩具马刀翻动炉中的煤块。这儿的一个搁架上放着一只很大的儿童玩具鼓。

“我改不了,”古米廖夫解释道,“打过仗的人嘛,我每到晚上总要打鼓。”

屋子里有不少老鼠。

当有人向他传授赶跑这些老鼠的方法时,古米廖夫说:“您说什么呀,我,正相反,养老鼠防饥荒呢,我要驯服它们。我有时甚至别有用心地同领头的老鼠握手打招呼呢!”

古米廖夫的房间是由扫院子的女人芭莎来打扫的。她很爱听诗。

“趁我洗土豆的工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请读点什么吧!”

“用法语可以吗?”

“听您的。”

古米廖夫高声朗读戈蒂埃的作品,芭莎边洗土豆,边发出同情的叹息声。有时,古米廖夫异想天开起来:

“等着吧,芭莎,布尔什维克很快会被赶跑,那时,您将为我在午餐时做烤鸭。”

“愿上帝保佑,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愿上帝保佑能够这样。”

“到时候,我给自己买架飞机,我说:‘芭莎,请把我的飞机准备好。’我飞得不远,就到那片云那儿。”

“愿上帝保佑能够这样!”

古米廖夫起床很晚，衣服没全穿好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读伯莱克的著作，[2]一会儿读《传奇故事大全》，要不，就在桌边坐下，开始写诗，把前一天买的甜食吃完。

"这就是最舒心的生活，"他常这样说。

"比在非洲旅行还要舒心？"

"在非洲旅行是件艰难的事情。炎热。黑人们不愿听指挥，他们扑到地上叫喊：'卡拉斯。'（不再朝前走了！）得用鞭子催他们起来。你真会气得咬牙切齿。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南方。欧洲人只有在北方才会怡然自得。而离赤道越近，就越感到忧闷。"

"在阿比西尼亚，我有时深夜走出帐篷，坐在沙漠上，思念皇村，思念彼得堡和'野狗'俱乐部。这时我便觉得可怕：万一我因疾病突然死在这里，就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

"在战场上呢？"

"在战场上也一样。可怕而寂寞：当你策马冲锋时，别人喊：'弯腰！'我不弯腰。不过我很清楚，这是怎样的一种冒险。在危险面前制服恐惧，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的科兹马·克留奇科夫不是位勇士，而是个莽汉。"

"在战场上还有一个不舒服：整天穿着靴子，不能穿皮鞋，双脚疼痛。"

1921年整个冬天古米廖夫是在没有钟表的情况下度过的。当有人问："现在几点了？"他摊开双手："谁知道呢？不过，请等等……"他走近窗户："大概四点。""你怎么确定的？""根据太阳光线。""那没有太阳的时候呢？""根据卖牛奶的女人、学生们的走动；晚上，则凭着大街上声响的变化。你知道，这有助于发展人的观察力。我去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迟到过。"

古米廖夫对诗歌的理解力是惊人的——只需一行诗，他就

能感悟整首作品。他的评语是罕见的感觉与品味的典范。他对艺术问题进行评说、争论的才能更是罕见。

但是,古米廖夫又很懒。如果说,在与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或者伊纳肯基·安年斯基进行公开学术辩论时,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出色、更机敏的劲敌的话,那么,应付不太重要的对手,他则常常采用简单,但很有效的方法——"当头一棒",令对方目瞪口呆。

有位年轻诗人情绪激动地向古米廖夫证明着一件什么事,滔滔不绝地旁征博引。古米廖夫不想让步,但又懒得与之争论。于是,他面带讥讽的微笑打断了那位诗人的话:"是的,亲爱的,从您的观点来看,您或许也是对的。但假如您把卡尔的七卷本自然哲学著作通读一遍的话,您的看法就会变了。"

他能通过讲话的方式、自信和声音来压倒对方,甚至在争论他知之甚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

有一次,在去《世界文学》编辑部的路上,我们谈起了音乐。古米廖夫认为,音乐整个儿是构筑在"本能"上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规律。一个外行,不该去写有关诗歌和绘画的文章。但是若要谈论音乐,则悉听尊便。我对此表示怀疑。"想打赌吗?我现在就和勃拉乌德(著名的音乐评论家)谈谈肖邦,他会认真听取我的意见,甚至会同意我的看法。"

"太好了,只是为什么只谈肖邦呢?谈谈某个现代派音乐家。喏,谈谈梅特纳。"

古米廖夫要我对天发誓,说梅特纳确实存在。他对音乐方面的事了解极少,以至于认为我在取笑他。

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古米廖夫和勃拉乌德就刚才路上提到的话题谈了起来。他谈到梅特纳的拜占庭文化特色(勃拉乌德表示反对)和梅特纳世界观中的无政府主义(勃拉乌德表示同

意)。谈话结束时,勃拉乌德说:"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您给我们的《音乐现代人》写篇稿子吧?别怕麻烦——这很有趣。"

在需要的场合,古米廖夫总是不忘记穿上燕尾服。至于燕尾服已经相当破旧了,穿在身上又肥又大——他认为并不重要:只要这一形式得以保持就好。

"我的燕尾服,我的家,我的妻子,"古米廖夫说这几个词的时候,神态同样郑重,给人的感觉是:假如由另一个女人来取代他的妻子,他是不会察觉的;但假如要他完全失去其中的一样——不管是什么,妻子还是燕尾服,那么,他生活中的和谐就会被破坏。

古米廖夫非常喜欢照各种仪规习俗办事。他未必是个正式的教徒——说他是个迷信的人可能更合适。但他在每座教堂前都要"脱下帽子",总是准时领取圣餐和斋戒,遇到神甫时必定趋前接受祝福。

同样,他恪守绅士的风度、礼仪和贵族的传统。古米廖夫总是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对长者彬彬有礼,维护女士的声誉。

他是一位非常好客的主人,即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那些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也是如此。邀请某位朋友来吃饭,他会以老派的殷勤方式用亲手煎煮的拟鲤鱼和黑面粉做的通心粉招待他。如果来赴宴的是位女士,那他就穿上"自己的燕尾服",并且用法语与之交谈。

古米廖夫说过,年轻时,他把别人对自己诗歌的任何反应都看成是侮辱,即使再高的评价他也觉得不够充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会变得越来越谦逊,"他补充道,"现在,如果我读到'古米廖夫的诗作也不无才气'这样的评语时,我会带着感激之情这样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骂我,瞧,也有赞扬的。'"

当选彼得堡诗人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的是勃洛克。但协会很快发生了“宫廷政变”:古米廖夫坐上了勃洛克的交椅。比起“主席”这一有名无实的职位所要求的来,古米廖夫对待工作的态度可谓严肃、顶真。他召开会议,宣布不受莫斯科的领导,创建“诗人之家”,为杂志张罗奔走……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诗人联合会将变成世界性的组织,而在这之后——这是他固定的想法——将成为一个支配天下的诗人国际团体。

协会举办各种晚会,常常派会员坐火车出差去搞食品。手里有一枚带着魔力的“圆图章”是颇有好处的。

古米廖夫本人也利用这枚图章。他的家人住在特维尔省的别热茨克。在某次这样的旅行中,古米廖夫遇到原先自己田庄上的一个不知是马车夫还是花匠的人。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接着便交谈起来。突然,有人来检查。古米廖夫的那个花匠原来没票。那年头管得很严,倒霉的“逃票者”面临着一两个月“雪地苦役”的惩罚。古米廖夫为他说了话。

“请释放这位公民,”他十分威严地说道,“我替他担保,我是主席。”

“公民”被释放了。

古米廖夫说过,恋爱对诗人来说是职业需要。他时常涉足爱河,不加区别地坠入情网。他把这称作是寻找“可爱的女子”。不过,他还有个更为简单的说法:“打乌鸦、打山雀,最后会遇上一只雄鹰的。”古米廖夫的“猎艳名单”开出来的话会有几页之长。

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功非常自豪。“我并不漂亮,但我知道一个女士们无法抗拒其魅力的秘密。”“什么样的秘密?”“我借

助想象力来征服她们——给她们讲述战争的经历,朗读诗歌。在世界上她们最喜爱诗歌和功勋。另外,永远也不要惊慌失措或者表现得软弱无力。我说:'亲爱的,整首《篝火》都是为您写的。''但是,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篝火》发表时,我们还没认识呢!''亲爱的,这并不说明什么,那时,我已预感到您的存在……'

"而表现软弱、开枪自杀则是最糟糕的事情了。我曾割破自己的静脉,差点送命,而我当时爱上的 NN,对此只是一笑了之。"

古米廖夫去世后我在编辑他的诗集时,从女士们那儿得到不少他的手迹。这些诗稿的拥有者常常希望题献辞能够被保留下来。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例如,我分别从三位女士那儿得到三份《邀你同游》的手稿。它们是题献给不同的人的。在诗的中间部分有些小小的区别:

而您——您将手捧鲜花,
我则以嘎泽拉抒情诗相赠
我注视您的双眼如此忧郁,
仿佛芦笛在其中呜咽。
我再把远方的鸟儿赠送给您,
它比神秘的设拉子的玫瑰还要美丽,
让它在您黑色的波浪般的秀发上面轻盈飞舞。

或者是:

让它在您褐色的秀发上轻盈飞舞。

或者是:

让它在您棕红色卷曲的秀发上轻盈飞舞。

我还得到过一首由古米廖夫亲手抄写并临时做过修改的我写的诗。那是古米廖夫在去赴某人的约会而手头没有“合适”的诗歌时“借用”的。

去世前半年,古米廖夫对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失败者。”他还说过:“我多么羡慕墙上的砖啊——它们一块紧挨一块,排在一起。可我是如此孤独。”

这些可能会使许多人深感惊讶的话并不令我吃惊。古米廖夫确实十分孤独,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被冷淡的、含有敌意的不理解所包围。

……我怒气冲冲,就像细瓷玩具当中
一尊金属的神像。
……他记得长着卷发的头颅,
低俯在他的脚旁,
记得祭司庄严的祈祷,
和颤栗的森林。
他还带着苦楚的笑容
看到永远静止不动的秋千,
在那里,对着酥胸丰满的妇人
牧人正把芦笛吹响。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样一个理想:要让全世界“记起”他本人从未忘记过的“诗歌的神圣意义”。他一生都像是个

挥舞着鞭子的驯兽员，可野兽们冷淡地掉转头去，打着哈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的想法没有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最大的——最辉煌的——胜利就是他的死。

注释：

① 龙萨：(1524～1585)，法国诗人。

② 伯莱克(1728－1799)，苏格兰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

曼德尔施塔姆

一

整个晚上都下着鹅毛大雪,雪是如此之大,只要扫院子的人手中的铁铲停下一分钟,人行道上的雪就会积得很厚。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来到我家。他看上去像一头白熊,他向我要伏特加、白兰地、潘趣酒,说不然的话,就会立即感冒,送命。我尽己所能使他暖过身子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雪下得小了,空气变得清朗了——太阳出来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走在涅瓦大街上:我们计划先去大学,再从那儿去《北方》杂志编辑部。从兹纳缅斯基路到瓦西里耶夫岛的路并不短;但是天气突然变得那么好,我们无法抵制步行的诱惑。然而,这一诱惑带来的却是“厄运”。

喀山广场上挤满了人。有很多旗帜、画像,一边是“上帝,保佑沙皇”的呼喊声,另一边是哨声、“打倒”、“虐杀者”之类的口号声。这是因斯库台被攻克而举行示威游行的人群与思想危险分子在发生冲突。我们挤了进去,想看个究竟。人群挤着我们,后

来,只听组成人链的骑警喊到:"快散开,快散开,先生们!"我们便被挤到喀山路的对面……

几分钟后,我们已置身在一个狭小的、阴暗的院子里。一个警察局分局长嘴里骂骂咧咧地将我们排成两人一组。我们被抓了。

在院子里,我们被扣了不少时间,大概有半小时左右。当我们被带出去时,广场上的人群已经不见了。"漫射的风暴的最后几片乌云"——像我们这样被捕的一批人在军警的押解下沿着马厩胡同朝远处走去。我们也跟随其后。

我费了很大的劲来使曼德尔施塔姆恢复平静。他要求打电话,要纸笔写申诉,叫着喊着,说他认识琼科夫斯基,神情异常激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激动根本就无济于事——没人理睬他。应当听天由命,坐在那儿排队,等候警察署长的传唤。署长倒是个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的人。他请又再度开始解释、抗议的曼德尔施塔姆平静下来。"……小小的误会,我们这就来弄清楚……"他拿起铅笔:"先生们,你们的姓名、地址……"

当曼德尔施塔姆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职业"时,署长快活地笑了起来:"请问,您是那位名律师的儿子吗?"

曼德尔施塔姆竟然猛地欠起身来。他满脸通红:

"署长先生,向您保证……我甚至不认识……"

"不过,请原谅……"

"向您保证……我是商人的儿子,商人的儿子……"

"对不起,年轻人,您为什么这样焦躁不安?"署长感到惊奇,"您是位作家,我还想呢,是不是那位著名的……"

"不,不,商人的儿子。"

署长耸了耸肩,让我们签了字,于是我们就被释放了。

走出警察局之后,我问曼德尔施塔姆:"你为啥这么害怕?"

他看着我,对我的愚不可及,目光里充满了宽容的轻视。“怎么? 你不懂? 你不懂? 这是挑拨离间。”

我重复了那位和蔼的署长做过的动作:默默地耸了耸肩。

再要去大学的话为时已晚,而去《北方》编辑部则刚好。为了与人“分享”我们的奇遇,不去这个最令人愉快的编辑部,又能去哪儿呢?

宽敞的办公室火炉烧得正旺,铺着地毯,透过擦得锃亮的玻璃窗,能够看到停满在冰上过冬的平底船的涅瓦河、图奇科夫货栈、大桥。它们都被积雪覆盖,沐浴在冬天红色的落日余晖之中。

置身这间宽敞、温暖、光线舒适的办公室,心情是如此的宁静。戴着头饰的女佣为我们端来茶、饼干和白兰地。已经有些人等在这里了。主人,也就是编辑,还没来,在印刷厂耽搁了。这时,传来房门开启的吱吱声和拉动厚布帘幔的簌簌声:

边抽香烟边开玩笑,
走出了米哈依尔·洛津斯基。
带着严父慈母般的胸怀,
走出了米哈依尔·洛津斯基,
他用巨大的手
把杂志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爱抚……

现在没有多少人记得《北方》杂志,米哈依尔·洛津斯基的名字也只有在狭小的文学圈里为人知晓。所以,关于这两者的情况,我在这里写上几句。

1907 年在巴黎,一些刚刚起步的俄国诗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天狼星》的杂志。该杂志实力不强,有点像青年诗人协会现在

出的集子，诗人们的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有位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女诗人A·戈连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

在他的手上有多枚闪亮的戒指——
那是被他俘获的姑娘们温柔的芳心。
但在这只手上没有我的戒指，
我不会把它给予任何一个人。

这个名字——安娜·戈连科和刊登在《天狼星》上的诗作一起被世人遗忘了。在自己以后的作品上，女诗人写上的是自己的笔名：阿赫玛托娃。

年轻诗人们照例，以集资形式，开始出版这本杂志《天狼星》的成员每星期都在咖啡馆聚会一次，以便把新写好的作品读给大家听并就此交换意见。几乎没有人是不带着"最新鲜"的作品来赴会的。就连古米廖夫，这批人的常任评论家，也来不及把他想"评头论足"的东西都评说一遍。在所有的人当中，产量最高的是一位小伙子，他长着一张圆圆的、像女人一样的脸，外表极其普通，尽管他追求"优雅精致"，戴着领结，头发浓密、蓬松……他每周起码带来两个短篇和一大叠诗稿。在这个圈子里，他被认为是个缺乏天分的失败者，众人批评起他来毫不留情。但他从不气馁，继续带来新作，而别人则更猛烈地予以抨击。这位执著的年轻人名叫阿·尼·托尔斯泰伯爵。

后来这批年轻人离开了巴黎，咖啡馆里的聚会随之结束，《天狼星》也停刊了。但是，众人对它的印象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杂志的部分编委试图将它在彼得堡恢复出版。第一个尝试是由原编辑部人员出版《天狼星》的翻版——《岛》，但它很快就自行停刊了。于是，古米廖夫想出一个主意：不是恢复旧杂志，而是

创办一份新杂志:既充满新的精神,又有新的编委,同时还具备这样的性质,即诗人自己是主人并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北方》是份月刊,每期都是32页。杂志印得很规整,但出版的日期却极不准时:8月那期1月出版,1月那期要到7月面世。有人对洛津斯基说:"听着,你们的《北方》误期太厉害了,订户面前难以交待。"洛津斯基皱起眉头:"的确如此,您说得对,不好意思……"他脸上的表情又即刻开朗起来:"没关系,我对他们说……"

我再重复一遍,《北方》编辑部是所有编辑部当中最令人愉快的一个,甚至那些其作品被"遗憾地"退回的诗人也未必会一直感到委屈,因为洛津斯基处理这类事情时是那样的委婉、温文尔雅,不会令对方觉得丝毫的难堪。当然,也有一些忘恩负义的人。例如,有个遭退稿的诗人将自己的帽子与洛津斯基的对换了一下。不用说,洛津斯基失去了自己那顶高级的海狗皮帽,得到的是一顶破旧的猫皮帽,戴上之后(至少,洛津斯基发誓这样说),他的耳朵里即刻就会传进可怕的韵脚发出的杂音和一连串不带停顿的六音步的诗句。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使洛津斯基在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出现任何瑕疵。对于他诗中所表达的精神可以争论,对于他诗歌的高昂、抽象的华美,有人可能不喜欢,甚至感到愤怒。但洛津斯基不同寻常的才华是文坛中的罕见现象。只要将他的译作与这样一些公认的高水准的译作——如勃留索夫或者维雅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的译作——比较一下,就能证明这一点。与洛津斯基的译作放在一起比较,后者不过是幼儿的咿呀学语和毫无价值的随意添加而已。我确信,洛津斯基的作品早晚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如同他本人会得到应有的评价一样:他是一个相当细致、聪敏、出色的人,一直身居诗坛"精英人物"的中心,同时又总

是有意识地不引人注目。

洛津斯基是位颇具魅力的主人。如果聚集在他办公室里的客人们——同仁或者“订户”——情绪活跃、谈天说地因而无需照应的话，你就不易看到洛津斯基的身影：他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正与某人低声交谈着。而当客人们缄口不语，出现冷场或者情形尴尬的时候，他会立刻极其自然地把握住话头，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俏皮，进而打消众人的尴尬，使低落的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当阿赫玛托娃想强调某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时，她总是说：“这等于是说洛津斯基做了件不体面的事情。”古米廖夫认为，假如要向火星上的居民展现地球人的样板的话，那就会选洛津斯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于是，我们决定直接去《北方》编辑部。我们朝电车站走去。在经历了被捕和“离间”之后，曼德尔施塔姆已经平静了下来，口占了一首简单的即兴诗，朗读时，笑得喘不过气来，以至我都听不懂他在读些什么：

不要沮丧，
请坐进电车，
它是这样的空敞，
这辆8路电车……

突然，一个声音使我们停住了脚步。声音很轻，但很威严，不同寻常。

“先生们，请问《阿波罗》杂志社在哪里？”

问这话的是名男子，一名头戴便帽、脚穿毡靴、身着短皮袄

的普通男子。他背对着路灯,因此几乎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听到这一轻轻的、奇怪的声音,感受到那双刹那间闪烁出光亮的专注的眼睛。

"拉兹耶扎雅路26号,"我俩一起回答。那男子道谢之后继续朝前走去。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非常暗,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呆立在那里,弄不明白:这是不是我们的幻觉?不,不是幻觉。这不,远处还隐约可见那顶便帽。现在,那人正消失在大街的拐角后面……

这个脚穿毡靴、头戴便帽的人为什么要去《阿波罗》杂志社呢?还有,更奇怪的是,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回答得出他的问题呢?他不可能认识我们。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不,他是面对我们走来的,因此,不可能听到什么。另外,我们刚才尽是在闲扯,说的都是"空敞的8路电车"之类不着边际的话。

听完我们的叙述,古米廖夫怀疑地摇了摇头:"这是你们进过警察局之后因恐惧而产生的幻觉。"而颇为实际的艾亨鲍姆认为,这是某个看门人或者锅炉工去《阿波罗》应聘找工作,忘了地址,于是便问一下:或许,迎面走来的先生们知道。我们轻蔑地看了一眼艾亨鲍姆:没有想象力,怪不得只能是个批评家。

我们自己那展开了翅膀的想象力告诉我们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正巧不久之前,有人在传说:在彼得堡看见了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

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对现在年轻的"战后"一代人已不意味着什么了。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但是这个神秘的、半神话般的人物好像至今还活着。据说,他在俄国某地漫游——从乌拉尔到高加索,从阿斯特拉罕到彼得堡——他以一个穿皮袄、拄拐杖的男子形象出现,就像我们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彼

得堡大街上看到或者在我们的幻觉里感受到的那样。——“先生们，请问：《阿波罗》杂志社在哪里？”

其实，即使是老一辈的人，甚至那些认识他的人，曾经是或者曾被称作是他朋友的人，对他也知之甚少，也就是说，对那个戴着便帽、拄着拐杖，很早——从 20 年代初开始就在俄罗斯某地不知为什么进行漫游的亚历山大·杜勃罗留波夫知之甚少。他们了解的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他，不知何故，中断了这种生活，他就这样拄着拐杖，脱离了这种生活，义无反顾，随心所欲地开始漫游，割断了同一切的关系……

奇怪的，不同寻常的生活——有的方面带着诗人的特点，有的方面使人想起阿廖沙·卡拉玛佐夫，还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有的方面”在这个人身上神秘地交织在一起，人们都说，他的魅力令人倾倒。他出身于一个极有教养的家庭，写过诗歌，好像，很娇惯，很文雅；好像，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还被别人叫作假绅士。他的诗歌被郑重地赞誉为天才之作——这一评论我是从那些真正了解这些诗歌的人那儿听说的，而他们也了解杜勃罗留波夫本人，因此，我觉得，杜氏魅力的秘密就在于此。不认识他的人，包括我在内，是不能从这些平淡的、无形体的、好像是非人间的、来自“第四度量”的诗行中感受到这种魅力的。顺便一提的是，杜勃罗留波夫集子的名称是《来自一本看不见的书》。谁知道呢，或许，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看不见的——而对需要的人来说是看得见的，当时辰来临之际，这个需要的人就会“显现”。或许，真的是天才之作，只是缺少一把理解它的钥匙。暂时地？永远地？谁知道呢——诗歌是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事物。顺便一提的是，勃洛克也认为杜勃罗留波夫的诗是天才之作。

从晦暗的雾色中
走出一个有病的孩童。

这是题献给杜勃罗留波夫的。还有普希金对他的题词:"A·M·Д·以自己的鲜血……"——这有双重含义:可怜的骑士——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先生们,《阿波罗》编辑部现在在哪里?……

但这未必是杜勃罗留波夫。彼得堡的《阿波罗》——为什么它会为"可怜的骑士"所需要呢?骑士早就永远地、彻底地与自古以来地球上存在过的形形色色的《阿波罗》断绝了关系。这未必是他。但……

在巴黎文学青年的一次聚会上,我听到有人这样指责我:"您为什么要歪曲曼德尔施塔姆这位我们所热爱的诗人的形象?为什么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他描写成一个可笑的怪人?难道他会是这样的人吗?"

他正是这样一个人。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要替他杜撰一些可笑的事情呢?他本人,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在自身周围"撒满"了古怪、离奇的笑料……在这方面,他并不比卓别林逊色,而同时,在举手投足当中,又依然是个"天使"、孩子、"最纯粹形态"的"天生的诗人"。

我为曼德尔施塔姆深感高兴:身居巴黎的年轻诗人们热爱他,同时更为诗人们感到高兴:他们中许多人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爱比起他们自己的创作来更使他们接近诗的境界。而我本人,自然也是特别喜爱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的,此外,就我而言,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同样热爱并很早就熟悉他本人——这个

有点古怪、可笑、与其诗作密不可分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不分彼此，以至于拥有一张共同的名片(或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张)：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和奥·曼德尔施塔姆。当然，印制这种名片的主意是曼德尔施塔姆想出来的，当然，也只有他会想出这样的主意。

难道我们的“年轻诗人们”没有听说过：崇高的和可笑的、最崇高的和最可笑的常常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于难以弄清：哪里是前者的开始，哪里又是后者的结束？我从那位“怪人”、“天使”、“可笑的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生活中举一个直观的例子。

在《Tristia》(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中有一首描写克里米亚的诗，读过《Tristia》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是曼德尔施塔姆最好的诗作之一，是俄罗斯最好的诗歌作品之一：

……那里，面对黑色的、苍凉的海洋
是俄罗斯大地的边缘。
……那么快你就变得肤色黝黑
你走到不幸的救世主跟前——
不停地亲吻着圣像，
而在莫斯科你却是那样矜持。
属于我们的只有一个名字，
幸福的声音和短暂的时光，
请接收
我用双手撒下的沙粒。

这首诗写于克里米亚，出自一位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的诗人之手。如果曼德尔施塔姆的崇拜者们根据诗中的细节(克里米

亚、大海、爱情、诗歌)想象出的画面够得上画家艾伊瓦佐夫斯基的杰作的话(顺便说一句,艾伊瓦佐夫斯基的确有这样一幅作品、极其糟糕的作品:《普希金告别大海》),那么,他们就错了。

曼德尔施塔姆当时住在科克杰别尔。由于他不付公寓的房租,也不愿搬走(主人要求他要么走人、要么付钱),所以,人们对他采取了特别的惩戒措施——这种折磨方式只有在这"克里米亚的如诗如画的角落"里才能办得到——不向他提供水。在科克杰别尔,水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并装在桶里出售的。那里既没有河,也没有井。曼德尔施塔姆想方设法,计谋、威胁并用,好不容易地从严厉的主人和泼妇般的女佣那儿搞到一长颈玻璃瓶的水:一拿到手,他自然一饮而尽,于是,新一轮的苦难又开始了……给他吃的是残羹剩饭。当有客人要来科克杰别尔度周末时,曼德尔施塔姆就被迫搬出自己的房间。他只得在贮藏室过夜。有一天晚上,他就这样得了感冒。牙龈肿得怕人。他涂上碘酒,身裹毛毯,走来走去。当地的孩子在一旁起哄,而"如诗如画的一角"的其他居民则笑着望着他。顺便一提的是,特别拿他开心的是那个"她":曼德尔施塔姆就是建议她"接受""我用双手撒下的沙粒"作为永恒爱情的信物的。她是个相当漂亮的、但有些庸俗的黑发女子,职业是医生,她未必会倾心于这样的礼物:带她来科克杰别尔的是她的供养人,一个肥胖的、喜欢谄媚的、皮肤黑黑的亚美尼亚商人。他把女医生带到这里,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除了曼德尔施塔姆以外,再没别人令他吃醋……

被牙龈脓肿所折磨、满腹委屈又饥肠辘辘的曼德尔施塔姆走出屋子,尽量避开主人或者凶恶的女佣的视线。他头发蓬松,光脚穿着凉鞋,朝岸边走去,迎面过来的男孩子朝他噗噗地笑,扮着怪样。他来到售货亭,一个犹太老妇人在那儿卖火柴、烟

卷、圆面包、牛奶等物品。在科克杰别尔，这个老妇人是唯一一个同情曼德尔施塔姆的人(或许，他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孙子：叫杨凯尔或者奥西普的小伙子)，出于真诚的善意，她向曼德尔施塔姆"提供贷款"，同意他每天早晨拿一只面包和一杯牛奶，供他"读书时"食用。她当然知道，她以后一个戈比也收不回来，不过，她想，应该帮助年轻人，他是这样的可爱，可能身子还有病，上星期一直在咳嗽，而现在又患牙龈脓肿。有时，曼德尔施塔姆从她那儿还会得到一包二等烟卷、火柴、邮票。如果他得寸进尺，心不在焉地再要想拿价格更贵的东西——比如，一包饼干或者长方形的巧克力糖时，善良的老妇人便礼貌地推开他的手，难过地但又坚决地说道："请原谅，曼德尔施塔姆先生，这您可消受不起。"

于是，他立即像受到了侮辱似地涨红了脸，耸耸肩，转过身快步地离去。老妇人忧伤地望着他的背影——或许，她的孙子也是这样的高傲、这样的贫穷，上帝明鉴，她并不想使年轻人感到委屈……

曼德尔施塔姆沿着海岸走着。路面被太阳晒焦了，科克杰别尔整日不停的、令人心烦的风又吹走了路上的所有尘土。曼德尔施塔姆感到不满，腹中空空，他高傲、可笑，他无望地爱上了一位女医生，而这个亚美尼亚人的女友此刻正坐在自家的凉台上，身穿高级的粉红色连衣裙，喝着可口浓醇的咖啡，吃着热的自制的圆面包，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他走着，高傲地仰起细细脖颈上那颗硕大的、并不漂亮的脑袋，嘴里嘟囔着，边走边构思出色的"天使般"的诗歌：

在那里，面对黑色的异邦的海洋
是俄罗斯大地的边缘……

科克杰别尔的小男孩们在他走过时冲着他的背影叫喊:“先生,表掉了。”当他恼怒地转过身时,男孩们便跑散开去,边跑还边做怪样。

二

我们将再次聚会在彼得堡,
仿佛我们把太阳在那里埋藏……

1920年。大雪。寒冷。没有路灯。我们又同行在图契科夫滨河街上,走过那幢曾经作过好客的《北方》杂志编辑部的房子。

走过那些楼房,
当年,我们曾在那里
跳舞、饮酒。

曼德尔施塔姆刚刚抵达苏维埃的彼得堡,我正带着他——这个没有居所、冷得发抖的人——到我家去过夜。有两年的时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他去过克里米亚,从那儿被派往格鲁吉亚,而在格鲁吉亚差点被绞死。后来又做了一次难以想象的、只有曼德尔施塔姆才会做的穿越俄罗斯的旅行。于是,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我居室后门的门铃响了:“谁?”门外传来喘气、跺脚的声音,就好像有一条从水里上岸的狗正在那儿抖去身上的水……

“谁?”

"是我。"

"'我'是谁?"

"我是……曼德尔施塔姆……"

当然,他是穿着夏装来的(那丝绸翻领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感觉特别单薄寒酸)。当然,身无分文,感冒,打喷嚏,咳嗽,不知所措。等他在新环境中缓过神来之后,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自己弄一张"居住证"。

"这事你明天才来得及办。"

"不,不,今天就办。不然,我会急得睡不着觉的。我们现在就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或者类似的机构。"

"但你首先得为自己搞到一张身份证。"

"我有,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破旧的纸头:"瞧,俄罗斯南部武装力量指挥官……兹证明……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有权在防御加强之地区居住……X将军……Y上尉……"[1]

"你想带这份东西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天真的心不在焉的微笑。

"怎么,难道这张纸不管用?"

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女作是1910年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的。这篇作品已显现出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的全部妙处——一种朦胧的、同时又是具有穿透感的魅力。他的诗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表示赞赏,而布列宁则加以嘲笑。很快,诗歌的作者开始出现在彼得堡的文学"沙龙"里——他刚从国外回来,曾求学于巴黎。

他的外表很奇特,引人注目:外套样式时髦但邋里邋遢,留

着络腮胡子,谢顶,只在脑袋两边有一些鬈曲的稀疏的头发,典型的犹太人的脸——一双相当奇特的眼睛:闭上眼睛——他像一个药房里的学徒,睁开眼睛——他就是位天使。

然而,他在相貌上的某些方面又有点像普希金,不光是络腮胡子。后来,许多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但最早指出他俩相像的是我的女佣老太太。就像所有的女佣、他朋友的亲属、看门人——以及类似的与诗歌创作无缘、但又不得不与曼德尔施塔姆打交道的人一样,我的这位女佣不喜欢曼德尔施塔姆。原因是他乱扔烟头、深夜来访、穿脏雨鞋、在不适宜的时候要茶和夹肉面包等等。

有一天(当时,曼德尔施塔姆刚好出门旅行去了)我带回来一幅普希金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写字台对面的墙上。老太太看到后,责备地摇摇头说:"瞧您,老爷,看来没有曼德尔施塔姆不行。他三天不来,您就把他的像给挂起来了!"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很少有人理解这些被阿赫玛托娃称为"奇迹"的诗作的价值。而他呢,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才华横溢",并带着孩子般的率直毫不掩饰这种感觉,长时间地忍受着别人的漠视。

曼德尔施塔姆对索洛古勃的评价极高。孩童时代,他就能背诵出索洛古勃的全部诗篇。他从国外给索洛古勃写过热情洋溢的信,寄过自己的诗歌作品,但没有收到回复——没关系,或许,信遗失了。

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彼得堡并在《阿波罗》上发表作品之后,决定给索洛古勃打个电话。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可以请费多尔·库兹米奇听电话吗?"

"是我。"

"我是曼德尔施塔姆。"

沉默。

“我想去拜访您，费多尔·库兹米奇。”

“什么事？”

“给您读一下我写的诗。”

“我已经读过了。”

“那我想聆听您的高见。”

“对它们我没什么想法……”

1916年的某一天，我去看望勃留索夫。在他书房的写字台上有两叠新出版的诗集。一叠低，一叠高。勃留索夫解释说：“关于这些诗歌，也就是低的那叠，我将在《俄罗斯思想》上写点文章。其它的则不值得动笔评价。”

在归入“其它”的那叠里有刚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的《石头》。

“怎么？关于《石头》您也不写点什么吗？”

蔑视的动作。“不值得——模仿者而已。”勃留索夫读道：

从卡皮托利山的顶端
告别光荣罗马的时候，
你在雄伟庄严之中，
看到它血腥星辰的余晖。

“全部的曼德尔施塔姆便来自于此。当然，他所有的以罗马为主题的诗作都抵不上其中的任何一行。”

“就算是这样。那其它作品呢？难道没有一首‘打动’您吗？”

“一首也没有！”

“……他仇视曼德尔施塔姆，”在听我叙述这段谈话的时候，

阿赫玛托娃这样说道,"之所以仇视,是因为曼德尔施塔姆是位天使,而他自己只是个作家而已!"

曼德尔施塔姆朗读诗歌的奇怪方式也是他遭受委屈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来说是极其适合的。他"唱"诗,但不像大多数诗人那样恰如其分地、适度地"唱",而是用足力气,像鸟鸣一样,拖长词句,把声音时而压低、时而提高。同时,他还跺脚、用手打拍子,摇晃全身。那些对诗人们一般的"唱法"都感到好奇的听众,曼德尔施塔姆的朗读,再加上他那独特的外表,在他们看来,就更是奇异无比了。听 X 或者 Y 的朗诵,他们只是面带微笑,而一旦曼德尔施塔姆出场,他们则开始哄堂大笑。

一次,曼德尔施塔姆在杰尼舍夫大厅朗读他刚写好的惊人的诗作《拉辛的经念活动我迟到了》。那天到场的听众特别蠢。曼德尔施塔姆读着诗。诗歌很长。台下的嘲笑、私语声越来越响。

> ……烧成灰烬的海报又在簌簌作响
> 淡淡地弥漫着桔皮的清香……

"猪!"曼德尔施塔姆中断朗读,突然朝听众大喝一声,然后奔进了后台。

我尽力安慰他——但他很难平静下来。"猪,猪!"他反复说道。从大厅里传来笑声、喊声、鼓掌声。到最后,曼德尔施塔姆含着眼泪笑了。这是些什么人啊!

> 让我们离开吧,
> 趁着像豺狼一般的读者

还没过来
折磨缪斯的时候……

我用他的腔调，用他没读完的作品中的诗句这样对他说道。

从格鲁吉亚回来以后，曼德尔施塔姆在彼得堡住了没有多少时间，大概半年左右吧。莫斯科喧闹的生活使他觉得那儿是个自由的世界，而在彼得堡，他感到窒息……“如果在这里你感到窒息，在那儿你则会送命的。”告别时，古米廖夫冷淡地对他这样说。他的离去，意味着关系的断绝，曼德尔施塔姆也好，他的彼得堡朋友也好，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不会的！”“会的！”古米廖夫坚决地重复道。

当时我觉得，古米廖夫的话并无道理。要知道，这样的诗人的这样的声音是不会因为身陷莫斯科苏维埃文学生活的泥潭——意象派、全俄诗人协会、国家出版社——而消亡的。“小羊遛达一会儿就会回家。”还有，谁知道呢，这个炼狱甚至对他有好处。

1922年，我因转车在莫斯科停留了几个小时。我找到了曼德尔施塔姆。他还是那样。只是外表看起来有点惘然若失的样子。“我在莫斯科挺好。不过，你能为我在彼得堡推荐一份什么事情做吗？”这是他见面后最先说的话当中的一句。“很高兴你挺好的。我没什么可推荐给你的。”“不，你说说呟！”他坚持着，“有可能在彼得堡找到一个位置吗？”

他显然想脱离莫斯科的“好生活”“回家”。我建议他留在莫斯科——这里毕竟有某种生活。而在彼得堡，尽是些代价昂贵的坟墓。

我们谈起了诗歌。曼德尔施塔姆像以前一样，满脑子的计

划和希望。“不,你读两首这段日子写的诗吧。”他不好意思地承认:什么也没写。

现在他又写诗了。渐渐地,在一些苏联报纸上,在许多闻所未闻的名字中间,在很靠后的地方,有他的名字出现。在这样的诗歌下面读到他的名字真令人难过:

我的姑妈曾是那样的富裕。
豪宅里摆满瓷器和银盘,
还有装饰品和红木家具,
路德维克式、罗可可式——
林林总总,说也说不完。
在各式各样的物品中间,
有一尊贝多芬石膏胸像
　　放在古铜色钢琴上面。
在姑妈的家里
　　胸像的地位至高无上。
一天,我有幸去将姑妈拜访,
高傲固直的老妇人
在贝多芬像前低声说道:
“瞧,亲爱的,马拉的胸像,米拉保的佳作!”
“瞧您说的,好姑妈,这不可能!”
但无情的年龄已使她对匡谬显得漠然。
“瞧,”她说,“著名的马拉胸像,
如果我还记得起,那是米拉保的佳作。”
可读者啊,请相信,这绝不可能!

各位,这很令人伤心,不是吗?

注释：

① 这是白区发放的证明。

福法诺夫

福法诺夫的诗集中附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穿着常礼服,人很瘦,留着长发;双手优雅地放在膝盖上,头"充满诗意"地向上仰起……

我记忆中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我差点就要这样写了。假如这样写的话,那自然是不确切的。福法诺夫曾经是这个样子……那是在我出世之前十年的时候。而同时,我记忆中的他也的确是这个样子。

1910年,在福法诺夫去世前一年,我们很偶然地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一家三流饭馆的小桌旁,坐着两个福法诺夫。年长的那个,皮肤松弛(他只有48岁,但看上去完全像个老人),很长时间没刮过胡子,一双小眼睛,黯然无神,缺乏表情;旁边坐的那位,穿着常礼服、瘦瘦的、大眼睛,头"充满诗意"地向上仰起……活脱就是我上面描写的那张照片上的人物的再现……

他们两个——父亲也好,儿子也好,都喝醉了。两人挥舞着双手,争先恐后地读着诗歌。他们两人写的诗,尽管表面看来并不相像(小福法诺夫是个未来派,父子俩就诗歌中的"新旧"流派问题进行着无休止的、没有结果的争论),但有些还是相同的。

一组像五戈比硬币一样无甚特色、尽人皆知的词或者毫无意义的词的粗糙组合。但有时,从中会传出某种天籁之声。

“他们扼杀了我。”“因为他们我才喝酒,因为他们我将死在围墙底下。”“他们对我的书不置一词。”“他们从我这儿窃取诗歌的韵、格,一切的一切……”他们……他们……他们……只要跟福法诺夫一起坐上十五分钟,就会听到他没完没了地这样说“他们”、“他们”、“他们”。从与人认识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开始,同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当铺的估价员(他把妻子的奥伦堡围巾送到那儿抵当),还是小酒馆里的伙计,或者是有轨马车上的邻座——福法诺夫总要提起“他们”,言辞里充满了抱怨、诅咒和威胁,当然,还有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下流、俏皮字眼。福法诺夫还边说边做着幅度很大的手势。同时,他在提到“他们”时,不做任何的解释,好像是在谈论一些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人物。假如有人仍然问一句:这“他们”是谁?他的回答很简单:“他们?那帮做瓶塞的人……”

做瓶塞的人——指的是象征派成员。他仇视象征派。而之所以称他们是“做瓶塞的人”,因为他们当中——在福法诺夫看来——的骨干,也是最为福法诺夫所敌视的一个——瓦列利·勃留索夫,有或者曾经有过一家制造瓶塞的工厂。因为这家厂的缘故,布列宁按自己的习惯,随便而又粗鲁地嘲笑过勃留索夫。由此,这家厂便在福法诺夫那由于艰辛的生活和伏特加酒而变得糊涂的脑子里落下了根。有时,他还用“丹特士们”来代替“做瓶塞的人”。“他们”——象征派成员——是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装腔作势”和“紫色的脚”之类的玩意儿损毁了普希金的事业,这是其一。其二,“他们”对他、福法诺夫——普希金直接的、合法的、唯一的继承者“下毒”、“不置一词”、“剽

窃";"他们"这样对他,因为他是继承者……

"你——丹特士!"福法诺夫出人意料地朝坐在身边的儿子——自己"年轻时的肖像"扑去。"什么?新艺术?未来主义?吹牛,兔崽子!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有永恒的、芬芳的……"他庄重地举起一只手,声音颤抖,双眼满含泪水,"……神圣的诗歌,还有……"接下去是一句难听的粗话。"你快来吻一下!"他在常礼服的口袋里翻找着……"吻吧!"他声音响得整个饭厅都能听到。他把一张沾着油污的印有普希金肖像的明信片戳到儿子的面前:"吻吧,不然我就杀了你!……"

儿子——他那幅活的"年轻时的肖像"甩了一下诗人的浓密蓬松的头发,头昂得更高。他冷漠地推开明信片和父亲舞动着的拳头,用理智的语调说道:"快住手,老爷子,您的普希金是个鄙俗的人;而您自己,是只大理石苍蝇。"

福法诺夫当时住在加契纳,住在这座偏僻小城的边缘地区。要找到福法诺夫,得踏着齐膝的积雪、穿过院落、再经过一个狭窄、昏暗的房间——那儿挂满马的挽具、夹板,散发着皮革和马匹的味道。最后,便看到一扇砖红色的小门,从门后传来金丝雀吱吱喳喳刺耳的叫声。

到福法诺夫那儿可以想去就去,想带谁就带谁。他不会对别人的贸然造访感到惊讶,见到陌生人登门也不会疑惑不解。相反,不管谁什么时候去,他都感到很高兴,他请客人坐下,让厨娘生起茶炊,拿来香烟,还亲自跑到小铺子去赊账买食品。

福法诺夫天性好客。另外,在世界上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难受无比。像这样,和你们或者其他人坐在一起的话,就没什么,呼吸轻松自在。但要是一个人留下来,那种感觉……就会出现。真可恶,就像血液……血液在抵

抗，涌向大脑、涌向耳朵，眼瞧着血管就要崩裂，血液就会喷涌出来。没有体验过吗？非常难受的感觉。不过，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和别人在一起时，从没有过，从来没有……好，为你们的健康干杯！”

独自一人时，福法诺夫便会感觉到大气的压力。

这一切开始于三年前。他在日历上或者杂志的《杂俎栏》上看到一则他以前闻所未闻的资料，说空气也有重量。这一说法，尤其是那些巨大的数字，使他目瞪口呆。他搞到了一本介绍这方面知识的小册子，仔细地通读了一遍。有好几天的时间，他寡言少语，若有所思，此后，“那种感觉”便开始出现了。

“血液，血液——在做抵抗，涌向……”

福法诺夫被带去看医生。医生们检查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为他做了治疗。他甚至还由M·A·苏沃林出资前往疗养胜地加戈雷，为《新时代》杂志撰稿。为什么偏偏要去加戈雷，我不清楚，只知道福法诺夫在那里很寂寞。一开始，他像向医生保证的那样忍着，到后来忍不住了，就又照自己的习惯喝起酒来。在加戈雷，他有一次喝醉酒，差点把某个助祭打死。

他害怕孤独。但事实上，他没什么可怕的。他独自一人的机会很少。六个孩子、妻子、他自己，还不算猫、狗和数不清的金丝雀。除了这些——这么说吧，“固定居民”以外，他的家里经常宾客满堂。

客人是各式各样的：邻区的警察局长，马路对面拐角处啤酒店的店主，某个干瘦的老头，以前的公爵和副省长——几年强制劳动队的生活已使他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尊严；胖墩墩的面包铺女老板——诗歌的崇拜者，她向福法诺夫免费提供面包；一些大学生，还有一些衣衫褴褛简直就像叫化子般的人……来的还有作家朋友，老派诗人。有时，一个认真、文静的老头从巴甫洛夫

斯克来访。他是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夫。一个与福法诺夫在各方面截然不同的人:不喝酒、不抽烟、视粗言秽语如瘟疫。他俩只有一点相同:仇视“丹特士们”。阿法纳西耶夫目光忧郁,聪慧,彬彬有礼,完全秃了的脑袋被仔细地用……中国的黑墨汁修饰过。

登门访问的还有一个叫“彼得·希雷奇”的人。姓什么我记不得了。也是“往昔辉煌时代”的诗友。“一位天才,”福法诺夫是这么评价他的,“他朗读的水平是那么的高超——您听听吧。”这的确是个罕见的朗诵家。他朗读时,声音震耳,做着手势,瞪大双眼、晃动着狮鬣般的长发。同时,他清浊辅音不分。“她像只蝴蝶一样在人群之上飞翔”——福法诺夫的这句诗在这位杰出的朗诵家的口中变成了“她像一个老妇一样在人群之上撒着盐巴……”

来访的还有小福法诺夫(他也是诗人)的朋友,三流的未来派成员。他们就新老流派的争论有时激烈到出拳对打的程度。但相互间没有恶意,因此总是极快地平静下来,和好如初。原因在于,这些未来派成员,尽管要把“一切现存的东西”推翻,但是,他们从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刻起,就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受到侮辱和委屈。谁是罪魁祸首呢?就是那些“丹特士们”,“造瓶塞的人”——那些进过大学,现在又把持着出版社、杂志,不让他们发表作品的人。

“轻点!”福法诺夫突然打断正在进行的争论或者某人的朗读,“轻点。我(真该听一听,他有时是多么自豪地说出这个‘我’字)来朗诵一段。”

你是明亮的天空,
我是黑暗的海洋。你回头望一眼:

我把你的光芒,如死尸一般,
埋葬在潮湿的坟墓中。

他读得很出色,沉稳而清晰。嗓音有些颤抖,但很响亮。从福法诺夫朗读的诗歌当中,甚至是一些不太成功的诗作当中,总有“某种东西”弥散开来。某种庄严、壮丽尽管没有到得具体的表现,但是却在字里行间洋溢。他读了很长时间,非常投入。是身为未来派成员的儿子的一句话把他从陶醉状态中拉了回来。

“老爷子,真的,您是只大理石苍蝇。”

福法诺夫停止了朗读,痛苦地望着儿子,仿佛不明白,儿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随后,他疲惫地挥了挥手,什么也没说,疲惫地拿起酒瓶……

福法诺夫写过:

我自己也想进入坟墓,
并不为自己的斗争感到高兴,
我踯躅而行,竭尽全力
勉勉强强,又不合时宜。

这一主题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歌当中:“累了”,“再也不行了”,“想进入坟墓”。在交谈中,他也经常重复这些话:累了,不行了。

临终前,求生的愿望、与已经向他开启了的坟墓作顽强抵抗的愿望,以奇特的力量在他身上复苏了。“我不想、不想、不想死!”他不停地重复着,就像在念咒语一样。他就是说着“我不想死”离开人世的。弥留之际,在他的幻觉中出现了长着爪子和尾巴的勃留索夫。他从床上跃起,要与之搏斗。三个人好不容易

才按住他。临死前,他力气大得惊人:他把厚厚的麻布被单撕碎,将铁床的角也弄弯了。

福法诺夫是在 1911 年 5 月下葬的。跟在棺材后面为他送行的有各式各样的人。不过,人数并不多。有几位不太出名的文学家,有加契纳的一些长舌妇,还有那个警察局长和啤酒店老板。但是,许多人都流了眼泪。走在棺材后面的还有他那难看的、有心理疾病的妻子。她戴着雪青色头巾,脸上的粉和胭脂涂抹得很厚。这就是福法诺夫所称的“我的妻子,莉季娅”。他终生热爱她,而她则在很大程度上毁了他的生活。福法诺夫早期的一本书,也是他最好的一本书《幻想》便是题献给她的。

当棺材被放入墓穴之后,福法诺夫的儿子,那位长得和年轻时的父亲一模一样的未来派诗人,走上前来,准备致临葬悼词。他沉默了一会儿,手在额上抹了一下,昂起头,用泪水模糊的蓝眼睛看了一遍众人,平静地说道:“我们的福法入土了……”说到这里,他哭了起来。有人上去搀扶他离开。那天,他醉得很厉害。他试图摆脱别人的搀扶,嘴里喊着“大理石苍蝇”一类的话……

亚历山大·吉尼亚科夫

一个5月之夜，我从某处返回位于彼得堡市区的住所。大桥正好开启了，“渡船”——只要两戈比就能把你摆渡到对岸的“芬兰航运”——小轮船，好像也故意作对似地刚刚开走。就是说，现在得等上半个小时，或者步行绕过特洛伊兹基岛。不，等起来很乏味，绕道又太远。身旁驶来一辆马车。年轻的车夫见我孑然无援的样子，便提出由他送我到亚历山大大街，代价是付给他一卢布廿戈比。这个价格贵得近乎荒唐。我说付六个十戈比银币。车夫带着鄙夷的表情，用鞭子抽了一下马，走了。于是，我又是独自一人留在开启的大桥前，留在“白夜的光华和寂静之中”。白夜的景致自然漂亮，而这天晚上又特别美丽。可我朝周围的海军总部大厦、涅瓦河以及朦胧的粉红色天空望去时，感觉中几乎带着厌恶。绕道走——我决定了。或许，会遇到马车。刚才，我为什么不给那强盗车夫一个卢布呢？那样的话，我现在就已经到家了……

但是，绕道也没走成。刚走几步，我看到了灯光，听到说话声和碰杯声。“水上饭店”——好幻想的酒徒们所钟爱的地方——还没有关门。那差点付给贪婪的车夫的一卢布钱找到了更

合理使用的所在。

……饭馆里客人不多,有十到十二个,但从他们无神的目光、发红的脸和歪向一边的领带来看,他们都是些有派头的人,在这里坐了不少时间,喝了许多酒,而且还要再喝下去。有六个人聚在一起,坐在角落里,可以听到从那儿传过来的傻呵呵的笑声和粗俗玩笑的片言只语。其余的人,都单独坐着,神情忧郁。谁的桌底下空啤酒瓶越多,谁的表情就越忧郁。众所周知,因饮啤酒而醉,那种醉是庄严而又忧郁的。“Bière gaie”(快乐的啤酒)是没有的,啤酒总是“triste”(忧郁的)。

一个长得像村妇一样的伙计,过来问我要点什么。令他吃惊的是,我想“要”纳尔赞矿泉水和火腿。他从小卖部给我端来一块鲑鱼,嘟哝着说:“牛肉全卖完了。”于是我不得不放弃自己那标新立异的想法,像别人一样,点了啤酒。就着矿泉水吃鲑鱼——这样的搭配好像是怪了一点……

我坐在那儿,一边不时地喝上一口暖暖的加里金啤酒,一边“观察着”。但是,可观察的东西少得很:眼前的一切没什么变化。坐在屋角那一小群快乐的人的打嗝声和噗噗笑声逐渐地变轻了,他们因为喝多了而有点无精打采。其余的人默默地坐着,神情忧郁。偶尔,有人迟疑地、低声地要伙计再添点什么。时而从这儿,时而从那儿传来阵阵鼾声……河水重重地、低沉地拍打着船舷(“水上饭店”就是开设在这艘船上的),这是特别的“半夜拍水声”。天已经亮了。我等待的那艘“渡船”,咝咝地吐着气,拉着声音微弱的汽笛,停靠上了旁边的码头。我喊伙计过来,准备结帐离开。但……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顾客。他的外表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个头不高,留着长发,宽肩,大衣很长,一直拖到地上,显然是别人的。当初,这件大衣想必是棕色的,款式华美。而现如

今,接缝处已经发白,边沿磨破,颜色退尽:有的地方呈淡绿色,有的地方则是时髦的“探戈”色。另外,大衣的式样是常礼服。现在主人的腰部要比当初订做大衣的原主人的腰部低五俄寸。那人脖子上有块什么东西围着,头戴大礼帽,手杖有个极精致的镶头。此外,在长礼服衣襟的襻儿上有一个大大的花结,像是挂着一枚格季里昂勋章。

他脚步很沉地走了进来,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拄着的手杖上。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朝伙计摇了摇头,伙计立刻为他端来半打加里金啤酒……那人从杯子里呷了一口酒,像是感到厌恶,脸部抽搐了一下。接着,他用半眯缝的、无神的眼睛看了一下周围。在我落入他“视野”的那一瞬,轮到我咳嗽了一下。

……大概,死人的目光是这样
穿过铅一般沉重的黑暗
看着永远失落的世界。

或许……或许,肉商屠刀下的动物也是用这样的目光四周顾盼的:毫无意义的,可怕的……

“渡船”拉着凄凉的汽笛驶离码头。天已经大亮了。我留下来真蠢。现在,“水上饭店”也要关门了。顾客们一个接着一个、缓慢地、拖着脚步开始打道回府。大桥也正在合拢——该回家了……总不至于整夜欣赏这个醉汉吧。

但当我准备停当,正要离开的时候,那位穿常礼服的人突然含糊不清地说起话来。他那喃喃低语的节奏令我深感惊讶。这是一种平稳的,有节奏的朗读法——诗人们就是这样读诗的。

我侧耳倾听起来……

……不,你们依然难以逃避肢解,
传染、脓液和腐烂……(原文为法语)

穿着别人的常礼服的怪人对着一排加里金啤酒酒瓶,在满是痰迹的"水上饭店"里,读着勃德列尔的《尸体》。

……我眼睛的星辰,我心灵的灯,
给你们,我的天使和我的激情……(原文为法语)

他突然停止了朗读,高傲地——我是这样感觉的——直起了身子。他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在他的目光里,除了刚才使我哆嗦的"那种表情"以外("那种表情"依然存在),还有着某种狠毒的傲慢。

"你们……"他醉态十足地做了一个动作,"你们……大家……"他又挥动了一下已不大听使唤的手。酒瓶翻倒了,啤酒汩汩地流入涅瓦河。"你们……资产阶级……坏蛋……坐着,感觉不到……"他伸出一个手指,威胁"资产阶级",其中也包括我。"你们……"他又做了一个动作,这次,一只杯子翻倒打碎了,"坐在这里,看不见……"

他停了一会儿,又神情庄严地宣布:"瓦列利·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正站在对岸。"过一会儿,他再补充一句:"就在那儿……彼得保罗要塞旁边……"他倾身向前,双眼盯着对岸,"在水上走——瓦列利·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在水上走。但不是来找你们的。他是来找我的。"

他站直身子,迎着"从水上走来的勃留索夫",踉跄着朝船舷走去。桌子翻倒在地,碎玻璃发出一阵声响。那长着村姑般脸的伙计从瞌睡中惊醒,跑向穿着常礼服的醉鬼,不客气地抓住他

的肩膀。“别胡闹……”他只来得及说出这几个字,一记可怕的耳光便把他打闷了……

听到伙计的喊声,身材肥胖的红脸老板跑了过来。一只酒瓶朝他的头上飞去……

不管我观看这幕闹剧的兴趣有多大,我还是急着朝门口走去。幸运的是,门口没人。这时,紧贴着我的耳朵,像铅球一样,又飞过来一只酒瓶。我赶紧加快脚步。一个留小胡子的警察在听到“水上饭店”传出的喧闹声后,已经穿过滨河街跑来了。在鏖战声中,可以听到刚才还充满幻想、一字一顿地读诗的那个声音在尖声叫喊:“别碰……我……大天使米哈依尔同盟会会员……莅临此地……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1]

在战前彼得堡众多的文学社团当中,有一个名叫“费察”。

这个名称不像与它相似的那些苏维埃式的名称一样是可以解读的,它不能。“费察”并不表示“声音分析语文研究所”,或者类似其它什么机构。“费察”是协会成立当日,协会的一个创办会员朗读的长诗中的主人公的名字。这首诗相当平庸,堆满华丽的词藻。从那时起,不管创办“费察”的唯美主义者们有多么不高兴,谁也不再用真名去称呼这个协会。“我们去‘费察’。”“您去过‘费察’了吗?”人们都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也不记得,“费察”的真名是什么。

大家都笑话“费察”,但又都去参加它的活动。协会位于谢尔吉耶夫路,场地相当宽敞,布置得也很好。去的人可以不听身为唯美主义者的协会创办会员的发言,而是坐在舒适的餐厅里,品尝免费供应的三明治和波尔图葡萄酒消磨时间。库兹明说过,他是因为演讲或者报告中间有休息才来参加文学聚会的——这样可以看看别人,也可以让别人看看自己。“费察”举行

的会议活动,整个儿就是一次“幕间休息”,还带供应波尔图葡萄酒。因此,每星期在谢尔吉耶夫路举办的活动总有许多人参加。

一次,这样的会议正在举行。我按老习惯坐在餐厅里。通向开会大厅的门关着。突然,有人把它打开了。刹那间,一个声音——奇怪的、刺耳的、我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个声音我是熟悉的。但我是在哪儿听到过的呢?

“瓦列利·雅可夫列维奇在水上走……”

“我眼睛的星辰,我心灵的灯……”

“别碰我!我是大天使米哈依尔同盟会会员。我杀了你!……”

对了,就是这个声音。

“费察”的舞台上,在棕榈树和钢琴之间,站着我在“水上饭店”遇到的那个人。他胡子刮得精光,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好像还面带微笑。他的常礼服有些老式,但完全是“资产阶级”常穿的那种。当我走进大厅时,他刚好结束一段朗读。大家合乎规范地朝他鼓掌,他也合乎规范地朝大家鞠躬。

是那一个人吗?

这时,他又开始读了起来。听清他的嗓音之后,我便不再有什么怀疑了。他读的是一首带有现代派风格的诗:

噢,图库丽吉巴理舍拉。
噢,王中之王,噢,海洋之光……

显然,“费察”里那些审美品味高的听众喜欢这类东西。“高级风格”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这位是谁?”我问安列普——费察就是他所写的长诗的主人公。

安列普——这位戴着单柄眼镜，留着分头，仪表堂堂的年轻人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您不知道？这位是奥金诺基，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他的作品有《天平》、《金色的鲁诺》——他的诗集由'格里夫'出版。他的诗很出色，不是吗？"

奥金诺基的名字我自然听到过。至于安列普对他诗歌的尊重，我也有同感——这的确是俄罗斯莫斯科颓废派"中期"的一个值得尊重、不无才华的诗人……但是……

"但是，他令人生疑，是同盟会会员，好惹是生非……"

安列普朝我挥了挥手。

"多么荒谬的说法。这是谁告诉您的？这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噢……多么聪慧的头脑——我们特地把他请来，下周六他将做一个有关亚述神话的报告，他是亚述学的专家……极其出色的一个人。您从哪儿听说他是同盟会会员的……相反，他好像……和革命党有联系……"

晚会上，我一直从远处观察着奥金诺基。他时时被讲究审美的女士和"费察"的主人——写诗的宫中侍从所包围，他谦虚、忧郁而得体。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看见安列普搀着"水上饭店"肇事者的胳膊，将他请进自己那辆雅致的轿式马车。

我在不同场合遇到过奥金诺基几次。他总是那个样子：谦逊、文静，谢绝饮酒、眼睑低垂。我几乎都是在富裕的"诗歌爱好者"的家里见到他的。这种"爱好者"以前在彼得堡有很多。

……噢，图库丽吉巴理舍拉。
噢，王中之王，噢，海洋之光……

他充满温情,拖长音调地读着。“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请喝点酒吧。”“谢谢,我不喝酒:心脏不好。”接着,又是诗歌、低垂的目光、轻柔的声音、文雅的动作、长时间的关于一些复杂的学术性问题的谈话。

……卡巴拉哲学理论指出……

……诺斯替教信徒曾认为……

……噢,图库丽吉巴理舍拉……

而在这种场合,我总会回忆起他的叫喊:“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我很想把我在“水上饭店”看到的一些东西引进这种严肃的谈话当中。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终于,机会出现了。

那是在“野狗”俱乐部。通常,在这样的日子里,“局外人”很少,“自己人”则各自坐在一角,边喝酒边读书。为了节约,电灯没有开足,也不管客人们是否看得清。甚至普罗尼,这位精力充沛的“野狗”俱乐部经理也已感到疲倦,跑到厨房后的下屋睡觉去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晚上,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这样一个地下室里,打量着斑杂的墙面,呷着冷啤酒,而周围的一切看上去又有点神秘……半夜三点左右,进口的门响了一下。我正坐在壁炉旁,觉得无聊,听到响声便转过脸去。走进来的是奥金诺基。

他醉了——这点一下便能看得出,但还没到“水上饭店”那次的程度,他站得很稳,眼睛里也没有当时那种凶狠的神情;双眼像平时那样狡黠地眯缝着。不过,他醉得还是不轻——他的笑容、步态、动作——他的一切都显示着这一点。

我用不着去想和他搭话的理由:因为他在门边踏了踏脚之后,便走过来在壁炉旁挨着我坐了下来。我们相互打了个招呼。他斜眼看了一下我的李斯陵葡萄酒,咂了咂嘴。

“您喝酸味葡萄酒。不,谢谢!”他推开我正向他递过去的杯

子。“谢谢,我不喝这种酒。不想喝。另外……”

“心脏不好,”我接口说道。

“正是,心脏不好,”他看了我一眼,在他“狡黠”的眼睛里那种神情闪烁了一下,“说得对,心脏不好,不幸的、失常的、虚弱的心脏,就像所有人的心脏一样……”不过,这已经是形而上学了,所以,他打住了话头。“但要是喝这些李斯陵葡萄酒,不光心脏不适应,更糟的是,我的胃也要疼。如果要为朋友干一杯的话,那我最好喝……”

他朝卖品部喊道:“喂,来伏特加!”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开了口,尽管我不知道怎样开始我所感兴趣的谈话。

“在认识您之前,我就遇见过您。”听了我这句话,他留神起来。

“遇见过我?在哪儿?在出版社里?”

“不。今年春天,在‘水上饭店’。当时您还读了勃德列尔的诗,记得吗?”

“啊,原来在那儿。当然,想起来了。我那时喝醉了,我不想隐瞒。但这在我是很偶然的,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比较引人注意。您……”他眯起双眼,“在那儿坐了很久?”

“我在酒瓶开始乱飞的时候走的。我担心自己的脑袋。过后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我给了他“决定性的一击”:

“后悔没有看到底。谁胜了,还有……大天使米哈依尔是否助您一臂之力?”

但是,我的“一击”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至少,我的谈话伙伴仍然面无愠色,只是双眼眯缝得更厉害了。

“这都是些小事，”他说，“不值得去回忆。我的脸被人打破了……或者我打破了别人的脸——这不一样吗？您不这样认为？您这是年少气盛——到了我这把年纪，您也会这样评判事情的……至于说到大天使米哈依尔，这个问题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简单。您，承认吧，您现在想：我把这个奥金诺基逼到了墙角，这下他可脱不了身了。但我能够脱身，脱身以后还会把您逼到墙角。您认为不可能？我这就把您逼到墙角……

“不过，这也都是些无聊的谈话。这里地方也不合适，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太太，看见吗？正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呢，她对我们感兴趣。而我，尽管喝醉了，但还没有烂醉如泥。您在我酩酊大醉的时候逮住我吧，就像在‘水上饭店’那样。这样一来，我们之间便会有另一场谈话……吉尼亚科夫也将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您的面前。而这都是些无聊的事情：我打了别人的脸，还是别人打了我的脸……”

“您答应把您的书寄给我的，可别忘了。”他转移了话题，“这是我的地址。”他递给我一张印得很差的名片，“请别忘了。”

“此前，我一直不知道您的真名实姓，只知道笔名。”

“那现在，您知道了我的姓氏以后，对我的看法会更怪吗？”

“这个姓氏我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吗？”他怀疑地拖长了音调，“我的姓颇有名气，特别是在西伯利亚，我爷爷曾用斧子撂倒了九个人。”

“我想向您解释。我应该向您解释。至于为什么，我敢打赌，您猜不出来……”

一支点燃的蜡烛插在啤酒瓶瓶口里，淌着油。房间里，光线昏暗，铁炉子烧得很旺，在一盏小小的长明灯的照射下，屋角圣像上的衣饰泛出金光。

"至于为什么,我敢打赌,您猜不出来……"

在与吉尼亚科夫-奥金诺基谈话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收到了他的一张条子:"有急事,请速来。""急事"两字写得很粗,以示强调。什么事呢?莫非他以为我富有,要向我借钱?

我去了。看看这个勃德列尔专家,大天使米哈依尔同盟会会员和"自己爷爷的孙子"是如何生活的——光这点就令人感兴趣。也许,他会打开话匣子。

他自己也是请我去谈谈的。"应该向您解释。至于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呢?

奥金诺基的家在僻静的卡拉什尼科夫滨河街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那幢昏暗的木头房子。从奥赫塔运河上刮来的风很猛,窗上的玻璃都被震动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淌着油。在铺着织花麻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伏特加、面包和小吃。

奥金诺基从茶杯里呷了口酒,皱起了眉头。

"您请,您请。这是带酸味的酒,特意为您准备的,如果您不想喝公家酿制的酒的话。那么,我为什么要向您做解释呢?……

"您以为,我想为自己辩解,在您面前为自己开脱,不致于使事情变得更糟。生怕有人会说,吉尼亚科夫是同盟会会员,还要隐瞒。可疑的人。应当提防他。把他从文学界赶出去。流放。啊?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我毫不在乎!流放也好,文学界也好,一切的一切,我都不在乎!我想隐瞒就隐瞒,不想隐瞒就不隐瞒。今天是大天使同盟会会员,明天会去刺杀沙皇。想杀就去杀。至于人们是怎么看我的,我毫不在乎。我这写的是自己:

“我吐痰,吐的痰真好看,
沿着沟渠漂浮
光滑的侧面紧偎着……”

他眯起眼睛,皱着眉头,又呷了一口伏特加酒,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要向您解释,因为您是瓦列利·雅可夫列维奇·勃留索夫的朋友,因此,也是我的朋友。”

“什么朋友?我与勃留索夫甚至不认识。”

但奥金诺基没有在听我说话。

“勃留索夫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应该在哪种意义上理解这个‘朋友’呢?”他神情严峻地说:“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沐浴太阳光泽的生物是他的朋友。勃留索夫是太阳,我们是生物……

“圣瓦列利
请为我们向上帝祈祷吧……”

他照教堂里的方式拖长音调说道:“我为什么请您来,现在理解了?”

我想说,我不理解,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醉了,醉得很厉害,就像在“水上饭店”时一样。他凑过来要亲吻我——他的嘴歪向一边,眼神很瘆人。“你怎么不喝啊?”他改用“你”来称呼我。“喝吧,老弟,伏特加酒质量很好——像王水一样。人们把强度最高的酸叫做王水,它能腐蚀铁、石头、一切。它只能被保存在金刚石做的罐子里——只有金刚石它蚀化不了。这也是王

水——能把一切都浇灭,能把一切都烧毁……”

他思索着。

“只有人的忧伤它对付不了。羞愧——它能使之荡然无存,良心——无影无踪;至于荣誉——你再喝上一杯,它就让荣誉去见鬼。但忧伤这东西,就像金刚石一样,拿它没办法。它钻在你心里,不会融化……

“我读首诗给您听,好吗?”他突然问道,“真正的诗,不是我读给资产阶级们听的那种:噢,图库丽吉巴理舍拉/噢,王中之王,噢,海洋之光……”他夸张地模仿着自己平日的朗读,“不,不是这种,而是为自己写的诗歌:

我彻底蔑视
真理、良心和荣光,
我唯一的希望
就是纵情享受美味佳酿,
只要有姑娘偎依在身旁——
她们早把羞耻抛到了远方;
只要钱袋鼓鼓,
胃口不倒……

“这儿,”他抓起我的衣袖,“这儿才是最主要的东西。奥金诺基的圣像壁。请靠近一点,瞧,这就是……”

在蜡烛的光照下,装饰屋角的圣像看得清楚一点了。发暗的古老圣像的金属衣饰,圣像头上暗淡的光环,镀金层已经磨损……一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奥金诺基把蜡烛端得更近:在圣像壁中间,发暗的圣像衣饰下面出现了伏鲁贝尔画的勃留索夫的头像,旁边是勃德列尔、尼

采、某个女人……与这些头像交错排列在一起的是真正的圣像。

大概,我脸上流露出的反感给主人带来了极大的满足。狡黠的微笑变得越发怡然。

他解释说:"戴手筒的女士,是勃拉瓦兹卡娅,神智学者。而左边那个老人——圣谢拉菲姆·萨洛夫斯基旁边的那个——是我的爷爷,已经仙逝的阿里斯塔尔赫·吉尼亚科夫。就是那个……在服苦役时被干掉的……"

战争爆发之前,奥金诺基就不知去向了:原来,他同时用几个笔名为《村民》和另一份自由主义倾向很浓的、颇受人尊重的报纸撰稿。这事被人发觉了……直到1920年,他才又在彼得堡露面。他相貌邋遢,胡子也不刮。没有人关心,他从哪里来,在做些什么事。

一天,他跑到艺术之家,去看自己的老熟人、作家Γ。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会儿,又把话题转向了政治。奥金诺斯问Γ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看法。后者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啊,原来是这样!"奥金诺基说,"这么说来,你是工农政权的敌人!我可没想到!尽管我们是朋友,但我还是要在你这儿进行搜查……"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某省肃反委员会颁发的委任状……

注释:

① 大天使米哈依尔同盟会:是黑色百人团的组织。